



# 美国司法体系概述

(2004 年 12 月发布 )

## 目录

- [引言 美国司法体系](#)
- 第一章:[联邦司法体系的历史与组织](#)
- 第二章:[州司法体系的历史与组织](#)
- 第三章:[司法管辖权与决策之界限](#)
- 第四章:[司法程序中的律师、诉讼当事人以及利益团体](#)
- 第五章:[刑事法院程序](#)
- 第六章:[民事法院程序](#)
- 第七章:[联邦法官](#)
- 第八章:[司法政策的实施与影响](#)
- [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
- [名词解释](#)
- [参考书目](#)

## ACKNOWLEDGEMENT

*Chapters 1 through 8 are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book Judicial Process in America, 5th edition, by Robert A. Carp and Ronald Stidham, published by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Copyright © 2001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ecutive Editor—

*George Clack*

Managing Editors—

*Rosalie Targonski,*

*Mildred Sola Neely*

Art Director—

*Min-Chih Yao*

Cover Illustration—

*Sally Vitsky*

Photo Research—

*Maggie Johnson Sliker*

## 引言:美国司法体系



图为画家朱尼厄斯·司特恩司(JuniusBrutusStearns)1856 年的作品,描绘乔治·华盛顿(右立者)在制宪会议上发言的情景。该会议之成员于1787 年 9 月 17 日起草并签署美国宪法。宪法是美国主要法源。



宪法已赋予国会通过立法的权力。图为小布什总统在 2001 年发表预算演说时召开的联席会议。行政权依序委交总统。(© Michael Geissinger/The Image Works)



由 50 个州议会(例如上图中正在进行表决的纽约州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只适用于该州公民或居住于该州或于该州经商的外地人。 (© *David M. Jennings/The Image Works*)



联邦与州法院审理两种纠纷：民事与刑事。图中，在一桩民事诉讼中代表地主的律师向南达科塔州最高法院陈述论证。 (*AP/WWP*)



民法涵盖了结婚与离婚相关之成文法。这对新人正由法官公证结婚。右，德州的一名法官。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司法部门经发展已纳入更多女性和少数民族。 (© Kent Meireis/The Image Works)

在每个工作日，全美各地法院做出判决，影响成千上万的民众。有些判决仅对当事人乃至特定法律诉讼产生影响，有些则裁定了权利、利益，以及法律原则，影响范围广及所有美国人民。许多人欣然接受判决但其它人却不表赞同(有时反对人数众多)的情况当然也有，但所有美国人民都承认法院判决的合宪性和法庭作为最终法律阐释者的角色，充分证明了美国人对国家法治的信任和司法体系的信心。

以下概述美国司法体系，并说明美国法院的组织与运作方式。法院是美国司法体系的核心但非全部。每天，全美各地的联邦、州，以及地方法院解释法律，并依法仲裁纠纷，有时甚至宣布法律违宪，侵犯了宪法赋予全国人民的基本保障。于此同时，数百万美国人正处理着日常事务，他们虽未求助于法庭，却也仰赖司法体系。购买第一栋房子的年轻夫妇、签订合约的商人、预立遗嘱将财产留给后代的父母 — 所有人都需要法治所提供且受美国司法体系所保障的可预测性与可执行的共同准则。

本引言希望使读者熟悉美国法律的基本架构与词语，其后各章将进一步说明细节，并解释美国司法体系如何因应一个成长中国家的需求以及日益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现实，逐步发展成形。

## 联邦司法体系：概述

美国司法体系有多个层级，可能比大部分国家更多。联邦法与州法的区分是原因之一。要了解这一点，不妨回顾历史。当年美国并非以国家形式建国，而是由**13**个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殖民地所组成的联盟，因此，独立宣言(1776)言及了「各殖民地的善良人民」，但也宣称「这些联合殖民地皆为(按其权利也应是)自由而独立的州。」一国国民分属各州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始终是美国司法史的基调。如下所述，美国宪法(1787年通过、1788年批准)启动了渐进且不时引发激烈争议的权力暨法律权威转移，从各州转向联邦政府。话虽如此，各州至今仍保有实质权威。任何研究美国司法体系的学生都必须了解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权限如何分配。

宪法在联邦法与州法之间划定了相当多分界线，也透过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划分联邦权力(从而在各部门之间创造了『三权分立』并奉行『制约与平衡』制度，不让任一部门权力过大)，各部门对司法体系有其独特的贡献。在这套体系下，宪法规定了国会可能通过的各种法案。

这样已经够复杂的了，美国法律竟然不仅是国会所通过的法令而已，在部份地区，国会授权行政当局采用在法规要求之外增加细节的法律，而这整套系统的依据，就是源自于英国普通法的传统法律原则。即使宪法与成文法取代了普通法，法庭仍继续采用不成文的普通法原则来补强宪法未言及而国会也未立法管制的部分。

## 联邦法法源

### 美国宪法

#### 联邦法的至高优越性

在 1781 至 1788 年间，名为邦联条例的协议主宰了 13 州之间的关系。该条例建立了一个虚弱的国会，将大部份的权力保留给各州。各州虽奉命对其他法庭的裁决表示尊重(以示『充分互信』)，但除海事法庭外，邦联条例并无联邦司法之相关规定。

宪法的起草与批准反映了一项逐渐成形的共识：必须强化联邦政府。司法体系正是当时着手的领域之一，其中最重要的，是宪法第 6 条的「至高性条款」：「本宪法，与依据本宪法所制定之美国法律，以及依据美国权力所缔定或将缔定之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因此，即使宪法与各州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加以遵守。」

这段话确立了美国法律的第一项原则：凡联邦宪法有规定者，州法不能与之抵触。至于这项禁令如何适用于联邦政府本身，以及各州司法体系在新宪法未言明的领域中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仍有待厘清。宪法修正案提供了部分答案，历史则提供了更多解答，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人仍持续努力在联邦与州的范畴之间做精确的划分。

### **每个部门在司法体系中发挥作用**

制宪者想强化联邦政府，却惧其权力过大。限制新政权的方法之一，是将政府划分为数个部门。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 51 篇》中所解释的，「将政府划分为个别而独立的部门以避免篡夺。」麦迪逊所指的每个「部门」— 立法、行政、司法 — 对司法体系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 **立法**

宪法赋予国会通过立法的权力。经由国会考虑的提议称为法案。如果国会两院多数 — 若总统否决，则为三分之二 — 表决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即为正式法律。联邦法是成文法。《美国联邦法典》是联邦成文法的「法典编纂」。《法典》本身并非法律，仅代表经逻辑方式编纂之成文法。例如第 20 条包含教育相关的各种成文法，第 22 条则涵盖外交。

国会的立法权有限，更准确地说，立法权是美国人民透过宪法委托国会的，而宪法已言明国会可与不可立法的范围。宪法第 1 条第 9 项禁止国会通过特定类型的法规，例如国会不能通过「追溯法令」(溯及既往或『事后的』法令)或征收出口税，第 1 条第 8 项则列出国会有权立法的范围。部分宪法条文(如『设立邮局』)相当明确，部份条文则不然，其中又以「规范美国与外国，以及州际贸易」为最。显然，解释模糊授权的权力极其重要。早在立国之初，司法部门便担任这个角色，因而在美国司法体系中取得了额外且至关重要的角色。

## 司法

和其它部门一样，美国司法部门只拥有宪法交付的各项权力。宪法规定联邦司法权仅限于某几种争议，列于第 3 条第 2 项。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案件为涉及联邦法疑议(「基于本宪法与美国各种法律，及缔结之条约...而发生之所有通行法及衡平法案件」)以及「跨州」案件，意即分属两州之公民间的争端。跨州管辖权允许当事人双方免于在对方所属之州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项司法权出现于立国之初。如第二章所述，美国最高法院在马伯瑞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案中(1803 年)解释其权力范围包括裁定成文法是否违宪以及(若该法违宪)并宣布该法无效。法律可能违宪的因素包括侵犯宪法保障人民的权利或宪法第一条未授权国会通过那类法规。

因此，解释描述国会立法范围的宪法条文的权力非常重要。传统上，国会以规范「各州之间通商...」或言州际贸易之必须为理由合理化了许多成文法。这个概念有相当的伸缩弹性，不易精确描述。的确，只要是成文法，几乎都可以在其目的和规范州际贸易之间创造出看似可信的关联。有时，司法部门狭义地解释「贸易条款」。举例来说，在 1935 年，纽约一家屠宰场遵行联邦法规定之工人的工时与工资经最高法院宣布无效，因为该厂所处理过的鸡肉全数销售给纽约肉贩与零售商，因而不属于州际贸易的一部份。然而不久之后，最高法院开始给予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更多自由。今日，联邦法庭持续广义地解释通商权力，尽管广义的程度不足以合理化国会可能通过的任何法案。

## 行政

宪法第 2 条将「行政权」委交美国总统。在华盛顿总统(1789-1801)任内，整个行政部门是由总统、副总统、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以及司法部所构成。随着国家的发展，行政部门也跟着成长，现有 15 个内阁层级的部门，各部门下辖数个局、署，以及其它机构，还有一些部分是不属于这 15 个内阁层级部门的。行政部门各单位都行使总统委派之行政权，因此最终都必须对总统负责。

就某些领域而言，行政与其它两部门之间的关系很明确。假设有一个或以上的人抢了银行，国会已通过成文法将银行抢劫定罪(《美国联邦法典》，第 18 条，第 2113 项\*)，(\*:严格来说，成文法只适用于联邦注册或保证之银行或美国联邦准备制度之成员。美国境内的每一家银行可能都符合上述标准，但不符上述标准且不被视为对州际贸易有影响之银行，则不在联邦法律管辖之内。联邦法通常详述一项司法依据：就上述案例而言，为联邦注册规定。)而隶属于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FBI)会调查这起犯罪事件。若逮捕到一名或以上的嫌犯，则联邦检察官(也属于司法部)会试图在联邦地方法院的审理中证明嫌犯有罪。

银行抢案是一个简单例子。但随着美国的现代化与发展，这三个部门在司法体系中的关系也逐渐演进，以因应工业与后工业社会中日益复杂的议题，其中又以行政部门的角色变化最大。就上述的银行抢案而言，国会不需专业知识即可制订成文法将银行抢劫定罪。假定议员有意禁止「危险」药物出现在市面上或限制空气中「不健康的」污染物，那么国会可以(若选择这么做的话)为这些名词下精确的定义。有时国会会这么做，但国会越来越倾向将部分权力委派给隶属于行政部门的行政机构。于是食品暨药物管理局(FDA)负责监督全国食品与药物的卫生，而环境保护局(EPA)则规范产业对土地、空气，以及水的影响。

虽然行政机构只拥有国会依成文法委派的权力，但这些权力都具有相当的实质性，足以颁布明确定义较笼统之法律用词的规定。法令可能禁止大气中「危险」污染物的含量，EPA 的规定则定义了污染物和每种污染物含量的危险值。有时，成文法会赋予行政机构调查违法情事、做出判决，甚至施行处罚的权力！

法院将会宣布授与行政机构太多权力的成文法无效。一项名为「行政程序法」(《美国联邦法典》，第 5 条，第 511 项，以及其下规定)的重要成文法说明了行政机



构在颁布规定、裁决违法行为，以及施行处罚时应遵循的程序，同时也提出了当事人如何寻求司法协助复审行政机构的裁决。

## 其它法源

美国法律最明显的法源是国会通过的成文法，并有行政法规作为补充。有时，这些法规清楚划分了合法与不法行为间的界线 — 再以上述银行抢案为例 — 然而政府颁布的法令不可能应付得了每一种情况。幸运的是，还有另一套法律原则和基准可以因应这些灰色地带，参见下述。

## 普通法

遇到成文法或宪法条文控制范围外的情况时，联邦与州法院通常仰赖普通法。普通法汇编了几世纪前始于英国的司法判决、惯例，以及一般原则，至今仍继续发展。在许多州，普通法在合约纠纷仲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州议会向来不赞成通过涵盖所有可能的合约纠纷之成文法。

## 司法判例

法院依法判决涉嫌违法的行为与纠纷。在判决时，法官通常必须解释法律，并认为应该遵循其它同级或上级法院过去对法律的解释，此即「遵循先例」或判例原则，以确保一致性与可预测性。诉讼当事人在面临不利于己的判例或案例时，会试着区别他们的案件与先例的不同处。

有时法院会对法律做不同的解释。例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有罪」这项条款。有些案件会发生当事人因为其证词可能使他遭到刑事起诉 — 不是在美国而是另一国 — 而拒绝接受传讯或作证的情况。自我归罪条款适用上述情况吗？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定适用，但第四以及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则主张不适用。\* 这明显意味着，法律因地而有异！(\*：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是受理上诉的法院，审理来自纽约州、康乃狄克州，以及佛蒙特州的联邦地方法院上诉案件。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则涵盖马里兰州、北卡罗莱纳州、南卡罗莱纳州、维吉尼亚州，以及西维吉尼亚州；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则为

亚拉巴马州、乔治亚州，以及佛罗里达州。欲进一步了解联邦法院组织，请见第一章。)

审级较高的法院试着消除这些不一致的情况。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经常选择能够消除巡回法庭歧见的案件来审理。最高法院的判例将控制或适用于所有下级联邦法院。在美国诉贝尔希斯(**United States v. Balsys**)**524 U.S. 666(1998)**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对外国起诉的恐惧凌驾自我归罪条款的范围。\*(\*) (\* \*: 此句中的数字源自于贝尔希斯判决的传票。数字分别代表法庭于**1998**年颁布判决，该判决出现于《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汇编》的第**524**卷，始于第**666**页。)

这项判决成为全国性的法律，包括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其后，任何遇此议题的联邦法院都必须遵循最高法院在贝尔希斯案中的裁决。巡回法院的判决同样对巡回范围内的所有地方法院具有约束力。「遵循先例」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州法院系统。如此一来，判例在数量与解释性方面皆有增长。

## 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救济方式

有鉴于法律体系日益庞大，区分向法院提出的各类法律与诉讼以及法律为每种案件提供的救济方式可收厘清之效。

## 民事/刑事

法院审理两种纠纷：民事与刑事。民事诉讼涉及两名或以上的私方当事人，至少一方涉嫌违反成文法或普通法的某项条款。先提出诉讼者称为原告，另一方则是被告。被告可对原告提出反诉，或对共同被告提出交互诉讼，只要与原告的原始控诉有关即可。法庭偏好审理所有陈述皆因一起纠纷引起的单一诉讼。商业诉讼(例如违约)或侵权行为案件(当一方声称因另一人的疏忽或蓄意恶行而受到伤害)皆为民事案件。

大部分的民事诉讼发生于私方当事人之间，联邦或州政府则一定是刑事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政府以人民之名义，起诉被指控做出例如伤害大众福祉等违反法律的

某些行为的被告。两家公司可以就违反合约提出民事诉讼，但只有政府能控告某人谋杀。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举证标准与可能刑罚也不同。刑事被告只能因「罪证确凿、无合理疑点」而被判有罪。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只需提出「证据优势」即可。证据优势基本上只是一种说服力不足的陈述，意指「极有可能」。被判有罪的罪犯可能入狱，但是打输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只需负法律或衡平救济之责，如下文所述。

## 法律与衡平救济

美国司法体系提供广泛但范围并非无限制的各种救济方式。刑事成文法通常列出某一特定犯行的罚金范围或法庭可能施予的入狱时间，其它部分的刑事法规在某些权限内可能容许对惯犯加重刑罚。严重的罪行(又称为重罪)的刑罚比轻罪更严厉。

在民事诉讼中，大部分美国法院都有选择法律或衡平救济的权力。和过去相比，今日两者的区别不大，但仍值得了解。在 13 世纪的英国，「法院」只有判决金钱上救济的权力。假如被告违反的合约价值是 50 英镑，法院可命令被告全数支付给原告。在许多案例中，这样的赔偿金已经足够，但在其它案例，例如稀有艺术品或是一块土地的出售，则不然。13、14 世纪间，「衡平法院」形成，创造了例如实际履行的衡平救济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义务，取代了以往强迫他们为不履行之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金的做法。到了 19 世纪，大部分美国法院皆已消除了法律与衡平救济之间的区别。时至今日，除了极少数例外，美国法院皆可视情况需要裁定法律或衡平救济。

以下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例说明了民事与刑事法的差异及各自提供的救济方式有何不同。加州指控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Simpson)犯下谋杀罪。要是他被判有罪，就得坐牢。但是他没被判罪，因为陪审团裁定检方无法证明辛普森罪证确凿、无合理疑点。后来，辛普森太太的家人以非法致死为由控告辛普森，这是一桩民事诉讼。此案中，陪审团以证据优势为由判定辛普森必须为其妻之死负责，并下令辛普森支付赔偿金——法律救济——给原告。

## 州法在联邦体系中的角色

宪法明确禁止各州采行某些法律(与外国签订条约、铸造钱币), 宪法第 6 条的「至高性条款」也排除任何抵触宪法或联邦法的州法。即使如此, 司法体系大体上仍由州所控制。宪法已明确规定国会制定法律的范围。**1791** 年的宪法第十修正案言明: 「凡宪法未授予美国也未禁止各州的权力皆保留给各州和人民。」

当时联邦与州政府间仍存在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 — 起因包括了奴隶制度以及最终各州是否有权脱离联邦。**1861** 至 **1865** 年的南北战争一并解决了这两项争论, 州在司法体系内的角色也被加上了新限制: 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1868** 年)的规定,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一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在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法律上的平等保护。」此修正案大幅扩张了联邦法院宣布州法无效的能力。布朗诉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1954** 年)禁止阿肯色州的州立学校体系实施种族隔离的依据就是这项「平等保护条款」。

自 20 世纪中叶起, 上述各趋势 — 行政国兴起、对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的司法解释变得更有说服力且广泛适用、国会规范贸易的权力也出现类似扩张 — 联合并强化了联邦在司法体系中的角色。即使如此, 司法体系大体上仍受州的管辖。各州不得拒绝给予联邦宪法保障公民的任何权利, 许多州甚至在解释州宪法时授与更多权利与特权。实施州法的州持续裁定大多数的合约纠纷, 多数刑事案件与民事侵权诉讼也由州来裁定。家庭法, 包括结婚与离婚, 几乎是专属于州的事务。大半时间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 司法体系代表的是警官与自己所属的州法院或该州的各类政府机关和其它政治分支。

本引言仅概述司法体系, 以下各章将提供更多细节、特色, 以及说明。第一章与第二章分述联邦与州法院体系的组织, 第三章详述司法管辖权的复杂性, 描述联邦与州法院之界线, 也探究谁可以提出诉讼和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第四章把重点从法院扩大到出庭的团体、研究美国法律的运作方式, 并描述典型的诉讼当事人。此章也解释了利益团体的角色, 说明他们如何促成特定案子的进行以推动其社会与政治议程。第五章详细说明法庭如何处理刑事案件, 第六章的焦点则为民事诉讼。第七章说明联邦法官的甄选过程, 最后一章则探讨特定司法判决 — 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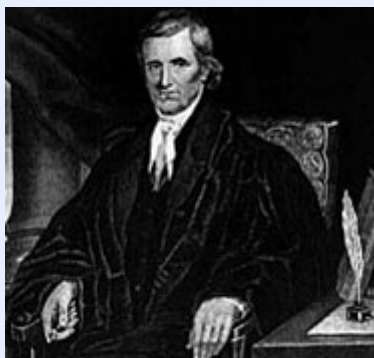
别是最高法院之判决 — 何以等同于一种决策形式,从而使司法制度和立法与行政部门紧密结合在一套复杂的关系之中。

—麦可佛莱德曼(*Michael Jay Friedman*)\*

---

\* 麦可佛莱德曼(*Michael Jay Friedman*)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的执行长。他拥有宾州大学美国历史博士学位以及乔治城大学法学中心法律博士学位。

## 第一章 联邦司法体系的历史与组织



这幅由阿隆佐·查培尔(*Alonzo Chappel*)描绘的肖像为 1801 至 1835 年执掌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他凭借着主导权实施重大改革,包括采取统一法官意见再加以宣布的做法。 (*AP/WWP*)



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入口处上方刻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Equal Justice Under Law)字样。 (AP/WWP)



现任的九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由左到右坐者：安东尼·史格里亚(Antonin Scalia)与约翰·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大法官珊卓·欧康纳(Sandra Day O'Connor)与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由左到右立者：大法官鲁丝·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戴维·苏特(David Souter)、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ance Thomas)，以及史蒂芬·布莱尔(Stephen Brayer)。  
. (Courtesy U.S. Supreme Court)



上诉法院复审来自联邦地方法院的上诉案件。上图，(左)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约翰·沃克二世(John M. Walker, Jr.)主持同一法院中的法官(右)巴灵顿·帕克二世(Barrington D. Parker, Jr.)的宣誓就职仪式。 (AP/WWP)



美国法院 — 在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在部分案件)审级皆然 — 经常处理例如高等教育的反歧视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等备受争议的议题。 (AP/WWP)

美国司法制度中，最为重要、有趣，可能也是最令人困惑的特点之一，要属双轨制的法院系统，也就是政府各层级(州与国家)拥有各自的法院系统。因此，各州拥有两种不同法院体制，一者属于哥伦比亚特区，另一则属于联邦政府。有些法律问题完全在州法院解决，有些则在联邦法庭解决，还有一些问题受到双边法庭的注意，有时因此而造成摩擦。本章针对联邦法院进行讨论，州法院的部分则于第二章探讨。

## 历史背景

美国在实施宪法之前是由邦联条例所统治。根据邦联条例，几乎国家政府的所有功能都委交给名为国会的立法机构，当时行政与立法权不分。

邦联条例的一大缺点是国家司法制度付之阙如。后来，会议代表于 1787 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对于制订国家司法制度大表赞同。然而，对于司法部门应该采取的形式却莫衷一是。

## 制宪会议与宪法第 3 条

制宪会议上的第一个提案是「维吉尼亚宪草」，主张建立最高法院和下级联邦法院，反对者则提出「纽泽西宪草」作为响应，呼吁建立单一最高联邦法院。「纽泽西宪草」的支持者特别不满下级联邦法院的构想。他们主张，所有案件皆应先由州法院审理，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权利已足以保护国家权利和提供全国一致的审判。

州权利拥护者与国家主义者间的冲突因制宪会议上诸多妥协方案之一而得到解决。妥协方案就写在宪法第 3 条，这个条文一开头是这么写的：「美国之司法权授权一最高法院以及国会日后可能制定与设立之下级法院」。

### **1789 年的司法条例**

宪法批准后，讨论联邦司法制度的行动接踵而至。新国会于 1789 年召开时即以司法组织为第一要务，而参与参议院第 1 号法案的人员和相关主张都与制宪会议上对司法制度之辩论如出一辙，也就是再次面临应否建立下级联邦法院或应将所有案件先交由州法院审理的问题。解决这项争议的努力使得国会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团体。

有个团体主张州法院应先依据联邦法做出裁决，若上诉再交由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因为他们忧心新政府可能会消灭各州权利。另一群国会议员则怀疑州法院有地方偏见，唯恐来自他州与他国的诉讼当事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自然希望在司法体系中建立下级联邦法院。由这项争议所衍生的法案— 1789 年司法条例—建立了一套司法体系，包括由一位首席大法官与五名大法官所组成的一各最高法院、三个各由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与一名地方法官所组成的巡回法院，以及 13 个各由一名地方法官所主持的地方法院，而建立下级联邦法院的权力也随即被行使。国会创造了两套而非一套下级法院体系。

### **美国最高法院(The U.S. Supreme Court)**

最最高法院大法官查尔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于《美国的最高法院》(1966)中写道，法院「在概念与功能上都充分表达了美国的特色，和先前的司法制度并无关联。」欲了解制宪者对法院的构想，就必须思考另一项美式概念：联



邦形式的政府。开国元老们为国家政府与州政府预做了准备；州法院应依照联邦法行事，但联邦法的最终解释不可交由州法院为之，当然也不能委托可能做出不一致判决的多个州法院。因此，最高法院必须解释联邦法规。开国元老们的另一目的，是让联邦政府能直接对各州和个别公民采取行动。

有鉴于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政府体制的重要性，引发重大争议或许是在所难免的。一位研究最高法院的重量级学者查尔斯·华伦(Charles Warren)在《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中写道，「在法院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情形比这更引人注目，那就是，虽然最高法院在联邦形式政府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向来为智者与爱国人士所承认，然而，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依照宪法所设立的机构曾像最高法院这样遭到持续的攻击，或在历经激烈反对后达到目前的地位。」

## 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个十年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指派第一批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建立了两项传统。第一，他开创了提名与他政治理念一致的大法官的惯例。华盛顿是有史以来唯一有机会指派整个司法体系的总统。他指派了联邦党的忠诚党员担任所有法官职位。第二，华盛顿所任命的法官大致符合联邦法院的地理代表性。他所指派的第一批最高法院大法官包括了三名北方人与三名南方人。

在华盛顿指派的职位中，首席大法官是最重要的。华盛顿认为，掌管第一个最高法院的人应该是位出众的律师、政治家、行政官员暨领导者。提交给华盛顿的人选很多，而且至少有一人正式提出了此职位的申请。最后，华盛顿选择了纽约的约翰·杰伊(John Jay)。年仅 44 岁的杰伊已有律师、法官，以及外交官的经历，而且还是该州第一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最高法院于 1790 年 2 月 1 日在位于纽约市华尔街地区的皇家交易所进行第一次开庭，庭期只有十天，期间挑选了一名书记员、一个封印，并承认了未来可于最高法院执业的数名律师。当然，当时没有需要裁定的案件；最高法院在最初三年没有裁决任何案子。尽管第一次开庭无足轻重而且简短，但查尔斯华伦写道，「纽

约与费城的报纸对最高法院第一次开庭过程的报导比其它新政府相关活动更为完整；他们的报导也被其它每一州的主要报纸加以报导。」

在最初的十年，最高法院总共只裁决了大约 **50** 件案子。鉴于最高法院案件量之稀少，首席大法官杰伊的贡献或可从他在巡回法院的判决和司法表现来追溯。

然而，或许杰伊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坚持最高法院不能以顾问形式提供行政部门法律意见。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要求杰伊针对维吉尼亚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决议案之合宪性发表看法，华盛顿总统也曾询问杰伊有关他中立宣言(**Neutrality Proclamation**)的问题。在这两个例子中，杰伊坚决不给予任何意见，因为宪法第 **3** 条规定法院只能裁定与实质争议有关的案件。

### 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之影响

约翰·马歇尔于 **1801** 至 **1835** 年间担任首席大法官职务，其支配程度之高，其它法官实难望其项背。马歇尔在最高法院的支配地位使他得以透过意见的表达方式开启重大变革。在他上任之前，大法官们遇到重大案件时通常会书写各自的意见(拉丁文为 **seriatim** 意见，意思是「逐一」)。在马歇尔任内，最高法院采取了宣布单一意见的做法。马歇尔的目的在于将分歧的程度降至最低。他认为争论会破坏最高法院的威信，于是试图劝服大法官们私下解决异议，在大众面前表现出统一的态度。马歇尔也运用其职权使最高法院参与决策过程。例如在他上任初期的马伯瑞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案(**1803** 年)中，最高法院坚称有权宣布国会法案违宪。

此案始于 **1800** 年的总统改选，由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击败对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然而，在 **1801** 年 **3** 月任期结束前，亚当斯及其竞选连任失败的联邦党员设立了数个新的联邦法官职务。亚当斯提名忠心的联邦党员填补这些新职位，并获得了参议院的批准。此外，亚当斯还任命即将离职的国务卿约翰·马歇尔为最高法院新任的首席大法官。

身为国务卿的马歇尔理当将委任状交付给新任法官，然而，随着时间过去，**17** 份委任状皆未能在杰佛逊上任之前交付完成。新任总统命令其国务卿詹姆斯·麦

迪逊(**James Madison**)不要交付剩余的委任状。威廉·马伯瑞(**William Marbury**)是其中一名感到不满的被提名者。他与他的三名同僚(皆已证实为哥伦比亚特区的治安法官)要求最高法院强迫麦迪逊交付委任状,他们的依据是**1789**年司法条例第**13**项对最高法院有权颁发执行令(**writ of mandamus**) — 要求公务员执行非裁决性公务的法院命令 — 的规定。

本案让马歇尔陷入困境。有人建议他取消自身资格,因为他先前曾担任国务卿。另外还有法院权力的问题。如果马歇尔批准执行令,麦迪逊(在杰佛逊的命令下)大概一定会拒绝交付委任状,那么最高法院也没有能力执行命令。然而,如果马歇尔拒绝批准执行状,就等于让杰佛逊不战而胜。

马歇尔在这个看来无解的困境中所做的决定证明他才智过人。他宣布**1789**年司法条例第**13**项因为给予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超过宪法第**3**条的规定,所以违宪,从而建立了法院复查与决定国会法案合宪性的权力。世人公认这项决定是最高法院宣布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几年后,最高法院也主张拥有对州议会法案进行司法复查的权力;在马歇尔的任期中,最高法院根据宪法废除了十多项州法。

### 最高法院的议题重点持续改变

一直到大约**1865**年左右,最高法院都以国家与州政府间的法律关系或联邦主义相关案件为主要审理对象。约翰·马歇尔秉持着对强大国家政府的信念,毫不犹豫地限制对之造成妨碍的州政策。以吉本斯诉欧格登(**Gibbons v. Ogden**)案(**1824**年)为例,最高法院否决了州对于汽船运输的垄断,理由是妨碍国家对于州际贸易的控制。马歇尔透过法院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另一个例子,是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McCulloch v. Maryland**)案(**1819**年)。首席大法官于该案主张宪法准许国会建立国家银行。马歇尔去世后,法院对于强大国家政府的坚持并没有明显减少。**1836**至**1864**年间,罗杰·坦尼(**Roger Taney**)接任马歇尔的首席大法官职位。虽然这时期的最高法院并非总是有利于联邦政府,但是坦尼领导下的最高法院并未逆转马歇尔时期最高法院的走向。

**1865**到**1937**年间,最高法院主要处理的是经济管制议题。由于愈来愈多的国家与州法律都以监控商业行为为目的,最高法院关注的焦点也从联邦主义转向经济

管制。随着这类法令增加，质疑其合宪性的案件也随之增加。在这段期间之初，法院对于管制的立场并不一致，到了 **1920** 年代，法官对政府管控政策则转为不友善。联邦法规通常由于未得到宪法授予之国会权力的支持而遭到否决，而州法规被否决的主因则是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的经济权利。

自 **1937** 年起，最高法院开始关注公民自由的议题 — 特别是受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此外，处理刑事被告之程序权利的案子也日益增加。最后，法院了裁决大量有关于政府平等对待少数种族与弱势族群的案件。

### 最高法院是决策者

最高法院的决策者角色源起于该院对法律的解释。公共政策议题以必须获得解决之法律纠纷的形式，请求最高法院审理。

或许在种族平等领域可以找到一个绝佳的例子。**1880** 年代末期，许多州颁布法令规定使用公共设施时，非裔美国人必须与白人隔离。例如，路易斯安那州于 **1890** 年颁布法令，规定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以平等但隔离的方式使用铁路设施。此法于两年后遭到质疑。一名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男子荷马·普莱西 (**Homer Plessy**) 在搭乘火车从纽奥良至路易斯安那州卡温顿市的路程中拒绝离开火车上白人车厢中的座位，以表示对此法的抗议。因而被捕并被控违法的普莱西坚称该法违宪。在普莱西诉弗格森 (**Plessy v. Ferguson**) 一案 (**1896** 年) 中，最高法院赞成路易斯安那州的这项成文法，从而确立了「隔离但平等」的政策，该政策持续了大约 **60** 年。在这段期间，许多州规定不同种族必须坐在巴士、火车、车站与戏院中的不同区域；使用不同的厕所；饮用不同的水源。有时餐厅与公共图书馆也拒绝让非裔美国人进入。或许最重要的影响是，非裔美国学生必须就读次等学校。

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局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案 (**1954** 年) 遭到质疑。非裔美国学童的父母亲声称，准许隔离政策的州法剥夺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之下的平等保护法律所赋予的保障。最高法院裁定，隔离教育设施在本质上即为不平等，因此，隔离等于否定了平等保护。最高法院在布朗案的裁决终止了「隔离但平等」政策，并确立了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政策。

法院平均每年裁定并签署评判的案件数介于 **80 到 90** 之间，简化处理的其它案子则有数千件。因此，最高法院完整审理的都是经过详细挑选、与政策议题相关的案件，而这些案件的类型则随着时代而有所不同。在一个民主国家，广泛的公共政策事务应留给人民选出的代表，而非由总统所指派、终身任期的法官。因此，原则上美国法官不应该制订政策。然而实际上，法官多少无可避免地帮忙制订定了政策。

然而，最高法院不同于立法与行政决策者。一项特别重要的事实是，法院没有自我启动的机制。大法官必须等着别人请求他们处理问题；没有诉讼，就没有司法决策。总统与国会成员就没有这种限制。此外，即使是最独断的最高法院都多少受限于其它决策者——例如下级法院法官、国会，以及总统——的行动。最高法院也必须依靠他人来实施或执行其判决。

### **最高法院是最终的仲裁者**

最高法院拥有初审与上诉两种管辖权。初审管辖权的意思是最高法院有初次审理案件权力；上诉管辖权则代表上级法院有权复审原由下级法院裁定的案件。最高法院主要的功能是上诉法院，因为该院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复审下级法院的判决。它是全国最高上诉法院，因此拥有解释宪法、立法组织的法案，以及条约的最终权力——除非宪法修正案或(在部份情况下)国会法案变更了最高法院的判决。

自 **1925** 年起，一项名为「移审令」(**certiorari**)的策略让最高法院可以自行斟酌重审哪些案件。根据此种方式，人们可以请求最高法院复审下级法院的判决，再由大法官决定是否批准这项请求。如果批准，则最高法院会颁布移审令，命令下级法院送交完整的案卷纪录。当移审令遭否决时，下级法院的判决仍属有效。

### **最高法院的运作**

最高法院正式的开庭时间从 **10** 月的第一个周一开始，直到整个期间的事务结束为止，通常是隔年的六月底或七月。自 **1935** 年起，最高法院在华盛顿特区有自己的大楼。这栋五层楼大理石建筑的外观庄严，座落于美国国会大厦对面，入口处上方刻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Equal Justice Under Law**)字样。最高法院在

一间可容纳 **300** 人的大审判室正式审理案件。法庭前方为大法官席。开庭时，首席大法官领着八名大法官依照年资顺序穿过法官席后方的紫色布幕入座。座位依照年资安排，首席大法官坐在中间，其右为资深大法官，其左为第二资深大法官，其余按照此先右后左的方式依年资深浅就座。审判室附近有会议室供法官决定案件之用，另有法官与职员办公室所在的内庭。

最高法院的开庭期约为每两周一期，期间以公开方式集会并举行内部会议，休庭时，法官针对案情进行秘密讨论并书写意见。最高法院于每次开庭期间完整审理的 **80** 到 **90** 桩案件都遵循相当一贯的模式。

**口头辩论.**口头辩论通常排在庭期的周一至周三。每天的开庭时间是早上 **10** 点到中午、下午 **1** 点到 **3** 点。此程序并非审判或案件的初审，因此没有陪审团也不传唤证人，而是由两造律师向大法官陈述辩论。按照惯例，一方各有 **30** 分钟，不过有时最高法院会视情况延长时间。最高法院一天通常审理四宗案件。提出口头辩论的律师常被大法官的问题打断。两造律师和大法官皆认为口头辩论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整个过程中唯一允许个人意见交流的阶段。

**开会讨论.**最高法院在为期两周的庭期开始前的周五举行会议；庭期间则于周三下午与周五整天开会。大法官于周三的会议讨论周一辩论的案件，周五的会议则讨论周二与周三的辩论案件和其它任何讨论的事项，而其它讨论事项中最重要，莫过于移审令申请书。

周五会议前，每名大法官都会拿到待议案件的清单。会议约从早上九点半或十点开始，直到下午五点半或六点结束。大法官进入会议室时会握手致意，接着围绕着矩形长桌就坐。他们进行的是秘密会议，讨论过程不做正式纪录。会议由首席大法官主持，他先就每个案件发表看法，其它法官则按年资深浅依序发言。

裁决案件的法定最低人数是六人，达此人数通常不难。因为职位空缺、告病，或考量可能发生利益冲突而不参与等因素，裁决案件的大法官人数有时会少于九人。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多数决，若票数相等则维持下级法院所做的判决。

**书写意见.**在会议中达成暂时裁定后，下一步是将法院意见指派给一名大法官。如果首席大法官投的是多数票，则由他本人书写意见或指派一名投多数票的大法官为之。当首席大法官投的是少数票时，则由多数票者中最资深之大法官进行指派。

会后，负责书写意见的大法官开始起草意见书，其它法官可能会撰写替代性的意见书。完整的意见书在投多数票与投少数票大法官之间传阅。意见书作者希望说服原本投少数票的大法官改变心意，同时巩固既有的多数票，协商过程于焉开始。意见书中的措辞可能会改动，好让其它大法官满意或取得他们的支持。发生极度意见分歧时，最高法院很难得出明确、一致的意见，甚至可能导致投票结果变盘，或出现另一名大法官的意见成为最高法院正式判决的情况。

一般而言，虽然大法官们很少全数通过一项裁决，但是多数大法官都能达成单一共识。不赞同最高法院意见的大法官被称为异议。异议不需有附带意见，但是近几年的情况不同。只要有一位以上的大法官抱持异议，每位法官就可能会撰写意见书，或是全体参与撰写单一意见。

有时，大法官同意最高法院的判决，但得<sup>2</sup>结论的理由却不一样。这样的法官可能会撰写「协同意见书」。标示为「协同或异议」的意见书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抱持部份赞同、部份反对的立场。最后，最高法院会发布法庭共同决议(**percuriam opinion**)——一份未经署名的意见书，通常很简短。这类意见通常于最高法院受理案件复查但不加以完整审理时使用。例如，最高法院可能裁决某案件不需口头辩论，直接颁布一份法庭共同决议来说明对该案的处置。

## 美国上诉法院

虽然和最高法院相比，上诉法院获得的媒体注意较少，但上诉法院对美国的司法体系很重要。由于最高法院每年完整审理的案件只有 **80 到 90** 件，上诉法院显然是联邦法院体系中大多数上诉的最后手段。

## 巡回法院：1789-1891

1789 年司法条例创立了三个巡回法院(上诉法院),各由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一名地方法官组成。巡回法院每年在区内各地有两次庭期。巡回法院的工作量主要由地区法官负责安排。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随后来到当地参与案件。这项作法旨在将巡回法院的注意力集中在地方而非国家。

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对巡回法院体系感到不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尤其反对强制性的四处巡回。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和华盛顿总统力主减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负担。1793 年国会做了些许改变,更动了巡回法院的组织,只剩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与一名地方法官。1801 年在约翰·亚当斯总统任期结束前,国会将最高法院大法官从巡回审判中移除、批准了对 16 名新巡回法官的任命,并且大幅扩展了下级法院的管辖权。

此举遭到托马斯·杰佛逊新政府的大力反对,国会于是将之撤销。1802 年的巡回法院法案恢复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巡回审判,并扩增了巡回区的数目。不过,该法案允许单一地区法官主导巡回法院。这改变看似微小,事实却证明其重要性。渐渐地,地方法官开始承担地区与巡回法院双边的责任。因此,初审与上诉权实际上皆由地方法官所掌握。

直到 1869 年国会通过了任命九位新巡回法官的授权措施并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巡回法院庭期改为每两年一次,上诉法院才进入下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尽管如此,因为向最高法院上诉之权力并无限制,最高法院仍涌进了大量案件。

### 上诉法院：1891 年迄今

1891 年 3 月 3 日,伊瓦兹法案(Evarts Act)签署通过,设立了名为上诉巡回法院的新法院。这些新的法庭旨在受理来自地方法院的大部分上诉。自 1789 年起存在的旧巡回法院仍然保留。新的上诉巡回法院是由一名巡回法官、一名上诉巡回法院法官、一名地方法官,以及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所组成的。这些新法院的法定最低法官数是两位。

伊瓦兹法案通过后,联邦司法制共有两种审判庭:地方法院和巡回法院。同时也有两种上诉庭:上诉巡回法院和最高法院。法案也允许最高法院直接复审某些案



子，但大部分的裁决仍归于上诉巡回法院。简言之，上诉巡回法院的设立让最高法院免于审理各类琐碎的案子。虽然仍可上诉，但是最高法院现已较能控制其工作量。之前相当多的案件数因此也转给了下两个审级的联邦法院。

上诉法院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发生在 1911 年，当时国会通过立法废除没有上诉管辖权且经常与地方法院功能重迭的旧巡回法院。

现今，中级上诉庭的正式名称为上诉法院，但口头上仍被称为巡回法院。现有 12 个地区上诉法院，配有 179 名经授权的上诉法院法官。在巡回范围内，上诉法院负责复审来自联邦地方法院的上诉案件(以及一些行政机关的案子)。一个特殊的上诉法院于 1982 年诞生，当时国会建立了联邦巡回司法区(Federal Circuit)，一个司法而非地理上的巡回法院。

### 上诉法院的复审功能

大上诉法院复审的案件大多来自联邦地方法院。对下级法院判决不满的诉讼当事人可向联邦地方法院所在地的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也有权复审部分行政机构的决定。

上诉法院无权控制受理的案件是哪些，因此例行与极重要之事务都是他们处理的对象。光谱的一端是无关紧要或不可能成功的琐碎上诉案件，光谱的另一端则是会挑起公共政策重大问题并引起强烈反对声浪的案件。上诉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判决很可能为整个社会树立政策，而不只是为了特定诉讼当事人而已。公民自由、重新分配、宗教，以及教育案件这类纠纷，都可能影响所有公民。

上诉法院中的复审有两个目的，一是错误修正，各巡回法院的法官因应请求监督联邦地方法院与联邦机构的表现，并指导他们对全国性法规与州法的运用与解释。上诉法院不必寻求新事证，只要检验下级法院的纪录有无错误即可。在错误修正的同时，上诉法院平息了争议和执行了国家法令。

第二项功能是挑出并发展值得最高法院复审的少数案件。巡回法院法官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更早处理法律议题，可能也会针对他们认为值得复审的案件进行初步筛选。司法学者发现，上诉案件的第二次审理通常不同于第一次。

## 上诉法院作为决策者

最高法院的决策者角色来自于它解释法律的事实，上诉法院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由于上诉法院是绝大多数案件的最后解决方式，其作为决策者的角色更显重要。

以下举第五巡回法院所做的裁决为例，说明巡回法院法官的广大影响力。有好几年的时间，德州大学法学院(以及全美多所法学院)优先接受非裔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入学申请，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注册人数。此项作法在联邦地方法院遭到质疑，理由是造成对白人与其它少数民族申请人的差别待遇，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1996年3月18日，第五巡回法院的法官小组在侯普伍德诉德州(Hopwood v. Texas)一案中裁定，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不允许学校采取此种差别待遇，下令法学院不可将种族列为入学申请之考虑因素。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该案移审令的请求，从而将这个案子留给第五巡回法院所涵盖的德州、路易斯安那州，以及密西西比州之法律去解决。就技术上来说，真正受到这项判决影响的只有第五巡回法院辖内的学校，但是《国家律师期刊》(The National Law Journal)的社论另有看法。该社论指出，虽然有人「可能认为侯普伍德一案的影响范围只限于南方的三个州...，事实上，全美法学院(与其它学院)的院长因为担心发生类似诉讼，于是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反歧视行动的替代方案。

## 上诉法院的运作

最高法院有权决定是否受理案件，但上诉法院没有。尽管如此，巡回法院的法官还是发展出一套方法尽可能有效利用时间。

**筛选** 上诉法院的法官们在筛选阶段决定是否完整复审上诉案件或以其它方式处理。受理的案件量可能因为类似的上诉被合并为单一案件而减少。上诉法院愈来愈需要法官助理与法院雇用的专职律师来决定哪些案件不需口头辩论，这些法院

人员审阅申请书与摘要并向法官提交建议。因此，许多案件的处理皆未经过口头辩论阶段。

**三人法官小组**获得完整处理的案件一般是由三人法官小组而非巡回法院的全体法官来审理。这意谓着不同的三人法官小组可以同时，通常在巡回区内的不同城市，开庭审理多个案件。

**全院会审的诉讼程序**有时，同一巡回区不同的三人法官小组可能会对相似案件会做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为化解这类冲突并促进一致同意之达成，联邦成文法规定了「全院会审」(**en banc**，古法文，意指法官席)程序，让巡回法院的所有法官齐聚一堂裁决案件。这项一般性规定唯独不适用于大型的第九巡回法院，因为该院的全院会审小组通常由 11 名法官所组成，召集所有法官过于麻烦。如案件涉及极重要议题时，也可以采用全院会审程序。审查阶段，法官决定是否完整复审上诉或是以其它方式 处理。诉讼记录多少还是会由于部分上诉被合并为单一案件而减少。决定哪些案件不需口头辩论时，上诉法院愈来愈需要法官助理与专职律师，这些法院职员研读申请书与 诉讼，并向法官提出建议。因此，许多案件处理时都没有口头辩论阶段。

**口头辩论**通过审查程序且诉讼各方尚未和解之案件将排入口头辩论。双方律师各有简短的时间(只有十分钟)讨论书面陈述中的要点和回答法官问题。

**判决**口头辩论后，法官可能会进行简短协商，若意见一致则立即宣布判决，否则法官将于进一步讨论后再行宣判。会后，有些判决会以简短命令或法庭共同决议意见的形式宣布，少数判决会附带篇幅较长且经过签署的意见书，甚至还有协同意见和异议。虽然巡回法院各自有不同作法，但是近几年已较少公布意见。

## 美国地方法院

美国地方法院代表联邦司法体系的案件受理起点。即使有部分案件后来上呈至上诉法院甚或最高法院进行审理，多数的联邦案件却从未超越美国初审法院的审级。单就处理案件的数目而言，地方法院是联邦司法体系中负担最重的，然而其重要性却不仅在于处理大量案件而已。

## 第一个地方法院

国会于 **1789** 年通过司法条例时决定设立全国性的联邦初审法院体制。该条例第二项使当时美国的 **11** 个州各成一区，并将麻萨诸塞州与维吉尼亚州中的一部份划分出来(后来变成了缅因州与肯塔基州)，从而建立了 **13** 个地方法院。这种组织化的结构树立了尊崇各区州界的惯例，此惯例现今依然存在。

## 第一批地方法院法官

每个联邦法院都由居住于当地的一位法官所执掌。此事一经公开，华盛顿总统随即收到许多个人的来信，表示希望获派担任各区法官职务。许多人要求国会成员或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将他们举荐给华盛顿总统。私下的申请不一定能成功，也不是唯一获得总统注意的途径。例如，哈利·英尼斯(**Harry Innes**)并未申请肯塔基州的法官职务，却在在该州国会成员推荐下获得职位。

当新的州加入美国时，地方法院也增加，再加上辞职的人数，给了华盛顿机会提供法官职位给 **33** 个人。他所任命的法官都是司法界的成员，除了其中七人，其它都有州或地方的法律经验，包括法官、检察官，或检察总长的资历。后来的总统也继续指派有公共服务背景的律师担任联邦法官。

## 现今的地方法院组织

随着国家发展，新的地方法院也随之建立。最后，国会开始将部分的州分为不只一区。加州、纽约，以及德州最多，各有四区。除了对州界一贯的尊重之外，地区的组织似乎未依合理的计划进行，各区的大小与人口差异甚大。多年来，哥伦比亚特区增加了一个法院，多个未正式成州的地区也设有地方法院。现在美国的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关岛、波多黎各、维京群岛，以及北马里亚纳群岛都设有地方法院。

最初的地方法院一院指派一名法官。随着人口与诉讼的增加，国会必须定期增加在大部分地区的法官名额。**1990** 年的联邦法官法案设立了 **74** 个新的地方法院法官职位，使目前总数达到 **649**。现在各地区都有一名以上的法官；纽约南区(包

括曼哈顿与布朗克斯)目前有 **28** 名法官，人数居各区之冠。联邦地方法院一般由一位法官执掌，因此一个地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庭在开。

## 地方法院是初审法院

国会将地方法院设为联邦司法体系的初审法院并给予几乎所有案件的初审权。律师只能在联邦法的地方法院询问和交叉盘诘证人，事实的纪录因而是在这个审级的法院建立的。对初审法院判决的后续上诉以修正错误而非重建事实为重点。

认定案件事实的任务通常交由陪审团负责。所谓的陪审团，是指来自同一社群、担任公正的事实仲裁者，并将法律应用在事实上的一群公民。宪法第六修正案保障了陪审团审判刑事案件的权利，相同的权力在第七修正案则为民事案件。不过，这项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成为案情疑点与法律事务的仲裁者。这样的审判称为法院自行裁定。

与联邦地方法院有关的陪审团有两种类型，大陪审团是被召集来认定是否有足够罪嫌相信某人犯下被指控之联邦罪行的一群男女。大陪审团员定期集会以听取检方提出的指控。小陪审团员以随机方式选出，以听取证据并决定被告在民事审判中是否需负责，以及在刑事审判中有罪抑或无罪。联邦法规定刑事案件需要 **12** 名陪审员，但允许民事案件可以有较少的陪审员人数。联邦地方法院的民事案件通常使用六人陪审团。

一般认为初审法院主要参与规范执行，而上诉法院有更多制定决策的机会。规范执行与司法实施密切相关，因为所有的国家皆会发展对于一个公正而井然有序的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标准。社会规范体现于成文法、行政法规、判例，以及社群传统。例如，刑事成文法将可接受与不可接受之行为的概念纳入法律。裁量涉嫌违反此法之案件的法官，等于正在落实规范的执行。由于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通常无法脱离法律与程序规定的严格限制，因此很少有能制订或发展新政策的机会。民事案件的情形也一样，法官通常被局限于规范的执行，这是因为这类诉讼通常因私人纠纷而起，其结果只涉及诉讼当事人的利益。

然而，地方法院也扮演决策的角色。由于美国人的诉讼意识日益高涨，过去私下解决的事情现在很多都交由法院裁决。法院审理愈来愈多以往被认为属于私人范畴的案件。这对联邦地方法院而言，意味着什么？根据一项研究，「这些司法参与的新领域往往相当缺乏清楚、精确的上诉法庭与立法方针；因此，初审法院的法官有大好的机会可以写下全新的一页，也就是制定政策。」

## **宪立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与法立法院(Legislative Court)**

1789 年的司法条例设立了今日既存的联邦法院体系三层级。然而，国会依据宪法第 3 条和第 1 条，定期行使其权力设立其它联邦法院。根据宪法第 3 条设置的法院称为宪立法院；根据宪法第 1 条设置的法院则是法立法院。最高法院、上诉法院，以及联邦地方法院都属于宪立法院。法立法院则包含美国军事上诉法院、美国税务法院，以及美国退役军人法院。

和宪立法院不同，法立法院除了司法职责之外，通常也拥有行政和准立法职责。另一不同之处，在于法立法院通常是为了执行特定的国会成文法此一明确目标而设立的，而宪立法院则是为了解决诉讼而设置的。

最后，宪立法院与法立法院脱离其它两政府部门的独立程度也有所差异。宪法第 3 条(宪立法院)规定法官一定期间内行为良好可继续任职，相当于获得终身任期。由于宪法第一条(法立法院)并没有保障法官良好行为的任期，国会可以针对该职务设定一定的任期。总而言之，宪立法院独立于其它两政府部门的程度高于法立法院。

## **联邦司法部的行政与幕僚后援**

即使法官在司法体系中的角色最为鲜明，背后其实有着大批的后援团队。法官不擅长、不适合，或根本无暇处理的业务，他们一手包办，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支后援团队中的部份成员，例如法官助理，可能为特定的某位法官工作，部份成员——例如治安法官——则奉派至特定法院任职，其它的成员则可能受雇于整个司法体系服务的各个机构(例如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局)。

## 美国治安法官

为协助联邦地方法官处理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国会于 **1968** 年创设了一个治安法官制度，以因应各地方法院的特殊需求与情况。治安法官由地方法院法官任命，任期为八年，但可能基于「充分的理由」在期满前遭到免职。各地方法院法官依据国会的方针订定治安法官的职务与责任。法令准许治安法官在相关当事人同意下主持有陪审团或无陪审团的民事案件并判决案件，也准许他们在被告同意之下审问被控于该地区犯下轻罪(严重程度低于重罪的犯罪行为)的人。不过，是否将责任委派给治安法官是由地方法官定夺的，因此，治安法官在案件程序中的参与度可能低于成文法的规定。

## 法官助理

美国最早使用法官助理的法官一般认为是麻萨诸塞州的哈瑞斯·格雷(**Horace Gray**)。在 **1875** 年夏天，当时他担任麻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并自费雇用了优秀的哈佛法学院应届毕业生。每年他都从哈佛雇用一名新法官助理。格雷于 **1882** 年奉派至美国最高法院时带了一名法官助理赴任。

格雷大法官在最高法院的继任者奥立佛·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也仿效每年雇用一名哈佛法学院荣誉毕业生担任助理的做法。前耶鲁大学法律教授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担任首席大法官时，每年都得到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推荐的一名助理。于 **1925** 年加入法院的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哈伦·史东(**Harlan Fiske Stone**)也有每年雇用一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的惯例。

自此以后，联邦法院使用法官助理渐成惯例。现在联邦法官有两千名以上的助理，担任破产法官和治安法官助理者则超过六百人。除了个别法官雇用的助理之外，所有上诉法院与部分地方法院也雇用专职的法官助理，为整个法院工作。

法官助理的职责视其所共事之法官的偏好和法院类型而有差异。联邦地方法官的助理通常主要担任研究助理的工作，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研究民事与刑事案件中的各请求领域。他们审查每件请求，注意其中的议题，以及相关当事人采取的立场，接着探究请求中提出的要点，并为法官准备备忘录。他们参与诉讼过程的初期阶

段，因此可能和律师与证人有相当多的接触。这个层级的法官助理可以参与法官意见的初拟。

在上诉法院，法官助理透过对法律议题和上诉提出之事实的研究参与案件。上诉法院没有最高法院接受或拒绝案件的选择权，因此会使用某些筛选办法来区别可快速解决的案件和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的案件。法官助理即是这筛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些案件会排定口头辩论，由法官助理协助法官作准备。在口头辩论之前不一定能深入分析上一审级的法官纪录。上诉法院的法官能做的，通常只是浏览助理预先从纪录中整理出来的大部份重点。

上诉法院一旦做出判决，法官助理经常参与撰写伴随着判决而来的命令。助理一般会先依据法官的判决草拟初步意见或命令。法官可能也会要求助理编辑或确认法官意见所引用的判例(指涉法院意见书或辩论中的成文法、先例，或法律教科书)。

最高法院法官助理的工作大致上和其它上诉法院的助理类似。就大法官决定该审理哪些案件而言，从旁协助的法官助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1972**年，依据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二世(Lewis F. Powell, Jr.)的建议，大多数国会成员开始参与「certpool」—由大法官召集助理、分派所有档案，并请每位参与者传阅个别助理的移审令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将案情、所提出的法律问题，以及建议的行动方案 — 也就是案件是否应经过完整审理、否决，或不受理 — 做一总结。

大法官们一旦投票决定审理，大法官助理就像上诉法院的法官助理一样，会准备大法官在口头辩论时可能用得上的法官备忘录。最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理也像上诉法院的助理一样，会协助大法官草拟意见。

## 美国法院行政局



整个联邦司法体系由美国法院行政局所管理。自 **1939** 年创立以来，从分配预算到与其它政府机构协商联邦大楼的法院使用空间，以及维持法务人事纪录与收集联邦法院案件数据等事务，皆由该局处理。

行政局也替联邦司法体系的中央行政决策组织「美国司法会议」服务。除了提供统计资料给该会议的各委员会之外，行政局也充当交予司法会议之数据和提议的接收处和数据交换处。行政局还担任联邦司法体系与司法会议的沟通者，也是司法部与国会、行政部门、专业团体，以及一般大众往来的窗口。尤其重要的是，行政局(以及相关的法官)在国会扮演着代表性角色，负责提出司法预算案、请求额外的法官职务、建议改变法院规定，以及其它关键措施。

## 联邦司法中心

联邦司法中心于 **1967** 年成立，是负责进修教育与研究的联邦法院机构。其职责大致分为三类：指导针对联邦法院的研究、提出建议以提升联邦法院的行政与管理，以及为司法部门的人员开发教育与训练计划。

自成立以来，联邦司法中心所提供的训练课程与其它教育计划中便持续造福法官。近几年，治安法官、破产法官，以及行政人员都上过教育课程。联邦司法中心广泛使用录像节目或卫星科技，使大众都能与之接触。

## 联邦法院工作量

联邦司法共有三个审级的法院，包括美国地方法院、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工作量都非常重。

以 **2002** 年会计年度为例，联邦地方法院处理的案件就超过 **34** 万件。单就刑事诉讼而言，自 **1993** 年以来已增加了四成三。

以 **1995** 年为例，其中一个地区巡回法院的上诉案件就有 **50,072** 件，而且数字逐年增加。到了 **2003** 年，已有 **60,847** 件。不过，上诉法院所终结的案件数也呈稳定增加，从 **1995** 年的 **49,805** 件到 **2002** 年的 **56,586** 件。

从历史纪录来看，最高法院的案件量很大；**2002** 年的开庭期纪录上共有 **8,225** 个案件。不过，因为最高法院有权决定哪些案件值得该院全心关注，多年来在最高法院辩论的案件已呈现显著下降。在 **2002** 年开庭期间，只有 **84** 宗案件开庭辩论，有 **79** 个案件以 **71** 个签署意见方式解决。

## 第二章

### 州司法体系的历史与组织



州法院处理的案件远远多过联邦法院裁决的案件。此图画中描绘的是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大楼。 . (Courtesy Florida Supreme Court Historical Society, Tallahassee)



律师爱德华·克兰西(Edward Clancy)在他所属的州的终审法院(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院)辩论案件。 (AP/WWP)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和其它州的终审法院一样遵循与美国最高法院相似的程序。

图中，辩方律

师罗杰·亨可(Roger Hunko)在一桩谋杀案件审判的量刑阶段作总结辩论。

(AP/WWP)



纽约州与马里兰州称其最高法院为「上诉法院」。图中由左到右分别为纽约州上诉法院法官乔治·史密斯(George Bundy Smith)、首席法官茱蒂丝·凯伊(Judith S. Kaye)，以及法官霍华·列文(Howard A. Levine)，他们正在听取一桩死刑案的辩论。(AP/WWP)



州法院一年处理的案件有数百万宗之多，有时案件是在像西维吉尼亚州马丁堡的伯克利郡法院这样的机构中审理的，有些人称这样的机构「富有历史意义」或「迷人」，有些人则认为它「不完备」。(AP/WWP)

早在邦联条例与 **1787** 年制订宪法之前，作为主权实体的各殖民地即已制订宪法。因此，州法院体制的发展可从殖民地时代追溯至今。

## 州法院的历史发展

就法院组织而言，没有两个州是完全相同的。各州可自由采行属意的任何组织结构、设置的法院数量、随意决定法院名称，并且建立该州认为合适的司法体系。

因此，州体制不一定近似于联邦明确的三审级制。例如，联邦体制的初审法院称为地方法院，上诉法院则称为巡回法院，但却有超过 **12** 州的巡回法院是初审法院，在其它一些州，最高法院是指主要的初审法院。也许最为人不解的情形是在纽约 — 该地的初审法院被称为最高法院 。

虽然州法院组织有诸多费解之处，其重要性却毋庸置疑。由于成文法在各州比在联邦体系涵盖的范围更广，从最基本的私人关系到最重要的州公共政策都涵盖在内，因此州法院处理的案件类型极多，而每年向州法院提出的诉讼案件数远高于联邦法院所判决的案件数。

## 殖民时代

在殖民时代，政治权力集中在英王指派的总督手中，由总督履行行政、立法与司法功能，因此不需要严密的法院体系。

殖民地司法体系的最低层级由称为治安法官的地方法官所构成，其人选则由殖民地总督指派。系统的再上一层级是郡法院，即殖民地的一般审判庭。对任何法院判决的上诉全部由最高层级 — 总督与其议事会 — 审理。大、小陪审团也在这时期出现，直到今日仍是州司法体系的重要特色。

**18** 世纪初，法律专业已开始改变。自英国律师学院结训的律师愈来愈多，因此，殖民地法院程序慢慢被复杂的英国普通法所取代。

## 早期州法院

美国独立革命(**1775-83**)之后，政府的各项权力不只由立法组织所接管，而且也大幅减少了。许多前殖民地居民基于对律师与普通法的不信任，因此不希望发展一个强大、独立的司法体制。各州议会严密监督法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判决的不满，还会撤换法官或废除某些法院。

当法院宣布立法行为违宪时，对法官的不信任也日益高涨。州议会与法官之间的冲突，通常是由利益不合所引起的，而且越演越烈。国会议员似乎偏向支持对债务人有利的政策，而法院通常反映了贷方的观点。两者之间的各项差异是很重要的，因为「由于立法机构与司法权之间的冲突...法院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机构，」戴维·纽鲍尔(David W. Neubauer)在《美国法院与刑事司法制度》(America's Court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如此写道。

## 现代州法院

从南北战争(1861-65)到 20 世纪初，州法院为其它问题所扰。日益高升的工业化程度和都市地区的快速成长催生了新型态的法律纠纷，法院案件也变得更费时、复杂。当初以处理乡村、农业社会问题为方向所设计的州司法体系在努力调适的同时，也面临了案件积压的危机。

处理办法之一是建立新的法院来应付增加的案件量。通常，法院是层层上送的。另一个策略是增加对某地理区域有司法管辖权的新法院。还有一个办法是设立特别法院来处理特定案件。例如小额赔偿法院、少年法院，以及家事法院都明显增加了。

为满足特定需求，州与地方法院在泰半未经规划的情况下扩张，导致了许多人口中所谓的分裂状况(fragmentation)。然而，审判庭的多样和重复性只是分裂的一个面向。许多法院的司法权限范围狭小，而且各种法庭间的司法管辖权往往是重迭的。

20 世纪初，人们开始表达对州法院体系分裂的不满。应运而生的改革计划通常被称为法院统一运动(court unification movement)。第一位表明支持法院统一的知名法律学者是哈佛法学院院长罗斯科·袍德(Roscoe Pound)。袍德等人呼吁将初审法院整并为一或两套法院系统，由其中一个系统审理重要案件，另一个则处理次要案件。

法院整并也引起相当多反对声浪。许多几乎天天都进法院的诉讼律师因为已经习惯了既有的法院组织而反对改变。此外，法官与其它法院相关人士有时也反对改革。他们的反对通常是出于恐惧——怕被转调到新法院、怕必须学习新程序，或怕必须裁决自己专业领域外的案件。于是，法院统一运动的成效不如许多人的预期，另一方面，倡议法院改革者则在某些州取得了胜利。

## 州法院组织

有些州已迈向统一法院系统之路，有些州则仍运作着司法权限重迭的复杂法院体系。州法院可分为四大类或审级：有限管辖权的初审法院、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中级上诉法院，以及终审法院。

### 有限管辖权的初审法院

司法权有限的初审法庭每年处理美国大部份的诉讼案件，所有法院中大约九成都属这类法院。他们有各种名称，以下列出较为常见者：治安法院法官、治安法院、市法院、郡法院、少年法院、家事法院，以及都会法院。

这些法院的权限只及于次要案件。例如，在刑事案件方面，州法院审理三种层级的违法行为：违法(最轻微)、轻罪(较严重)，以及重罪(最严重)。有限管辖权的初审法院处理违法与轻罪，可能只处以金额有限的罚鍰(通常不超过 1,000 美元)和入狱(通常不超过一年)。在民事案件中，这些法院通常限于某些金额以下(例如 500 元美金)的纠纷。此外，上述初审法院审理的案件类型也只限于交通违规、家事，或有少年涉入的案件等。

和一般审查权初审法院的另一项差异是，在许多情况中，管辖权受到限制的法院并非正式纪录的法院。既然程序无纪录，对这类法院判决的上诉通常都提交给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称为重新审理(**denovo**，意即「新审判」)。有限管辖权的初审法院还有另一项特点——主持这类法院的法官通常不需经过任何正式的法律训练。

这类法院往往缺乏资源，通常没有固定的审判室，而是在杂货店、餐厅，或是私人住所开会。由于法官助理人数不足，所以没有详细的会议纪录，其结果则为非正式程序和以量为基础的案件审理。完整审理的案件很少，而且处理的速度也很快。

最后，某些州利用有限管辖权的初审法院来预审重大刑案，包括进行传讯、定保释金、替贫穷的被告安排律师，以及进行预审等，再将案件转给对于例如听取抗辩、举行审判，以及判决等事务拥有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

### **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

多数州都有审理较严重的刑事与民事案件的主要初审法院体系。此外，在许多州，特殊种类的案件——例如少年刑事犯罪、家事案件，以及遗嘱认证——都交由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审理。

在大部分的州，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也有上诉功能，受理来自于有限管辖权初审法院的某些种类的上诉案件。这些上诉案件通常在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进行重新审理或审理。

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通常分为管辖区或巡回区。各州的执行状况不一，其通则是利用现行政治界线，例如一或数个郡，设置管辖区或巡回区。在乡村地区，法官可能依照固定时间表在一区的各个地点巡回审判和开庭；在城市地区，法官则是全年都在规定的地点开庭。在较大的郡，法官们可能被分成不同的专门领域，有些法官只审理民事案件，有些则专门审理刑事案件。

这个审级的法院有各种名称，最为普遍的是地方、巡回，以及最高法院；法律规定，此审级的各州法官皆需拥有法律学位。这些法院是纪录法院，所以设有书记方面的人手。

### **中级上诉法院**

对于州司法领域来说，中级上诉法院算是较新的成员。**1911** 年，这类法院只有 **13** 个；到了 **1995** 年，已有 **39** 个州设置中级上诉法院。其基本目标是减轻州最高法院的工作量。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法院被称为上诉法院，不过偶尔也会使用其它名称。大部分的州拥有一个管辖权遍及全州的上诉法院。各州中级上诉法院的规模不同，例如阿拉斯加的上诉法院只有三名法官，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德州，有 **80** 名上诉法院法官。在某些州，中级上诉法院采取全院法官会审(enbanc)，其它州则采取固定或轮流方式。

## 终审法院

每个州皆有一个终审法院。俄克拉何马州与德州则有两个最高法院，各自的管辖权分别限于民事上诉案件和刑事上诉案件。大部分的州将该州最高审级的法院称为最高法院；其它名称还有上诉法院(马里兰州与纽约州)、司法法院(缅因州与麻萨诸塞州)，以及最高上诉法院(西维吉尼亚州)。终审法院的法官(有些州称为大法官)人数从三人到九人不等，通常于州首府(虽不必然如此)以全院联席方式审案。

最高法院拥有州法相关事务的管辖权，也是这类事务当然的最后裁决者。在设有中级上诉法院的各州，最高法院的案件主要来自于该州的中级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通常有权决定复审哪些案件，因此，很可能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处理涉及该州重要政策的议题。在没有中级上诉法院的各州，案件通常是以强制复审的方式交给州最高法院审理。

在多数情况下，州的终审法院类似于美国最高法院，因为两者都有很大的裁量权，可自行斟酌要特别关注哪些案件。大部分的州最高法院遵循的程序和美国最高法院相似，也就是说，当一个案件获得审理时，双方当事人会提出诉讼书并于其后进行口头辩论。接着，在作?判决后，法官会发布意见书说明判决。

## 少年法院



美国人愈来愈重视涉及少年的案件的处置方式，各州响应这个问题的方式各异。有些州建立了遍及全州的法院网络，专门处理少年相关事务。罗得岛与南加州则设有家事法院，处理家庭事务和少年相关事务。

最普遍的方式是授权让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有限管辖权法院或一般管辖权法院处理少年相关案件。以亚拉巴马州为例，巡回法院(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有权管辖少年事务，而在肯塔基州，只有有限管辖权的初审法院—地方法院 — 有权管辖少年事务。

最后，有些州会将少年管辖权分配给一个以上的法院。科罗拉多州在丹佛市设有少年法院，该州其它地区管辖少年事务的权力则交予地方法院(一般管辖权的初审法院)。

此外，关于管辖权何时属于成人法院的议题，各州也有不同的看法。各州制订了被告在成人法院受审的标准年龄。此外，许多州还规定若状况特殊，更年轻的违法者要在成人法院接受审理。以伊利诺伊州为例，少年管辖权转交给成人法院的标准年龄为 **17** 岁，然而，在一级谋杀罪、严重的刑事性侵害、武装抢劫、持枪抢劫，以及在校园不法使用武器的情况，年龄限制则降至 **15** 岁。

## 州司法制度中的行政与幕僚支持

联邦法院的每日运作需要许多人员与各组织的努力。州法院系统也是一样。

### 地方法官

州地方法官，在某些州又称为行政长官或仲裁人，通常处理民事与刑事案件过程中的初期工作。在这方面，他们和美国治安法官相似。在某些管辖区域里，州地方法官举行联合审讯并主导刑事案件初步调查。他们在某些州也有权判决次要案件。

## 法官助理

州法院很可能有法官助理，如果有，也只限于中级上诉法院和终审法院而已。大部分的州初审法院都不用法官助理，有限管辖权的地方初审法院根本不曾出现这样的人员编制。就像在全国性层级一样，有些法官助理为个别法官服务，有些则是受雇为整个法院服务的专职律师。

## 法院行政管理局

各州都设有一个法院行政管理局或名称类似的机构替州法院体系处理各类行政事务。行政管理局最常执行的业务包括预算编列、数据处理、设备管理、司法教育、公共信息、研究，以及人事管理。在少数几个州，少年与成人的缓刑和替代性的争议解决方案也是行政管理局的责任。

## 法官助理与法院行政人员

传统上，法院助理负责处理法院每日例行事务，包括安排法院审判室、案件程序纪录、准备法院诉讼的命令与判决、收取法院罚金与费用，以及支付司法款项等。在大多数的州，这些官员是经由选举产生的，人们可能以其它头衔称呼他们。

在许多领域，传统的法官助理皆已为法院行政人员所取代。现代的法院行政人员和传统上管理特定法庭运作的法官助理不同，他们可能会协助审判长管理整栋法院大楼。

## 州法院的工作量

美国绝大多数的司法事务存在于州层级而非国家层级。联邦法官一年判决几十万宗案件的事实令人折服；即使最重大的案件皆由联邦审级处理，州法院一年处理数百万宗案件的事实仍令人称奇。州层级的治安和州地方法院处理的是相当次要的案件，部份最重大的民事案件则由一般的州初审法院陪审团进行判决。

州法院国家中心汇编了各州终审法院与中级上诉法院在 **1998** 年的承办案件数。向州上诉法院提出的强制案件与自由裁量诉状总计共有 **261,159**。在向州初审法院提出的案件数方面，就比较难取得可靠的数据。尽管如此，该中心仍然成功追踪了州初审法院的数据。**1998** 年，在一般审判权法院和有限审判权法院提出的案件共计 **17,252,940** 宗。就像联邦法院的情况一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事案件，不过受到最多报导的通常是刑事案件。

### 第三章

#### 司法管辖权与决策之界限



自最高法院对贝克诉卡尔(Baker v.Carr)案(1962 年)的判决开始，最高法院在多宗案件中表明选区的人口数应该相等，而法院也应监督这项命令的执行。图中，北卡罗莱纳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莎拉·帕克(Sarah Parker)在开庭处理选区重新分区(或言分配)时端详着一份地图。(AP/WWP)



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最高法院之上诉法院的法官们聆听声请辩论。纠纷必须是真实且进行中的，法院才会同意受理。(© Syracuse Newspapers/Carl J.

*Single/The Image Works)*



巡回法院对于联邦审判庭的民事上诉拥有上诉管辖权，例如 2000 年的一个案件中，美国第 4 巡回上诉法院被要求推翻一联邦法官之裁决，该判决裁定采矿业停止在阿帕拉契山采矿。 (*AP/WWP*)



巡回法院亦可审理部份联邦行政机关的上诉。图中两只年幼的墨西哥斑点猫头鹰不知道有个叫做奥杜邦协会 (*Audubon Society*) 的环保团体提出了一项与其物种栖息地有关的诉讼。 (*AP/WWP*)



国会表示，联邦地方法院有联邦民事与刑事案件的管辖权。照片中，司法部首席检察官戴维·波伊斯(David Boies)(左立者)和康乃迪克州检察总长理查德·布卢门萨尔(Richard Blumenthal)(右立者)正与媒体讨论微软窗口 98 一案。。 (AP/WWP)

在设置法院管辖区域时，国会和美国宪法 — 以及各州议会和州宪法 — 规定了每个法院可受理的案件类型。本章讨论(特别是)国会如何透过重新定义法官可受理之案件类型的方式影响司法行为；也探讨司法自制，并检验源自于法律传统和宪法与成文法，以及主宰法官复审一个案件与否之决定的十项原则。

## 联邦法院

联邦法院系统分为三个审级：初审法院、上诉法院，以及美国最高法院。

### 联邦地方法院(U.S. District Court)

国会已经订定了联邦地方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这些法院有联邦刑事与民事案件之初审管辖权；意即，无论当事人是谁或议题有多重大，依法这些案件必须由联邦地方法院进行初审。

## 刑事案件

当地方上的联邦检察官有理由相信发生了违反美国刑法的行为，刑事案件于焉诞生。在取得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后，联邦检察官在个人所服务的地方法院对被告提出指控。国会定义的刑事活动涵盖了范围广泛的各种行为，包括州际汽车偷窃、非法输入毒品、刺杀总统、密谋剥夺个人公民权，甚至捕杀非当季候鸟。

向被告提出指控后若无认罪协商，地方法院便开始进行审理。在法院，被告享有权利法案所保障之一切特权与豁免权(例如迅速暨公开审判的权利)，或国会立法或最高法院裁决所保障的一切权利(例如 12 人小组陪审团必须提出全体一致的裁决)。被告可以放弃参加由同侪陪审团作出判决之审判的权利。被告被判无罪后便获得释放，此后不会再因为同一桩罪行受审(第五修正案禁止重复追诉)。若被告被判有罪，地方法官会在国会规定的范围内裁量适当的刑罚。只要是在规定的范围内，刑期长短就不可以再上诉。政府也许不能上诉陪审团的无罪裁决，但若被判有罪的被告认为法官或陪审团做了不当的法律判决，则可上诉。

## 民事案件

民事案件民事案件，也就是私人当事人之间或与美国政府(以不起诉的身份)之间的诉讼，占了地方法院案件量的绝大部份。源于美国地方法院的民事案件可分为几类。第一类与宪法的解释与应用、国会法案，或美国条约之诉讼有关。这类案例包括：请愿人声称联邦法保障的其中一项民权遭到侵害、诉讼人宣称受到违宪之国会成文法所伤害，以及原告主张因为条约之不当影响而蒙受损害。重点是必须提出联邦问题，联邦初审法院才拥有管辖权。

传统上，有些类型的案件必须涉及特定最低金额的争议初审法院才会受理，但在几种普通类型的案件中则另当别论。例如，涉嫌违反民权法的案件，例如 1965 年的选举权法案，必须由联邦而非州法院审理。这类型的其它案件还包括专利与著作权的请求、护照与归化程序、海事法与海事纠纷，以及违反美国邮政法等。

联邦初审法院行使一般初审管辖权的另一个范围广大的案件类型，包括所谓的不同公民资格(**diversity of citizenship**)的纠纷，也就是发生在不同州的当事人之间或美国公民与外国或其公民之间的纠纷。

若是被定罪的罪犯坚称被监禁(或被拒绝假释)是违反联邦保障的权利，联邦地方法院也拥有这类请求的管辖权。绝大多数这类案件中的犯人都会要求「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一项由法官所颁布、判定监禁或拘留是否合法的命令。法官会要求狱方证明拘留的正当理由，否则就要释放请愿者。在州法院被定罪之犯人必须主张受联邦保护的权利(例如，在受审时由律师代表)遭到侵害，否则联邦法院是没有管辖权的。联邦的犯人上诉范围较为广，因为他们的所有权利与选择都在美国宪法范围内。

最后，联邦地方法院有权审理任何国会可能依法指定的案件。

### **美国上诉法院(U.S. Courts of Appeals)**

美国上诉法院没有任何初审管辖权；交由这些中级陪审团的每项案件或纠纷事先都在其它法庭辩论过了。美国上诉法院就和联邦地方法院一样，是由国会所创造的，其结构与功能从过去至今已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基本上，国会允许巡回法院有两种一般种类案件的管辖权。一是来自于联邦初审法院的一般民事与刑事上诉。在刑事案件中，上诉人是被告，因为政府不能随意上诉一项无罪的裁决。在民事案件中，于初审法院输的一方当事人通常是被告，但是赢的一方若对下级法院的判决不满也可上诉。第二个广泛的上诉管辖权类型包括了来自特定联邦行政机关与部门的上诉和来自独立之管制委员会的上诉，例如证券暨交易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局等。

### **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是宪法中唯一提到名称的联邦法院，宪法并说明了最高法院管辖权的大致架构。最高法院常被认为是上诉法院，不过它的确拥有部份初审管辖权，而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两州或数州之间的诉讼。

最高法院在以下这些案件中(与联邦地方法院)共有初审管辖权：外国大使或领事被控或由他们提告的某些案件、美国与一州之间的案件，以及一州控告其它州公民或其它国家公民的案件。在这些管辖权共享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被视为拥有共

同权限。最高法院可初审的案件通常非常重要，但数量上并未占有所有案件的大部分。近几年，最高法院初审的案件占不到受理纪录的百分之一。

美国宪法声明最高法院「依国会之规定...拥有上诉管辖权」。多年来国会已通过多项立法，制定了决定哪些案件能够出现在国家最威严之司法机构的「规定」。向最高法院上诉的途径主要有二。第一，上诉可能来自于所有下级联邦宪法与领土法院以及大多数的联邦法立法院。第二，只要涉及实质的联邦问题，最高法院可以审理来自各州最高审级法院之上诉。

最高法院受理的大部份案件皆为该院同意颁布移审令之案件——此为裁量行为。这类令状(至少必须得到四名法官的支持)是最高法院要求下级法院呈交完整案件纪录给最高法院复审之命令。从历史上来看，最高法院批准移审令请求之案件可说少之又少——通常低于一成，近几年的数量更近乎 1%。

最高法院行使上诉管辖权的另一个方法是认证(certification)。此程序在一上诉法院向最高法院要求针对某一法律问题给予指示时发生。大法官可能选择给上诉法院的法官具约束力的指示，也可能会要求把全部的纪录转交给最高法院进行复审与最后裁决。

## 州法院的管辖权与决策

美国 50 个州的法院系统各自独立，但其架构与国家法院系统几乎相同。每一州都有一套宪法，规定该州初审与上诉法官的职权与决策权。同样的，每个州议会也会通过法令，进一步说明法官的具体权力与优先权以及在州法院兴讼者之权利与责任。由于各州法令与立法组织不同，因此各州法院的管辖权也各异。

州法院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而言相当重要。有九成九以上的司法案件都是州的案件而非联邦案件，而全美九成五的法官都担任州层级的职务。再者，州法官的决策通常对公共政策有重大影响。例如，1970 年代，联邦法院有多起诉讼质疑州花费在学童的教育款项严重不均是否合法。(发生这类情事的原因，是较贫穷的校区无法筹措到与富有校区同等的金额。)诉讼当事人主张贫穷区域孩童是非法歧视的受害者，其为宪法所保障之平等保护权利遭到侵害。然而，最高法院在圣



安东尼奥独立学区诉罗德里格斯案(San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Rodriguez)案(1973 年)中以五票比四票反对这项主张。但至此事情还没结束。许多州接到诉讼案,主张不平等的教育机会违反了各州宪法的多项条款。自罗德里格斯案后,这类诉讼在 **24** 个州被提了 **28** 次。在其中的 **14** 个案件中,州最高法院宣布该州筹措教育资金的方法无效,因此要求将数十亿美金重新分配。

## 管辖权与立法政治

有些法官与司法学者主张美国宪法与各州文件赋予部分重要领域的司法权限某种固有的管辖权,使之不受立法意志的支配。然而,美国法院的管辖权界限也是立法判决的产物——判决通常受到政治的影响。

国会可能会为了达成某项目标而给予法院以往是司法权限禁地的审理权力,让法院受理公共政策领域的案件。例如,国会通过 **1968** 年的民权法案让法官有权惩罚「因其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以及因其曾...于州际通商...游历」而加以妨碍之人。在 **1968** 年之前,法院对于干扰他人旅游权之事件没有管辖权。同样的,国会可能会为了阻止某项社会运动而通过立法,使其拥护者在法院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

州法院的管辖权,就像联邦法院一样,也受到州议会——及其政治产物——之意志的支配。

## 司法自制

法官被禁止或不受到鼓励涉入的活动,与其说和管辖权有关,不如说是与可裁判性(justiciability)有关——也就是司法制度内的法官应否审理或避免审理某些类型的纠纷的问题。以下探讨的十大司法自制原则旨在控制或抑制美国法官的权力。这些准则的来源广泛——包括美国宪法与州宪法、国会与州议会的法案,以及普

通法。有些较适用于上诉法院、较不适用于初审法院；大部分都适用于联邦与各州的司法体系。

## 必须有明确的争议

美国宪法声明「司法权应扩及根据本宪法、美国各项法律，以及根据美国各种权力所缔结之条约...所产生之法律和衡平法中的所有案件」(第 3 条第 2 项)。这项条文的关键词是案件。自 1789 年起，联邦法院即选择照字面诠释「案件」一词的意义：已达诉讼之严格法定标准的合法对手之间必须存有真正的争议。该争议必须涉及有意义且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权利之保障，或直接影响到诉讼当事人之不法行为的预防或赔偿。这项大原则有三项必然结果。

第一，在假设性或未对双方当事人造成真正冲突的情况下，联邦法院不提供咨询意见与裁决。纠纷必须是真实且当前发生的，法院才会同意受理。

第二，诉讼当事人必须有适当资格。这个概念与向法院提出诉讼者之资格有关。提出诉讼者必须曾经遭受(或即将遭受)直接且重大的伤害。一般来说，诉讼者无权代表他人(幼童之父母或是称为集体诉讼的特殊案件除外)。此外，可能的伤害必须个人化且具立即性，而非一般化的抗议。

第三，当基本案情或当事人的状况在提出诉讼之初与法官受理这两个时间点之间有所改变，法院通常不审理已过时(moot)的案件。当一方诉讼当事人死亡或双方停止对抗状态时，大部分的法院都认定该案件已过时。然而，即使案情状况与当事人可能看似已发生根本的改变，法官有时仍可能裁定有进行审理的必要。这类案例包括有人反对州拒绝准许堕胎，或准许关闭末期病患的维生系统。(这类案件中，当案件送达上诉法院时，妇女的小孩可能已出生，而垂死病患可能已经去世。)在这些案子中，法官认为这些议题非常重要，法院必须表态。在实务上，只要宣布这类案件过时，就能不让它们及时得到上诉机构的审理。

虽然联邦法官不裁决抽象、假设性的议题，但许多州法院可以某种形式裁决这类议题，联邦法院可能也会提供咨询意见。而且，美国的法官有权提供确认之诉(**declaratory judgment**)，明确定义各当事人依据成文法、遗嘱，或合约所拥有的权利。确认之诉并不限定任何类型的强制补助。**1934**年的联邦确认判决法案赋予联邦法院采取这项行动的能力，约有四分之三的州赋予其法院这项权力。联邦法院必须避免的抽象纠纷和确认之诉的情况之间虽存有差异，然而在真实世界中，法官很难画这条界线。

### 抗辩必须具体、明确

联邦司法的另一项约束是，除非请愿者能先引用宪法条文作为抗辩基础，否则法官实质上不审理案件。例如，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制订「与宗教组织有关」之法令。在**1989**年，纽约州只为了撒塔玛哈西德派(**Satmar Hasidim**)人士的利益而建立了一个学区。该派由一群来自东欧且强烈抗拒现代社会之同化的哈西迪犹太人(**Hasidic Jews**)所组成。该教派大部分的孩童就读克亚斯乔尔镇(**Kiryas Joel**)的教区学校，但这些私校不收弱智或残障的学生。撒塔玛哈西德派声称，如果这类学生被迫就读公立学校将受到精神创伤。州议会的响应办法是建立一个只有单一学校的特别区，由该校收容来自哈西迪犹太人社区的残障学生。这项做法遭到代表纽约州学校委员会之协会的抗议。**1994**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单一学校学区的建立等于是将政治力量委托给正统派犹太教族群人士，因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政府「宗教组织」的禁令。无论是否所有人都同意纽约法规的合法性，几乎无人怀疑该学校委员会在获得司法复审上不符合标准：宪法明令禁止政府将政治权力委交特定的宗教实体。在上述的案例中，纽约州政府立即承认曾经为了单一宗教团体独特利益而通过一项法令。

然而，若是有人走进法院声称某法条或公务行为「违反权利法案的精神」或「违反了制宪者的价值标准」，法官当然不会受理，因为如果法官可以随意将实质意义赋予这种含糊的概述，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不受限制了。在真实世界中，由于宪法包含许多能广泛解释的条款，让法官有巧妙处理与决策的充分空间，因此「抗辩必须具体、明确」的原则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清楚。

## 受益人不得控告

司法自制的第三点是身为法令或公务行为受益人的请愿者不可质疑该法。例如，假定一名农夫长期以来都是某方案的成员，参加该方案时，他同意让部分农地休耕并定期接受联邦政府的补助。几年后，他获悉一邻人因为让所有农地休耕而获得定期款项。邻人不劳而获的情况触怒了农夫，他因而质疑方案的合宪性。农夫向当地的联邦地方法院抗议方案的合宪性。法官发现农夫为方案之成员并且从中获得金钱补助便驳回了诉讼：人民不能在受惠于某项政府措施或公务行为后又在法院加以抨击。

## 上诉法院裁决法律问题 — 而非事实问题

州与联邦上诉法院的可行做法是，法院一概不受理以初审法官或陪审团不当堆积与识别案件之根本事实因素为理由的上诉。这不代表初审法官或陪审团在做事实判决时总是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他们更贴近案件的实际当事人与物质证据，因此，比起在初审几个月或几年后阅读文字纪录的上诉法院，在事实评估方面能做得更好。不过，法律事务— 哪条法律适用于案件的事实，或如何就优势法律评估事实 — 就适合上诉法院进行复审。

## 最高法院(严格说来)不受判例约束

如果最高法院在裁定案件时能够随意推翻或规避以往可能具有主导性的判例，这对司法积极(**judicial activism**)而言似乎是项争论 — 而非限制。然而，这个惯例却是司法自制原则之一。如果最高法院无可避免必须遵循先前判决，便失去了通融性。偶尔享有否决或忽视判例的自由让最高法院保有支配权，也因此建立了必要时可躲避的安全角落。当法官发挥智慧、主导法院改变方向，或保持开放的态度时，这项自制原则便可付诸使用。

## 必须用尽其它救济方式

另一项司法自制原则通常让焦虑的诉讼当事人感到挫败，但对井然有序的法律行政来说则是必要的：只有在其它法律与行政上的救济办法都用尽后，法院才能受

理案件。简言之，此项准则代表诉讼者的法律请求必须经过向上层层打通关。联邦案件首先由美国初审法院审理，接着由一个上诉法院复审，最后才由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无论案件或诉讼者的重要性为何，都必须按此程序进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上诉过程可缩短。

用尽救济方式意味着可能的行政救助和严守司法三审级的准则。这类救助可能是以向行政官上诉、在委员会前召开听证会，或经由立法组织正式考虑问题的形式进行。

### 法院不裁决「政治问题」

对美国法官而言，政府的行政与立法部门是属于政治性的，因为都是以制订公共政策为目的而由人民选出的。相较之下，开国元老们并未将司法设计成表达民意的工具，因此司法不具政治性。于是，根据这项推论，政治问题理所当然应由其它两个政府部门之一来解决。

例如，奥勒冈州在大约 **1900** 年左右给予公民复决权与创制权的投票权，此举遭到美国太平洋洲电话电报公司的抗议。（该公司害怕选民会忽略较为商业导向的法案，并通过限制其费率与获利的法令。）该公司主张，宪法第 **4** 条第 **4** 项保障各州「实行共和政体」—此名词应该是指法律只能由人民选出之代表制订，而非直接由人民立法。最高法院拒绝审理此案，并声明这是政治问题。法院的推论是，既然宪法第 **4** 条主要规定国会职责，因此制宪者是希望由国会—而非法院—来监督各州的政府形式。

近数十年来，一项重要的政治对上非政治的纠纷已经影响到立法区域的重新分配。**1962** 年之前，最高法院多数的大法官拒绝裁决立法区人数不平等的合宪性问题，并表示这类事务「不应受法院审判」，而且法院也不敢进入法官菲立克思·法兰克福特(FelixFrankfurter)所谓的「政治棘丛」(the political thicket)。根据传统的最高法院思维，制宪者希望议会能自行重新分配区域—也许由选民共同参与。但是，在最高法院贝克诉卡尔(Baker v.Carr)案(1962 年)的裁决中，多数大法官已彻底改变思维。自彼时起，在许多案件中，法院皆认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的平等保护条款规定立法区的人口规模必须相等，而且法院应该加以监督，确认此项命令之实施。

### 声请人需负举证责任

美国的法官一般都认为质疑成文法之合宪性的人必须承担提出证据之责。因此，如有人抨击某条成文法，那么此人不能只是证明「其合宪性可疑或不明确」；还必须让法院相信反对法律的证据是清楚且占绝对优势的。

这项举证原则的唯一例外是公民权与自由的领域。有些强烈主张公民自由意志论的法官长年来坚决声称，当政府试图限制基本人类自由时，举证责任应该转给政府。现在，这项主张在多个公民权法律学的特定领域相当盛行。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已裁定，与各种因种族与性别而对人民实施差别待遇的法律有关的案件要自动受到「特殊详查」，意即将举证责任转给政府，由政府来证明确实有强制且优先的需要，所以必须依种族或性别来区分人民。举例来说，政府一直以来(成功地)主张应给予军中女性较大的限制，防止她们奉派执行全面性的战斗任务。

### 只以最狭义的理由推翻法律

有时在审判中，法官清楚明白宪法的规定已被立法或行政行为所冒犯。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可能还是会谨慎行事。首先，法官可能可以选择宣布某一所谓法定公务行为无效，而不是以宪法为依据。于法无据(**statutory invalidation**)意指法官因为某公务员的行为超越了法律所授与的权力推翻该公务员的行为。这类裁决具有在宣布不端的公务行为无效之同时挽救法律本身的功能。第二，如果可能，法官只宣布有合宪性缺陷的部份法令无效，不推翻整个成文法。

### 不依立法「智慧」作出裁决

如果严格遵守，这项原则代表宣布某法令或公务行为违宪的唯一依据，是该法令或行为真的违反宪法。成文法不单因为不公平、浪费公帑，或导致糟糕的公共政策而违宪。认真思考之后会发现，这意味着当法官在检验立法的合宪性时，不能随意采用个人对于公共政策的对错或好坏的观念。

随着这项原则而来的情况是，某法令在通过时可能得到全体认可为良善且明智的，但该法却违宪；反之，成文法可能合理化某项所有人明知不适当又危险的公务行为，却仍无违宪之虞。

不依法律「智慧」作出裁决的原则实际上是很难遵循的，因为宪法是一份相当简短的文件，在许多公共生活领域又着墨不多，而其中的诸多措辞与告诫也予人相当大的解释空间。例如，宪法提到国会可规定州际通商，但到底什么是通商？在具有「州际」特性之前，必须达到多大的规模？生而为人，法官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响应。宪法保障被控犯罪之人有请辩护律师的权利。但若有人向有罪之判决提出上诉，这个权利应继续维持吗？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要持续几次上诉？从严格与含糊的角度来解释法律的人，对上述疑问的响应也各异。

总的来说，尽管法官解释宪法时无法避免地会带有个人的价值观，但几乎每位法官都赞同以上原则，意即：只有在违宪时 — 而非不合法官个人偏好时 — 法律才会被宣布无效。

## 第四章

### 司法程序中的律师、 诉讼当事人以及利益团体



新任律师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宣誓于堪萨斯州法院和堪萨斯区联邦法院就职。根据最新估计，全美有超过 95 万名律师。(AP/WWP)



大型的全国性法律事务所雇用律师、图书馆员，以及律师助手来协助合伙人执行例如研究调查等各项任务。 (© *Bob Daemmrich/The Image Works*)



在某些地区，如果被指控违反州或联邦刑事成文法的人请不起辩护律师 — 如图中的被告(中间面对法官者) — 则由称为公设辩护人的政府官员负责代表被告出庭。 (© *Syracuse Newspapers/John Berry/The Image Works*)



涉及特殊利益最有名的案例之一是 1925 年的猴子诉讼(monkey trial)。此案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派出律师克莱伦斯·达若(Clarence Darrow)(左)为一名违反田纳西州教授演化论禁令的生物老师约翰·史柯普斯(John T. Scopes)辩护。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右)以圣经专家名义在起诉中作证。 (AP/WWP)





琳达·布朗(Linda Brown)(左)与妹妹及双亲提出了具指标性的诉讼案，即 1954 年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裁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同等保护条款。(© 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阿米希(Amish)青年阿比·尤达(Abe Yoder)、其父，以及其它教友被威斯康星州指控未依州法规定让孩童接受直到 16 岁的义务教育。在这个宗教自由的案例中，利益团体为其双亲辩护。(AP/WWP)

**本章的重点在于司法程序中的三个重要角色：律师、诉讼当事人，以及利益团体。** 美国法官裁决的案件，是由彼此发生争执或纠纷的个人或团体向法院提出的。这些对手通常称为诉讼当事人，有时他们在一些像小额赔偿法院的小场所辩论案件，但是在较重要的司法场合，他们通常由律师代表。本章先就法律专业进行检验，随后探讨司法程序中诉讼当事人与利益团体的角色。

## 律师与法律专业

在美国，律师的训练与法律的实践随着时间逐渐发展成形。现今，美国的律师在各种背景与环境下执业。

## 法律专业的发展

在殖民地时期(1607-1776)，美国没有法律学校可训练对法律专业感兴趣的人。一些年轻人到英国受教育并就读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律师学院并非正式法学院，只是英国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让学生能够熟悉英国法律而已。这时期，有志于法律的人通常都跟随执业律师担任书记工作或学徒。

美国革命(1775-83)之后，法律教育与进入律师业的门坎都不高，律师人数因而遽增。当学徒仍旧是获得法律训练最普遍的方式，但法学院已经出现。第一所法学院是由专门训练书记与学徒的法律事务所产生的。这类学校的元老是康乃迪克州的李奇菲尔德学校(Litchfield School)。该校建于 1784 年，以讲课方式教授商业法为重点。最后，几所大学开始在一般课程中教授法律。1817 年，哈佛大学设立了独立的法学院。

在 19 世纪后半，法学院数量显著增加，从 1850 年的 15 所到 1900 年的 102 所。当时的法学院与今日的法学院有两大差异。首先，以前的法学院通常不要求先前的大学学历；第二，在 1850 年，标准的法学院课程可于一年内完成。1800 年代后期，法学院多为两年制。

在 1870 年，哈佛大学开始推动重大变革，对之后的法律教育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哈佛制订更严格的入学门坎；没有大学学历的学生必须先通过入学测验。法学院课程在 1871 年延长为两年，在 1876 年延长为三年，而且学生必须通过第一年的期末考试才能继续上第二年的课程。

然而，影响最深远的改变是案例教学法的使用，也就是以个案纪录簿取代讲课与课本。这些个案纪录簿(真实案例的汇编)的设计以解释法律原则、法律含意，以及发展过程为宗旨。教师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引导学生从案例中探索法律概

念。其它学校最终都采取了哈佛大学的教学方法，许多法学院至今仍采用案例教学法。

因应 1800 年代末对律师需求的增加，新的法学院也快速建立。设立新校的花费不高，这段期间还出现了不少雇用律师与法官为兼职教职员的夜校。新校的标准通常不严谨，课程则着重本地的实际做法，其主要贡献在于给穷人、移民，以及工人阶级的学生更多接受训练的机会。

在 20 世纪，有意研读法律的人数大幅增加。到了 1960 年代，法学院的申请人数暴增，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变得挑剔。同时，因应社会压力与诉讼，许多法学院开始主动招收女性与少数族群的申请者。

在 1960 年代，部份法学院的课程也扩及例如公民权法律和法律与贫穷等社会焦点，国际法也纳入了授课范围。

最近法学院兴起一股强调使用计算机的趋势，从注册、上课须知、诉讼格式之取得，到学生服务等，几乎无所不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愈来愈多法学院也提供智慧财产权特别课程，这是近几年有相当成长的专门领域。最后，律师大幅增加对广告的使用也对业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全国各地的电视频道上，民众可看到律师提出上诉以吸引新客户上门，而处理因广告使用量的增加所衍生之业务的法律中心也已快速普及。

## 成长与层级化

过去半世纪来，美国律师数目呈现稳定成长，目前估计超过 95 万名。这些律师在美国要如何就业？

法学院入学委员会在 2001 年版的《美国法学院官方指南》(The Official Guide to US LawSchool)上提供一些办法。近乎四分之三(72.9%)的美国律师都是私人开业，有些在小型、个人的办公室，有些在大型的律师事务所。约有 8.2%的法律专业人员在政府机构上班；约 9.5%在私人企业与协会担任律师或管理职；约 1.1%

在法律扶助基金会服务或担任公设辩护人，代表请不起律师的人；约 1%的人从事法律教育工作。另有约 5%的律师已经退休或不执业。

美国的律师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运用其专业训练。有些环境较有利可图且享有声望。这种情形导致所谓的专业技术分层。

影响声望层级的因素之一，是法律专业的类型和所服务的诉讼委托人类型。在大型企业或机构服务的专业律师占据了顶层，而在底层的则是代表个人利益的律师。

位于声望顶层的，是大型的全国性法律事务所，一般都知道在此服务的律师出庭的时间少于为客户提供咨询的时间。客户必须付得起雇用这些顶尖专业法律人才的费用，因此他们通常是大企业而非个人。不过许多大型的全国性事务所也提供公益性(**probono**，拉丁文，意指「公益」或「免费」)的法律服务，以促进公民权、公民自由、消费者利益，以及更美好的环境。

大型的全国性事务所由合伙人与律师所组成。合伙人拥有公司部分收益，律师则领薪水，并为合伙人担任核心工作。这些大型事务所争取全国最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其中，最具声望的公司拥有 250 名以上律师以及数百名律师助手(接受过特别训练的非律师人员，专门处理法律工作的例行事务)、行政人员、图书馆员，以及秘书。

比在大型全国性事务所服务的律师低一个层级的，是受雇于大型公司的律师。许多大公司雇用全国性法律事务的律师担任外聘律师，但愈来愈多公司雇用支薪的内部律师。有些公司的法律部门在规模上和私人事务所不相上下。此外，这些公司也和大型法律事务所为最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而竞争。

除了在法庭上代表公司(必要时，通常由外聘律师代表)，法律部门处理许多现代公司面临的法律问题。例如，法律部门监督公司人事作业，使其确实遵循联邦与州法所规定的雇用与免职程序。公司律师可以向董事会就例如合同、公司合并、股票出售，以及其它商业行为提出建议。公司的律师也协助训练其它员工可运用

于特定职责的法律知识，并确保他们遵循法律。大公司的法律部门也扮演与外聘律师间的沟通桥梁。

大部分的律师则在法律专业中声望较低的层级工作，他们不像为大型的全国性律师事务所和大企业工作的人那样领取高薪。但他们从事的活动范围更广，并且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法庭上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律师代表人身伤害诉讼的当事人、起诉被控犯罪者或为他们辩护、代表离婚诉讼中的丈夫与妻子、协助人们进行房地产交易，以及准备遗嘱等，经手的案件类型非常繁多。

为政府工作的律师也包含在层级较低的范围内。有些人，像美国检察总长与副检察长，担任相当具有名望的职位，但许多都是辛苦且薪水微薄的职务。一些律师选择从事联邦或州层级的法官工作。

法律职业的另一项特点是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间的不同。前者提出诉讼，后者则替被控从事民事与刑事不法行为的被告辩护。

### **司法程序中的政府律师(Government Attorneys)**

政府律师的工作涉及司法程序的所有层级，从初审法院到州与联邦最高层级的上诉法院都包括在内。

**联邦检察官(Federal Prosecutors)**每个联邦司法区都有一名联邦检察官和一名或多名联邦助理检察官，他们负责在联邦地方法院起诉刑事案件的被告，而当美国在联邦初审法院被告时，他们也负责为美国辩护。

联邦检察官是由总统指派并经参议院批准的，被提名人必须居住于被指派的地区，而且必须是律师。正式任期为四年，但总统可决定重新任命或将其免职。联邦助理检察官在正规上是由美国司法部长(the U.S. attorney general)指派，虽然实务上的做法是由美国联邦地区检察官选任，再转交司法部长批准人选。司法部长可解雇联邦助理检察官。

联邦检察官有相当大的职权可决定起诉哪些刑事案件，也有权决定哪些民事案件可寻求庭外和解、哪些案件必须在法庭上解决。因此，联邦检察官对联邦地方法

院受理哪些案件的影响力很大。而且，由于联邦检察官是地方法院中接触最多诉讼的人，他们与其职员的参与在联邦初审法院的决策制定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州层级的检察官**起诉被控违反州刑事成文法的人，通常称为地区检察官。许多州的地区检察官是民选的郡级官员；少数几州的地区检察官则是被指派的。地区检察署通常会雇用一些助理，由助理执行大部分的实际审判工作。多数地区的助理检察官都是法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从这样的职务得到宝贵的审判经验。许多人后来自行开业，通常担任刑事辩护律师。其它人则希望在几年后成为地区检察官或法官。

地区检察官署在处理案件上有很大的斟酌空间。由于预算与人事限制，并非所有案件都可获得相同的时间与关注。因此，有些案件遭到驳回，有些案件不起诉，有些则在法庭上被大力起诉，不过大部分的案件都以认罪协商收场，也就是地区检察署同意接受被告承认较轻的罪，或撤销部分指控以换取被告认罪。

**公设辩护人**通常被指控违反州或联邦刑事成文法的人是请不起辩护律师的。在某些地区，被称为公设辩护人的政府官员负责代表付不出钱的被告。因此，公设辩护人是检察官的对手。与地区检察官不同之处，在于公设辩护人通常是被指派而非选出的。

美国某些州设有遍及全州的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其它地区，公设辩护人则由地方官员担任，通常是来自于郡政府。公设辩护人和地区检察官一样都雇用助理与调查人员。

**其它政府律师**在州与联邦层级，有些政府律师在上诉法院的表现比在初审法院更广为人知。例如，每州都有一名检察总长(**attorney general**)，专门监督负责处理州法律事务的律师职员。在联邦层级则由司法部代表美国负责类似的工作。

**美国司法部**虽然司法部是政府行政机构，其本质仍与司法部门有关。许多在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都和全国性政府脱离不了关系。有时政府被控告，有时则是政府提出诉讼。无论如何都必须由一名律师代表政府。即使许多政府机构都聘有律师，与联邦政府有关的诉讼大多仍由司法部处理。

司法部的检察总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在于最高法院辩论的案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司法部之下设有多个法律部门,各有专门领域的律师,由助理司法部长(**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所领导。法律部门监督联邦检察官处理的诉讼、将案件带到上诉法院,并在最高法院辩论的案件中支持检察总长办公室。

**联邦检察总长(U.S. Solicitor General)**联邦检察总长是司法部第三号人物,有 5 名代理人与 20 名助理检察总长提供协助。联邦总检察长的主要功能是代表美国决定哪些案件该或不该交由最高法院复审。当行政部门或机构在上诉法院输掉官司并希望最高法院复审时,该部门或机构可要求司法部取得移审令。联邦检察总长将决定是否对下级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

做这类决定时有许多因素需列入考虑。也许最重要的着眼点在于最高法院可审理的案件有限。因此,联邦总检察长必须决定某些案件是否值得法院的密切注意。除了决定是否寻求最高法院复审之外,联邦总检察长个人也替由最高法院审理的政府案件进行辩论。

**州检察长(State Attorneys General)**每个州都有一位检察长担任主要的法律官员。在大多数的州,州检察长是由全州各党票选的,负责监督以处理该州所涉及之民事案件为主要工作的律师雇员。虽然对刑事被告的起诉通常由地区检察官处理,检察长办公室在调查全州各地刑事活动方面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检察长与其职员在准备起诉被告案件时会与地区检察官密切合作。

州检察长也为州与地方机构提供咨询意见。通常,这些意见是对尚未被法院裁决之部份州法的解释。虽然咨询意见可能在法庭上的案件中遭到否决,就认定州与地方机构的行为而言,检察长的意见仍具重要性。

## 司法程序中的私人律师

在美国,刑事案件的被告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可由律师代表。部份司法管辖区已设置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代表贫穷的被告,其它地区则采取指派私人律师代表给付不出钱的被告的方式。出的起钱的被告也会这么做。

在民事案件中，宪法未赋予原告或被告雇用律师的权利。然而，在民事范围中，法律问题通常非常复杂，所以需要雇用律师。有需要的人也可寻求各种形式的法律协助。

**指定的辩护律师**必须指派私人律师代表某位贫穷的被告时，通常由某位法官基于特殊原因进行指派。地方律师协会或律师本身通常会提供愿意担任这项工作的律师名单给法院。

**私人辩护律师**有些私人开业的律师专精于刑事辩护。虽然电视与电影将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活描绘得光鲜亮丽，但真实情况却是工时长、薪水少，而且声望低。

## 法院工作小组

在刑事法庭工作的律师与法官常会变成工作小组的成员，而非指示偶尔为了解决某件纠纷而集会然后分道扬镳的陌生人。

法院工作小组中能见度最高的成员 — 法官、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 — 各司其职：检察官负责给被控刑事上违反政府的人定罪，辩护律师为客户寻求无罪，法官则担任立场超然的裁决者以确保审判的公平性。尽管职责不同，法院成员共享某种价值观与目标，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势不两立。法官、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之间以合作为常规。

法院工作小组最重要的目标是快速处理案件。法官与检察官喜欢快速处理案件，以彰显其成就与效率。私人辩护律师需要处理大量案件才能维持生活，因此快速处理案件对他们有利，而公设辩护人快速处理案件则纯粹因为缺乏充足资源来应付案件量。

法院工作小组的第二项重要目标是维持小组团结。成员间发生冲突会使得工作更难实行，并且使案件无法快速解决。

最后，法院工作小组关心不确定性的减少与控制。在实务上，这代表法院工作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尽力避免审判。审判(尤其是陪审团审判)会造成许多不确定性，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却无法保证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为达上述目标，小组成员使用多项技巧。虽然也会出现单方面的判决与相互对立的程序，但协商仍是在刑事法庭中最普遍使用的方式。小组成员针对广泛的各项问题——例如：延期审理、审理日期，以及信息的交换等——进行协商，而认罪协商然是协商中最关键的手段。

## 提供给穷人的法律服务

刑事被告在宪法上有权由律师代表，民事案件被告或想要提出民事案件的人却不然。因此，没有钱雇请律师的人可能觉得难以获得正义。

为此，许多地区都设有法律扶助服务。早在 1880 年代末，纽约与芝加哥即设有法律扶助协会，其它大城市也于 20 世纪陆续跟进。部份法律扶助协会由律师协会赞助，但多数凭靠私人捐献。在部分地区，法律扶助协会与慈善机构结合，许多法学院也开设法律支持中心为穷人提供法律协助并提供法学院学生有价值的训练。此外，许多律师提供的多为「公益性的」(**pro bono publico**，拉丁文，意指「为了公益」)法律服务，因为他们视之为职业义务。

## 诉讼当事人

向法院提出的案件，有些是由个人提出的，其它的则是由一位或多位可能是政府机构、企业、协会、利益团体，或大学的诉讼者所提出的。

什么原因促使一个人或团体把不满带上法院？在刑事案件中，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简单，那就是有人涉嫌违反州法或联邦法，所以政府对于涉嫌违反成文法的人起诉。民事案件就没那么单纯了。有些人准备将不满带上法院，许多其它的人在相关费用和时间的考量下尽量避免采取此一途径。

政治科学家菲利普·库柏(**Phillip Cooper**)指出法官要解决的纠纷有两种：私人的法律案件与公开的法律争议。私人的法律纠纷指的是由某公民或组织控告他人的纠纷。所谓的公开的法律争议，则是公民或组织声称某政府机构或官员违反宪法或成文法保障他们的权利。库柏在《困难的司法抉择》(**Hard Judicial Choices**)

一书中提到，「法律行动，无论是私人或公开的，一定是政策导向或以赔偿为目的」。

一个私人、寻常，且以赔偿为目的的经典诉讼案例是，在汽车肇事的车祸中受伤的某人控告另一辆车的驾驶人，以获得赔偿金作为所需之医药费的补偿。这类诉讼属于私人性质，不以改变政府或商业政策为目的。

然而，部份私人法律案件在本质上却是以政策或政治导向的。个人伤害与产品责任的诉讼从表面上看来可能纯粹以赔偿为目的，但也可能用来改变被告之私人公司的制造和商业运作方式。

北卡罗莱纳州一起诉讼案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案始于 **1993** 年。当时，一名五岁女童在另一名孩童将儿童池的排水孔盖移开后被困在排水管里。在救出女童之前，排水管强大的吸力几乎把女童的大小肠都吸去了。结果，女童余生的每一天都必须花费大约 **11** 个小时靠进食管维持生命。**1997** 年，陪审团判给女童家人 **2,500** 万美金的赔偿金，而在陪审团考虑惩罚的赔偿之前，排水管制造商与其它两名被告已以 **3,090** 万美金和解。原告律师表示，这件诉讼案突显了全国其它地区的类似事件，并揭露了业内人士知悉而其它人不知情的事情。这家人不只赢得诉讼，北卡罗莱纳州议会也通过立法要求设置多个排水孔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最具政治与政策导向的诉讼是公开的法律争议，也就是为了阻止可能的不法政策而向政府提起诉讼。这类诉讼也可能寻求赔偿金或其它的补偿形式。最高法院判决之卢卡斯诉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委员会(**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南卡罗来纳州的沿岸区域管理法禁止戴维·卢卡斯(**David H. Lucas**)在他所有的两块海滨空地上建造住宅区。南卡罗来纳州初审法院裁定卢卡斯有权获得损失赔偿，但是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推翻了这项判决，于是，卢卡斯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的判决有利于卢卡斯。该判决指出，如果财产所有者因为被拒绝使用自己经济上可用之财产而蒙受损失，依宪法规定可以得到赔偿。

政治或政策取向的诉讼在上诉法院比在初审法院更普遍，也是美国最高法院最常见的案子。一般的赔偿金案例通常在司法程序初期就结束了，因为诉讼者发现和解或接受初审法院判决是较有利可图的做法。政治案件的诉讼者通常不会很努力地透过在下级法院争取胜诉的方式推动政策目标，而宁愿透过上诉法院的判决获得外界的高度关注。在上诉法院上诉所费不貲，因此这个审级的案件大多有利益团体提供某种形式的赞助。

## 司法程序中的利益团体

虽然利益团体较为人所知的是其影响立法与行政部门决定之企图，但他们也在法院追求政策目标。有些团体发现司法部门比其它两个政府部门更能接纳他们。没有在美国国会或州议会发动密集游说攻势之经济来源的利益团体发现，雇请律师或以某宪法与成文法法条为基础而构成法院案件的作法比较容易。同样的，成员中没有法定登记选民的小型团体可能缺乏政治力量，难以对立法与行政部门官员造成影响。然而，大型会员组织与政治力对向法院提出诉讼而言并非必要条件。

有时利益团体也会转而诉诸法院，因为他们发现司法部门比其它两部门更为支持其政策目标。从 1960 年代初期到末期，以自由政策为目标的利益团体在联邦法院取得很大的进展。此外，以大众利益为宗旨的法律事务所的概念在此时代也备受瞩目。以大众利益为宗旨的法律事务所进行的，是对一般大众有利的案件，包括消费者权益、就业歧视、职业安全、公民自由，以及环境议题。

在 1970 与 1980 年代，保守的利益团体比以往更常诉诸于联邦法院。这是自由利益团体胜利的部分效应，联邦法院为保守的观点提供一个愈来愈有利的场所也是原因之一。

利益团体在参与司法过程中可能会依据团体的目标而采取几个不同形式，其中有两项主要策略特别受到瞩目：透过「法庭之友」状(*amicus curiae* brief)参与测试案例与资料陈述。

## 测试案例(Test Cases)

由于司法部门只能藉由在特定案件中作出裁决的方式参与决策，因此，利益团体使用的策略之一，是确保能达到政策目标的案件能向法院提出。在某些情况下，这代表利益团体将提供所有必要资源以促进案件的进行。此类赞助中最著名的，是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4 年)。在本案中向堪萨斯州托皮卡教育局提出诉讼的虽然是琳达·布朗(**Linda Brown**)的双亲，但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也提供了所需的法律与金钱赞助，让本案一路顺利上诉至最高法院。索古德·马歇尔(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代表原告和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辩论此案。结果，最高法院判决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赢得了胜利。

利益团体可能会为一个原本由他人所提出，但涉及该团体非常重视之议题的案件提供协助。以一个宗教自由的案件：威斯康星州诉尤德(**Wisconsin v. Yoder**)一案为例。威斯康星州提出刑事诉讼，控诉乔拿斯·尤德(**Jonas Yoder**)等人未依州法规定让孩童接受直到 16 岁的义务教育。尤德等人是阿米希(**Amish**)教徒，他们认为八年级以上的教育会瓦解他们所珍视的信仰，并「对他们的孩童造成世俗的影响」。

一个名为阿米希宗教自由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mish Religious Freedom**)的组织为尤德等人辩护。在初审法院做出不利于阿米希的判决后，阿米希宗教自由全国委员会向威斯康星州巡回法院提出上诉，不过该法院支持原判。该会继而向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上诉并得到有利于阿米希的判决。判决认为，义务教育法(**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law**)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信教自由条款。1972 年 5 月 15 日，威斯康星州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结果最高法院认可阿米希宗教自由全国委员会以宗教理由反对义务教育法的主张。

正如以上各例所阐明的，利益团体的诉讼参与以可送达最高法院的重大宪法议题为重点。因为只有少部分案件能上诉到国家最高法院，所以大部分利益团体律师所处理的，大都是下级法院的一般例行工作。这些律师可能只要处理所属团体之诉讼委托人的法律问题即可，不需为了上诉法院而打造重大的测试案件。

举例来说，在 1950 和 1960 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公益的律师不只针对重大的民权议题打官司，也为与地方当局发生问题的非裔美国人与民权工作者辩护。这些利益团体律师后来在专业的法律扶助协会中发挥了许多功能：他们担任参与重要社会改革运动人士的法律代表，并透过持续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方式让大众注意到非裔美国人的困境。

## 法庭之友状

呈递法庭之友状是利益团体参与案件的简便办法。透过这个方式，即使利益团体无法掌控案件，仍然可以把想法呈现在法庭上。假如团体获得诉讼当事人或法院的同意参与案件，利益团体便可呈递法庭之友状作为诉讼者的补充辩论。提出法庭之友状的策略通常用于联邦与州层级的上诉法院而非初审法院。

有时法庭之友状用于加强一方诉讼当事人的立场。当威斯康星州诉尤德一案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时，提出法庭之友状支持阿米希动机的组织包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Seventh Day Adventists)、全美基督教会协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犹太教会堂理事会(the Synagogue Council of America)、美国犹太人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全国犹太委员会法律与公共事务部(the National Jewish Commission on Law and Public Affairs)，以及门诺中央委员会(the 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有时使用法庭之友状不是以加强一方当事人的辩论为目的，而是为了向法院表达该团体对如何裁决案件的看法。法庭之友状的使用通常是为了说服上诉法院批准或拒绝复审下级法院的裁定。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研究发现，法庭之友状的出现大幅提高了法院完整解决案件的机会。

不同于私人的利益团体，政府所有层级不需经过批准即可呈递法庭之友状。在这方面，联邦检察总长尤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某些情况下，最高法院可邀请联邦检察总长呈交法庭之友状。

## 第五章

### 刑事法院程序

当有人违反法律，刑事程序便开始，接着延伸到逮捕、控告、审判，以及上诉。美国没有任何单一的刑事或民事法院程序。联邦体系有一套国家层级的法院程序，而各州与各地区也有自己影响司法程序的一套规则。上述的所有政府实体之间确实有规范与相似处，这也是接下来探讨的重点。不过，没有两个州的司法体系是完全相同的，也没有一州的司法体系和全国性政府的司法体系是完全一样的。

#### 犯罪的本质与真义

造成伤害或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是犯罪行为。只有明确违反由国会、州议会，或其它公家机关正式颁布之刑事成文法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犯罪行为。因此，犯罪是违反州法的罪行，可处以罚金、监禁，或死刑。犯罪是对整体社群义务的违反行为，并只可由州加以处罚。民事法院或民事诉讼无法加诸入狱或死刑的制裁(虽然罚金可能是民事或刑事的一项处罚)。

在美国，大部分的罪行都属于干犯之罪(**sins of commission**)，例如重伤害或侵占；少数属于怠忽之罪

(**sins of omission**)，例如在交通事故后没有停下车来提供救助，或未申报所得税。州认为某些罪行，例如谋杀与叛国罪，是重罪，其严重性也反映在相应的惩罚上，例如无期徒刑或死刑。州认为其它的罪行，例如并排停车或扰乱治安，只要稍加惩罚即可，因此处以小额罚金或在当地监狱拘留一晚，略施小惩。

有些犯罪行为，例如绑架或强暴，超过了所有公民可容许的人类行为范围，有些罪行却造成意见分歧。举例来说，1897年的一项密执安州成文法规定在孩童面前咒骂是违法行为，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项法律则禁止在教堂晚餐时玩宾果游戏。其它愚蠢的刑事成文法还包括威斯康星州规定在酒吧唱歌不合法，路易斯安纳州则禁止在出席文学研究聚会时出现醉态。

美国最严重的犯罪行为是重罪。绝大部分的州，任何罪行之重罪可处以死刑(在许可死刑的州)或是坐牢(联邦或州监狱)；其它的罪行则包括轻罪或违规。在其它州，依据联邦法，重罪可处以死刑或入监一年以上。因此，重罪在某些州依据惩罚出现的地方而有不同；某些州，根据联邦政府，刑期才是重点。重罪的例子有谋杀、强制性交以及持械抢劫。

轻轻罪则被各州视为小罪，其惩罚通常是在市或郡监狱监禁一年以下。公然酗酒、小赌，以及流浪都是一般常见的轻罪。有些州有第三类罪行，称为违规，通常包括不严重的交通违规，例如违规停车，通常以小额罚鍰作为惩罚。罚鍰通常也是轻罪或重罪惩罚的一部份。

## 犯罪种类

今日美国的主要刑事犯罪分为五大类，包括传统型犯罪、经济犯罪、组织犯罪、政治犯罪，以及合意犯罪。

### 传统型犯罪

在美国每年 **3,110** 万件传统型犯罪中，财产犯罪占其中大多数。政府将财产犯罪与暴力犯罪区别开来，即使两者往往关系密切。例如，闯进住宅的小偷不慎和抵抗的屋主起冲突时可能会伤害屋主，因此所涉及的罪行就不只是窃盗的财产犯罪。

数量较少但更令人害怕的传统型犯罪是对人身的侵害。这些暴力犯罪包括谋杀、故意杀人、强制性交、抢劫，以及重伤害。

### 经济犯罪

经济犯罪分为四大类：

- 个人犯罪由非暴力犯罪行为所构成，即某人以金钱报酬欺骗另一人，例如蓄意开空头支票、逃漏所得税，以及福利诈欺。
- 违反信托是企业或政府员工违反对雇主或客户的忠诚，并从事例如商业贿赂、在工作场所窃盗与侵占，以及填写不实之公款支付账户等行为。
- 商业犯罪是指非企业之主要目的但附带(或是为了助长公司)发生的犯罪。不实广告、违反反托辣斯法，以及为了公司所得税而估算之不实折旧数字等，皆属商业犯罪。
- 骗局(con games)是假藉商务之名的白领阶级犯罪行为。

## 组织或集团犯罪

组织犯罪由一群人所从事，通常以某种阶级型态为领导基础。这是一种与恐惧和腐败紧密结合的持续性活动。集团犯罪的活动通常集中在特别有利可图的领域，例如非法毒品的走私、赌博、卖淫，以及高利贷(高利息与高偿还率的金钱借贷)。

## 政治犯罪

政治犯罪通常是由侵犯政府的行为所构成：叛国、叛乱、刺杀政府官员，以及煽动叛乱。不过，政治犯罪一词也指政府对个别公民、异议团体，以及外国政府或国民的犯罪行为。一例如，政府对政治异议团体进行非法窃听，或军方拒绝调查性骚扰事件等。

## 合意犯罪

所谓的无被害人犯罪，例如卖淫、赌博、非法使用毒品，以及两名成年人同意进行不法的性行为等，皆为犯罪者与委托人双方想从事法律禁止之活动，因此称为合意犯罪。

## 犯罪的要素



每项犯罪行为都有数个不同要素，除非州能在法庭证明这些关键要素的存在，否则无法定罪。虽然法庭上的司法程序可能不会清楚而个别地针对这些要素，但在将某刑事罪犯定罪的整个司法过程中，这些要素至少是内隐其中的。

## 定义犯罪及其惩罚的法律

如果法律禁止或规定某项行为，正式设立的机构(通常是国会或州议会)必须详加说明，好让人民能事先知道什么行为是受到法律禁止或规定的。立法者也必须针对涉及伤害行为的个人订定惩罚。

这项总则会产生一些必然的结果。一是美国宪法禁止刑事的追溯法令，也就是在行为发生之后法令才宣布该项行为违法。同样的，州不能通过剥夺财产和公民权利的法案(**billsofattainder**)，意即针对特定人士或族群，并宣布这些人的某些行为是罪行，但相同行为由其它人来做的话却是合法的。最后一项必然结果是犯罪行为法律必须是精准的，如此一般人才能先行判断哪些行为是被禁止或规定要做的。

## 犯罪行为(**actus reus**)

拉丁文 **actus reus** 是指被告犯下之被法律起诉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是犯罪的物质要件。这项要件可以是犯下被禁止的行为(例如施暴或殴打)，也可以是未履行规定之行为(例如拒绝停下来协助车祸受害者)。

## 犯罪意图(**mens rea**)

拉丁文 **mens rea** 是指关键的犯罪心理要件。美国法律系统清楚区隔意图伤害与因单纯疏忽或意外造成的伤害。因此，如果某人使另一人丧命，州通常不会称之为谋杀。如果一名心理健全人士做出蓄意谋杀之行为，则可能被称为「一级谋杀」。如果是因在酒吧争吵而动怒杀人，则可能被称为「二级谋杀」，刑责较轻。在公路上因鲁莽驾驶而致他人于死，则属于「过失杀人」——这当然是一种罪行，但是在州看来并不如蓄意谋杀他人那么严重。

## 伤害或结果

犯罪是指某人对他人造成的明确伤害，或一人对另一人做出犯罪行为。犯罪可能会对社会大众造成伤害，例如将贩卖军事情报给外国政府，或者，伤害可能是加诸于个人的，但因其本质，而被视为危害社会整体。伤害的本质，如同犯罪意图一样，通常决定了犯罪的本质。例如，假设有两名驾驶互超对方的车，最后都停下车出来互殴。假定其中一人把对方打得太严重，致使一方死亡，此罪行可能是(某种程度的)谋杀。如果对方没死但身体严重受伤，罪行则为重伤害。如果伤害不严重，则以一般伤害罪起诉。由于罪行通常取决于伤害的本质，因此，伤害的本质可以说是犯罪的关键法律要素。

即使没有造成任何实际上的伤害，有些行为可能仍是犯罪行为。大部分的犯罪共谋行为即属于此类。举例来说，如果有几个人计划行刺法官或贿赂陪审员好让某罪犯不被判有罪，就犯了共谋阻碍司法之罪。即使法官安然无恙，陪审团也没拿到任何一毛钱，仍然属于犯罪行为。只要有犯罪计划和意图，加上为达目的由一共谋者从事特定且蓄意之行为(例如购买武器或拥有法官往返住家与法院之间的路线图)，犯罪行为就成立。

### **行为与造成的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刑事犯罪定罪之前，州必须证明被告以自然且连贯的程序造成了伤害。要证明因果关系通常不困难。假设比尔以小刀刺伤约翰并造成轻伤，比尔因为使用致命武器施暴而有罪是无庸置疑的。但若约翰的伤口因为没有得到适当医疗照护而引发感染并导致死亡，那么比尔是犯了过失杀人罪抑或谋杀罪？又或者，如果约翰被刺伤后巧遇第三人并将之伤害，比尔该为此负责吗？

如何处理这类问题通常让法官与陪审团头痛。法律规定必须考虑所有的情况。只有当州能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受害者受伤的直接、立即，或决定性的因素，才能将之定罪。

### **刑事审判前的程序**

联邦与州法律规定，在举行刑事审判之前必须完成一连串的程序与事件。其中的几个阶段是美国宪法和州宪法所规定的、几个阶段是法院判定的，其它阶段则是

由法律条例规定的。至于其余的，则取决于惯例与传统。虽然这些程序性事件的真正本质在联邦与州以及州与州之间各有不同，全国仍有相似之处。这些程序表面上看来具有必然性与例行性，但实际上却不然；司法体系的决策者在全程各阶段皆可据其价值观、态度，以及世界观来运用裁量权。

## 逮捕

逮捕是州与被告间的首次实质接触。美国司法体系提供两种逮捕方式：有逮捕令的逮捕与没有逮捕令的逮捕。逮捕令是在某人对他人提出控诉，经地方法官审查并发现正当的逮捕理由后所发布的。没有逮捕令之逮捕行为则发生于犯罪在警官面前发生或某警察有正当理由相信某人已经(或正要)犯罪之时。之后警官必须起誓声明或提出证词来证明当时的判断。在美国，高达 **95%**的逮捕行为都是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发生的。

警察对于逮捕与否的判断绝不单纯，也绝非理所当然。当然，如果情况允许，亲眼目睹谋杀案的警察会当场进行逮捕。但是大部分的违法事件没有这么简单或黑白分明，而警察在是否拘捕某人这件事情上拥有一 也行使 一很大的裁量权。警方根本没有足够资源来处理所有国会与议会禁止的行为。因此，他们必须行使裁量权来决定如何分配既有的时间与资源。在某些地区，警察裁量权达到了最大极限。

**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Trivial Offenses)**许多警察手册都建议警察在关切一些不重要的违法事件时，警告比逮捕更合适。交通违规、青少年行为不端、酒醉、赌博，以及流浪等，都是轻微的罪行，由警察决定即可。

**受害者将不寻求起诉**犯罪受害者不与警察合作起诉案件时，警方一般也不会执法。例如在较不严重的财产犯罪中，受害者通常满足于赔偿或无暇出庭作证。除非警方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调查某桩财产犯罪案，否则通常就会依从受害者的意愿。

当犯罪受害者与罪犯有持续往来的关系，警察通常拒绝逮捕。这类关系包括房东与房客、邻居，以及最近才加入的夫妻关系。不过，夫妻关系中受到高度关注的家暴行为已对警方的处理程序造成重大的影响。

强暴与对儿童性骚扰(**child molestatoin**)是犯罪的另一大种类。因为受害者不愿或不能与警方合作，通常无法逮捕这类罪犯。通常受害者或与罪犯为熟识或相关，因为害怕报复或令人难堪的案情公诸于世而不愿提出告诉。

**受害者也涉入不法行为** 当警方得知犯罪受害者也涉入某种不当或可疑行为时，往往选择不予逮捕。

### 在治安法官面前应讯

犯罪嫌疑犯被捕后，会送到警察局备案；也就是记录逮捕的相关事实，留下被告的指纹并拍照。接下来被告被带去见审级较低的司法官员，可能是法官、治安法官，或行政官员。这样的应讯应以「无非必要之延迟」的方式进行；**1991**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警方无逮捕令所逮捕之罪犯在法院审理其正当性之前，警方羁押时间最多为 **48** 小时。

此次法庭应讯是刑事司法程序中多项重大事件发生的场合。首先，被告必须已经知悉被控的明确罪名以及所有的宪法权利与保障，这些权利包括最高法院于**1996**年对现在广为人知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v.Arizona**)案所做的判决中所包括的权利：被告「在回答任何问题之前必须被告知有保持缄默的权利；被告的任何陈述都可被当作法庭上不利于他的证词；有权请律师辩护，若无法负担律师费，在应讯前会指派一名律师给他。」(进行逮捕的警官在询问嫌犯案情之前也必须先告知这些权利。)在某些州，还必须让被告知悉该州权利法案所提供的其它权利，例如迅速审判的权利以及与带有敌意之证人对质的权利。

第二，由治安法官决定是否让被告交保和保释金额。宪法只规定金额不可「过高」。交保被视为特权 一而非权利 一就死刑案件而言，如果罪证确凿或治安法官认为被告无论保释金多寡都有可能弃保潜逃，就可能会完全拒绝交保。保释的替代方

法是具结释放(**release on recognizance**),基本上是指被告保证在指定的审理日期返回法庭。

在次要案件中,被告可能被要求承认或否认有罪。如果认罪,可能当庭宣布刑责;如果被告不服罪,再排定审判日期。然而,在典型的重大案件(重罪)案件中,治安法官的下个主要职责是决定是否预审被告。如果预审的做法是妥当的,检方便会延后该案,下一个刑事司法程序于焉开始。

## 大陪审团程序或预审

在联邦层级,所有被控犯罪者都受到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保障,由大陪审团审理案件。然而,最高法院已拒绝让各州受此权利之约束。今日,只有约半数的州使用大陪审团;其中部份州的大陪审团只用于特殊类型的案件。不使用大陪审团的各州则采取预审或审查性审理(**examining trial**)。(有几个州兼用两套程序。)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刑事司法程序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都是决定是否有充分理由让被告接受正式审判。

### 权利告知

你被捕了。在我们问你任何问题之前,你必须了解你有什么权利。  
你有权保持缄默。你随时可以不和我们说话或回答任何问题。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在法庭上对你不利的证据。  
在我们询问你之前,你有权咨询律师,审讯时并可要求律师在场。  
如果你没能力请律师但是想找个律师来,会指派一个律师给你。  
如果你现在想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回答问题,你仍有权随时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在你和律师交谈之前,你随时有权停止回答任何问题。

自 1966 年起,警方在审讯之前必须将嫌犯的权利加以告知。警方使用所谓的「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这是以恩尼斯托·米兰达(**Ernesto Miranda**)命名的,他因为未被告知权利而获准重审。

**大陪审团**大陪审团由 16 到 23 名公民组成，通常从选民登记名单中随机挑选，他们以多数决的方式做判决。陪审团的开庭期可能持续一个月到一年，有些人在这期间可能审理一千件以上的案子。检察官单独向大陪审团提出证据，被告与其律师不只不在场，通常也不知道进行审理的是哪个陪审团或何时审理。假如多数陪审员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检察官便提出起诉书或向法官提出起诉通告 (truebill)，否则不予起诉。

历史上有两个论证对大陪审团有利。第一，大陪审团担任制约检察官之工作，防止检察官因政治或个人因素而利用职务之便骚扰无辜人民。理想上来说，是由一群公正无私的公民介入不道德的检察官与被告之间。支持大陪审团的第二个论证，是确保地区检察官已握有充分证据，足以作为启动一桩全面性审判所带来的麻烦与花费的正当理由——这是为了州，也是为了被告。

**预审**在废止大陪审团制的州当中，大多数采用预审方式来决定是否有充分理由审理被告。在预审时，检方提出案件，被告有权对证人进行交叉盘诘并提出有利的证据。通常被告不会选择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这个阶段争论；事实上，大部分案件中的被告往往都会放弃预审。

如果预审法官认为有正当理由进行初审，或假如预审被放弃，那么检察官必须提交诉讼状给进行审理之法院，精确简述将在新司法阶段提出的指控。

## 传讯

传讯是指被告为了因应大陪审团之起诉书或检察官之诉讼状而被带到即将进行审理之法院的法官面前的过程。通常由检察官或法官助理于公开法庭宣读被告被控之罪名。被告被通知拥有由律师代表的宪法权利，如果必要，会免费为其指派一名律师。

被告可选择的答辩方式有几种。最常见的答辩是有罪与无罪，但被告亦可以精神失常、曾经被告(曾经以相同罪名受审)，或「不争执」(noln contendere)作为无罪答辩的理由。不争执代表被告不否认案情但主张没有犯任何罪，或者也可能表示被告不了解指控。只有经过法官(有时还需检察官)同意，才可提出不争执之答

辯。这种答辯有两种好处，一来，被告可在面对大众时保住面子，因为即使被判刑或处以罚鍰，被告仍可于之后声称严格来说法院并未做出有罪判决。再者，此种答辯可让被告免除可能附随有罪答辯的民事刑罚(例如，因为认了诈欺或挪用公款之罪而可能发生的民事诉讼)。

假如被告作无罪答辯，法官将排定审理日期。如果有罪答辯，被告可能当场或由法官择日判刑。法院接受有罪答辯之前，法官必须证实被告自愿作出答辯，也知道该答辯代表的含意。有罪答辯实际上已相当于正式的有罪判决。

### 认罪协商(Plea Bargain)的可能性

州与联邦的所有刑事案件中，至少有九成不进行审理，因为在审理日期前，检察官与被告律师已针对被提出的正式指控和州可能向法庭建议的刑罚种类达成协议。实际上，是以允诺某种形式的减轻处罚换取被告认罪。

由于认罪协商在审理之前已经决定了被告的命运，法官只扮演确保法律与宪法程序得以妥善进行的角色。认罪协商分为三类(彼此并非互不相容)。

**减少控诉** 检察官与被告之间最普遍的协议方式就是将原来证据所支持的罪名减轻，大幅缩减了罪犯刑罚可能性的范围。罪犯认罪以换取较轻微指控的第二个原因，是避免留下会带来社会污名的定罪纪录。另一个可能性则是被告可能希望不要留下任何重罪纪录，因此愿意承认检察官提议的任何轻罪，这么一来就不用面对重罪指控了。

**删除无关的指控** 认罪协商的第二个形式是地方检察官同意放弃对某人未了结之其它指控。其方式有二：一是同意不「垂直」起诉 一意即不向某人被告提出更严重的指控，一是协议是取消「水平」指控，也就是取消被告同罪行之未了结的额外起诉。

此类认罪协商的另一种做法是同意移除起诉书中的累犯条款。在联邦层级以及许多州，如果某人在全美任何地点被判第三次暴力重罪，就被视为累犯。对于累犯的强制刑罚是终身监禁。州法院通常用移除累犯指控的方式换取认罪答辯。

这个认罪协商形式的另一种做法是同意将不同法院的起诉合并至同一法院，让刑罚同时发生。当许多管辖区域都发出起诉书或预审判决时，这些起诉书和预审判决就会进入协调系统的法院待审清单。这意味着被控以四项伪造文书和一项藏有伪造文书罪名的被告，可能被列在五个不同法院的待审清单上。通常，这种多法院管辖案子的一般作法，是将对被告的所有起诉转至清单上的第一所法院，让审判长有权同时裁量被告的所有课刑。

**量刑协商**第三种形式的认罪协商是指被告以认罪答辩换取检察官向法官要求从轻量刑。量刑协商的效力以司法体系中有限资源之事实为基础。至少在州层级，检察官有把握对被告承诺的某项建议刑罚能为法官所接受。如果法官不这么做，检察官的可信度将快速降低，许多先前认了罪的被告也开始提出无罪答辩，在法院冒险一试，结果可能导致法院待审案件大量增加，以致于超出负荷，造成司法体系运作停顿。检察官与法官都很清楚这个现实，被告律师也不例外。

**宪法和成文法对认罪协商的限制**正当的法律程序规定，认罪协商必须在自愿且充分了解的情形下进行，在州和联邦层级都是如此。这意味着法院必须告诫被告认罪后果(例如，被告放弃所有改变心意的机会)，被告必须神智清楚，并且就像一州所言之「显然未受任何恐惧或劝说所影响，也未在误信将有特赦的情况下因他人怂恿而认罪。」

对于前两类认罪协商 — 减少控诉以及删除无关的指控 — 联邦法院有其更严厉的标准。一是法官不能实际参与认罪协商过程：在州审级，法官可能在这个程序中扮演着主动的角色。同样的，如果联邦检察官与被告间达成认罪协商，则政府不可背信，一旦联邦政府背信，联邦地方法官就必须撤销认罪。最后，联邦地方法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在接受认罪之前，检察官必须提出指控被告之证据摘要，法官也必须同意有确凿之证据可证明被告之罪行。

**赞成与反对认罪协商的论点**对被告来说，认罪协商的明显利益是如果被告在最高条件下被起诉，就不会被那么严厉对待。而且，不出席审判也减少案件曝光度，因为被告基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压力，可能会希望避免冗长的正式审判与曝光。最



后，有些刑罚专家(专门研究刑罚与改过自新的专业人士)主张，罪犯改过的第一步便是认罪和认清自己的问题。

认罪协商也为国家与社会整体带来不同的利益。最明显的是定罪的必然性，因为不论证据如何有力，只要案件仍在进行，就有无罪开释的可能。而且，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法官可省下准备审理案件和出庭的大量时间与精力，毕竟这些案件已没有无罪的主张，再不就是不适合审判程序。最后，当警察不需出庭在刑法审判中作证，就可以花更多时间防止和解决犯罪。

认罪协商确实有其负面之处。反对认罪协商最常见的理由，是被告的刑罚可能不是以刑罚学为基础。认罪协商因为庞大的案件量而成为常规，导致刑罚常与案情、惩治罪犯的需要，或社会对于大力起诉案件的正当关注毫无关联。第二个缺陷是，假如认罪协商成为特定制度的基准，那么就连无辜的人都可能必须承受认罪的不当压力。研究显示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中，定罪机率愈小，协商就愈困难，原因可能是检察官希望能得到被告至少某种型式的最低限度自白。

认罪协商的第三个不利之处，在于滥用所谓过度指控(**overcharging**)的可能——检察官在过程中提出比证据所证明的更为严厉的指控，以期之后与辩方律师协商时能强化立场。

认罪协商制度的另一个缺陷是能见度非常低。检察官与辩方律师的协商并非在有立场中立的法官主持并开放给所有人观看的公开法庭进行，而很可能是在法院地下室的自助餐厅一边喝咖啡、一边决定的，全凭检察官和被告律师的道德良心。

最后，认罪协商制度有可能规避证据的关键程序与宪法规则。由于检察官不需在法庭提出任何证据或证人，因此就算是可能无法通过适当程序条款的案件，只要检察官虚张声势吓唬对方就可能定罪。被告可能处于劣势，因为某些州的公开原则(**rules of discovery**，允许被告详知检察官将提出之证据的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只能在认罪协商后着手准备案件。因此认罪协商可能会剥夺被告的基本宪法权利。

## 对抗式的过程

对抗式模式的基础假设是每件案子或争议都有两面：在刑事案件中，政府认为被告有罪而被告声称无罪；在民事案件中，原告宣称控告之对象造成了某种伤害，而被告拒绝承担责任。在法庭上，各当事人提供自己所认知的事实。支持此模式的理论(或希望)是，如果给予各方当事人完整的机会在立场中立且专注聆听的法官(与陪审团)面前提出全部的证据、事实，以及主张，实情就会显露出来。

双方的代表律师是这场法庭戏剧中的要角。法官的角色更像是被动、公正的仲裁者，其主要任务是确保双方不超出可接受的法律程序规则和法庭礼仪。唯有在双方有充分机会陈述案情之后，法官才能根据证据规则决定哪一方获胜。

## 刑事审判中的程序

假设没有达成任何认罪协商且被告坚持无罪，便会举行正式的审判。这是宪法第六修正案对于被指控犯了联邦法的所有美国人所保障的权利，也是各州法律 — 以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 对于被指控之犯了州法的所有人所保障之权利。被告在受审时拥有许多宪法与成文法保障之权利。以下是约束联邦与州法院的各项主要权利。

## 审判过程中被保障的各项基本权利

宪法第六修正案写着：「在所有刑事起诉中的被告皆享有迅速暨公开审判之权利。」制宪者特别强调「迅速」一词，是为了避免被告在审判前在狱中受苦太久，并让拖延过久的官司出现判决结果。然而迅速是多快？虽然最高法院给了这名词各种定义，国会通过 1974 年速审法时又赋予它新的定义。法案颁布时间限制，刑事案件必须于在百日内审理，否则便取消。大部分的州在成文法典中都有类似规定，不过确切的时限因地区而有不同。制宪者提出「公开审判」一词以表达对秘密程序的概念的不赞同。要是进行了秘密程序，那么被告就可能会在外界不知情的状况下受审，然后被打发到不为人知的拘留营。

宪法第六修正案也保障了美国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这至少表示即将担任陪审员的人们在审判开始之前不能带有任何成见。例如，检察官或该案受害者的亲友不能担任陪审员；认为与被告相同种族或血统者「皆可能犯罪」的人也不能担任

陪审员。「公正陪审员」概念的实践方式，是从选民登记名册— 越来越多的司法辖区会另以车辆登记、驾照、电话簿，以及福利名单等作为补充 — 随机挑选陪审员。虽然这个制度无法做到完美的跨区挑选 — 因为不是所有人皆为注册之选民 — 但最高法院已表明这个方法已经可以接受了。最高法院也规定，任何种族性别(例如非洲裔美国人与女性)皆不得被排除在陪审员的可能人选之外。

除享有在犯罪发生地点所属法庭受审和知悉被控罪名的保障权利，被告也有权与不利于他的证人对质。被告有权知道指控他们的人是谁和对方指控了什么，以便做出适当的辩护。被告「请律师协助」进行辩护的机会也在保障之列。在 1960 年代之前，只有罪行严重(在州层级)和请得起律师的人享有这项权利。然而，继最高法院一连串的判决之后，美国法律开始保障其罪行可能导致入监服刑之被告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而政府必须替贫穷的被告支付聘请辩护律师的费用。这项原则通用于国家与州层级。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声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遭受两次生命或身体的危害」。此即重复追诉(double jeopardy)条款，意指任何人不得因同样的罪行被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审判两次，不过，假如某人的行为违反了联邦法与州法，不代表就不会因为相同的行为受审两次。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在纽泽西州抢劫联邦注册银行，就等于违反了联邦法与州法，则这名抢劫犯可能在纽泽西州法院受法律审判并无罪释放后，又进了联邦法院为相同的行为接受审判。

被告在州与联邦审级中受到保障的另一项权利是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这项权利阐述的含意是，若某人决定不出庭作证，法官与陪审团不得因此做出不利于此人的处置。这项保障强化了美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也就是州必须负举证之责；除非政府用其它方式证明「罪证确凿、无合理疑点」，否则都假定被告无罪。

最后，最高法院已解释过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也就是非法搜索或取得之证据不得在法庭使用来对付被告。所谓证据排除原则是来自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最高法院也已订出对各州的限制。法院的目的是要排除任何警方可能非法获得对被告不利证据之机会。

## 挑选陪审员

如果被告选择不由法官审判 — 意即，不由单单一名法官审理和判刑 — 则由陪审团决定他的命运。在联邦审级，必须由 **12** 名陪审员做出全体一致的裁决，但在州审级，这项标准只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在许多州，一个陪审团的人数可能不到 **12** 人，其判决亦非经全体一致同意。

一群可能成为陪审团的人经传唤出庭。在陪审团资格审查(**voir dire**，意指「说真话」)过程中，这群人于公开法庭接受有关其担任陪审员之资格的询问。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对这些可能成为陪审员的人询问一般与特定问题。他们是州的公民吗？理解英文这个语言吗？他们或其家庭的任一成员是否曾因刑事犯罪而受审？是否曾读过即将审理的案件或已经形成任何看法？

在资格审查的过程中，州与辩方有两个目标。一是排除有对案件裁决不公之明显动机的小组成员。常见例子可能是依法被排除在陪审团名单之外的人，审判参与者的亲友，或公开承认对即将审判之案件持有激烈偏见的人士。对这类陪审员的反对被称为有理由的排除(**challenges for cause**)，这类排除的人数没有限制，由法官裁定这样的排除是否有效。

在讯问可能成为陪审员的人选时，对立双方的律师的第二个目标是排除他们认为可能对己方不利之人，即使这些人的潜在偏见并不明显。各方都获准提出一些先制性的反对 — 不说明原因就要求法院将某位陪审员排除在外。大部分的州习惯上都会给被告比检察官更多的先制性反对。在联邦审级，通常允许双方从每个陪审团排除一到三人，端视罪行本质而定；死刑案可多达 **20** 人。先制性反对的使用比较凭感觉，科学的成分较少，通常以律师的直觉为主。

过去，律师凭着先制性反对几乎无须任何理由就可以排除陪审员。然而近几年，最高法院已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做了解释来限制这项权力，禁止检察官使用排除方式不让非裔美国人或女性担任刑事陪审员。

询问与排除陪审员的过程会持续到有理由的排除进行完毕为止，先制性反对的额度不是用完就是放弃，**12** 人陪审团(有些州是六人)于焉成立。有些州也会选出替

补陪审员。这些人会出席审判，但只在某位原始陪审员无法继续参加程序时才参与商议。一旦选定陪审员，即由法官或法庭书记宣示就职。

## 开审陈述

正式审判开始之后，检方与被告进行开审陈述(虽然没有任何一州强迫被告这么做)。冗长而详细的陈述较有可能在有陪审团审理，而非法官审理，的情况下进行。开审陈述的目的在于为不熟悉法律与刑事调查程序的陪审团成员概述双方诉讼的主要目的、呈堂供证有哪些、会传唤什么证人，以及双方想要证明什么。如果开审陈述得不错，陪审员就可以很快理解证据与证词的重要性。一般程序是让州先进行开审陈述，接着让辩方在陈述中加以反驳。

## 检方的论据

在开审陈述后，检察官将由州搜集而来之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呈现在法庭上。证据一般分为两类——物质证据和证人证词。物质证据包括了例如子弹、弹道测试、指纹、笔迹样本、血液与尿液检验，以及其它文件，或可作为物证之物品。辩方可以反对其中任何一项物证并且，如果成功的话，将该项证据因素排除，不加以考虑。如果辩方反对不成，则物证会由法庭人员贴上卷标并成为官方纪录的一部分。

刑事审判大部分的证据是以证人证词的形式存在，其形式采问答程序，目的在于以井然有序的方式引导出特定信息，其目标则为呈现只与当前案件有关的证据，不提供有误导性或不相干的信息或非法证据以免造成无效审判(例如，显示被告先前曾因相同罪行被定罪的证据)。

辩方律师对每位证人都拥有交叉盘诘之权利。辩方的目的是质疑检方证人的证词——也就是让它不足采信。辩方律师可能试图让证人感到困惑、慌乱，或愤怒，使之无法自制并开始说出令人疑惑与矛盾的证词。如果辩方之后请证人作证，而其证词和州所提出之事件版本有矛盾之处，则检方证人的证词也可能会遭到质疑。完成交叉盘诘之后，检察官可进行覆主诘问(**redirect examination**)，以厘清或修

正交叉盘诘过程中的某个评判要点。在提出所有证人与证据之后，州的论据阐述便告结束。

## 辩方的论据

辩方提出论据的风格和形式与检方类似。实质证据较少出现在辩方的论述中，大部分的证据都是准备好要反驳或反对检方主张的证人证词。辩方律师询问证人的形式与检方相同。每位辩方证人可能轮流由地方检察官进行交叉盘诘，然后依序进行覆主诘问。

检方与辩方论据的不同处在于法律规定的义务。法律不要求辩方提出任何新的或额外的证据或证人。辩方可以只质疑州的证据与证人之可信度或合法性。辩方没有证明被告无罪的义务，只需证明州的论据并非「罪证确凿、无合理疑点」。被告甚至不需出庭作证。(然而，如果被告决定作证，将会面临与其它证人一样的交叉盘诘风险。)

被告的论据阐述结束时，检方有权提出反驳的证据。接着，辩方可以提出二次答辩，称为辩驳(surrebuttal)。之后，双方各提出结辩。通常，这是审判中最戏剧化的部份之一，因为双方会试图总结论点、浓缩最强有力的论证，并且向陪审团作出最后一次呼吁。新证据不会在这个阶段出现。双方的论证往往充满情感并诉诸超越整个案件的价值观。检察官可能会概论犯罪问题、对法律与秩序的需求，以及莫让对被告的怜悯妨碍了对犯罪受害者的同理心。另一方面，辩方律师可能会提醒陪审员「我们每个人这辈子都犯过错」，或主张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他们的任何怀疑都应以对被告有利的方式加以解决。检方可能比辩方更避免诉诸情感，因为在地方检察官在结辩中加入偏颇陈词之后，许多陪审团的判决都在上诉时遭到了推翻。

## 法官在审判中的角色

虽法官在审判中的角色虽然重要，却相当被动。法官不提出任何证据，也不主动诘问证人。检察官与辩方律师会要求法官裁定他们提出的许多请求，这些请求都是关于可以提出的证据种类和可以询问证人的问题类型。部分地区允许法官向证

人询问实质问题，并向陪审团评论证据的可信度；其它各州则禁止法官从事这些行为。即使如此，美国的司法传统兼容了多种司法形式，为个别法官的性格、训练，以及智慧保留了空间。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法官应该秉持公正，以确保双方在法律限制内尽可能提出完整论据为其首要任务。如果法官的表现和行事背离了公正、中立的角色，那么就是和美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教条背道而驰，置自身判决于被上诉法院推翻的风险之下。

虽然法官大多扮演这样的角色，其背景与价值观仍会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当他们被要求裁定正反论据同样有力、或从法律观点来看解释空间宽广的一项声请时——影响其裁决。

### **陪审团在审判中的角色**

陪审团在审判中的角色是被动的，其职责为注意聆听对立双方律师分别提出的论据，并只依呈堂供证进行裁决。他们通常不能询问证人或法官，也不能在过程中作笔记，不是因为宪法或成文法明文禁止，而是因为这是美国法院的传统惯例。

然而近几年，许多法官已准许让陪审员进一步参与司法领域。芝加哥美国地方法院首席法官约翰·葛瑞迪(John F. Grady)十多年来都允许法庭中的陪审员作笔记。至少有四个联邦上诉法院允许陪审团询问证人，只要陪审员不在审判中脱口询问，而律师在陪审员询问证人之前有机会反对特定问题。在某些州，少数初审法官准许陪审员在审判中扮演相当积极的角色。不过，陪审团在州与联邦审级中的角色基本上仍属被动。

### **给陪审团的指示**

虽然陪审团的职责是衡量与评估案件事实，但是法官必须就法律的意义以及如何应用法律方面给予陪审员指示。由于许多在上诉时被推翻的案件皆肇因于陪审团收到的指示不完整，因此法官往往会特别留意措辞在技术与法律上的正确性。

所有给予陪审团的指示必定有一些基本要素。其一是向陪审员解释被告所犯之罪的定义，可能包括提供陪审员定罪的各种选择。例如，某人杀了另一人，州可能会以一级谋杀加以起诉。然而，如果陪审团认定被告是凶手但并非蓄意谋杀，则法官必须让陪审团了解二级谋杀或过失杀人的法律定义。

法官必须提醒陪审团，举证责任在于州且被告被假定无罪。假如在检视过所有证据之后，陪审团对于被告之罪有合理怀疑，就必须提出无罪判决。

最后，法官通常会让陪审员熟悉各种程序性事务：若有问题如何与法官联系、指控超过一项时必须的考虑顺序，以及谁必须签署陪审团的判决文件。向陪审团宣读指示(且已给予双方律师提出反对的机会)之后，陪审员即退回评议室去决定被告的命运。

## 陪审团的判决

陪审团在完全秘密之下进行商议，没有外人观察或参与讨论。在商议期间，陪审员可能要求法官厘清一些法律问题，他们可以查看一些证物或挑选出的部分案件文字纪录，但参考的数据可能仅此而已—没有法律辞典、没有法律著作，也没有专家意见。当成员投票做出决定时，陪审团就回到法庭上宣布判决。如果陪审团到了傍晚还无法作出决定，那么就请团员们回家，并明确指示他们既不能与他人讨论案情也不能阅读报上与案件有关的文章。在重大或恶名昭彰案件中，法官可能会将陪审团隔离，也就是让陪审员在当地旅馆过夜，远离外界的眼光。

假如陪审团陷入僵局而无法作出判决，可向法官报告。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可能坚持让陪审团继续努力达

成判定，或者，如果法官认为陪审团实际上已陷入无可解决的僵局，则可解散陪审团并召开新的审判。

研究指出，多数处理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很快就作出判决。为了想知道意见分歧或一致的状况，几乎所有的陪审团在返回商议室后不久便投票表决。三成的案件只需表决一次即达成共识，其余案件中有九成是第一次投票时多数票胜出。唯有第



一次投票出现高比例的少数票时，才会出现悬而未决——未能作出裁定——的陪审团。

学者已发现，陪审员通常会作出与法官相同的判决——假设法官是单独为判决负责的话。一项大型的陪审团研究要求法官陈述他们会如何裁定由他们所主持的陪审团案件，结果发现法官与陪审团在 **81%** 的刑事案件中(和民事案件大致相同)意见一致，在 **19%** 的刑事案件中意见分歧，因为法官明显倾向将陪审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定为有罪。

陪审团达成判决后会回到法庭，通常由陪审团长公开宣布判决。此时，检察官或辩方律师通常会要求陪审团明确表态——也就是个别询问陪审员全体判决是否反映他们内心的真正意见，目的在于判断是否每位陪审员都支持整体判决，抑或只是屈服于群体压力。如果结果发现陪审团并非意见一致，他们就必须回到陪审团室继续商议；某些司法管辖区可能会宣布判决无效。如宣布判决无效，则案件可能由其它陪审团再次审理。由于原本的陪审团并未作出一致判决，因此没有重复追诉的问题。如果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则当庭释放被告，被告可径自离开法庭。

## 刑事审判后的程序

审判终结时，如被告被判有罪，通常还需经过两个阶段：判刑与上诉。

### 判刑

判刑是法院对被告的正式公告，刑罚也于此时提出。

在联邦审级与大部分的州，只由法官进行判刑。但数个州，被告可选择由法官或陪审团判刑。在死刑案件

中，州通常规定除非 **12** 名陪审员达成一致决定，否则不可处死刑。在一些州，陪审团判某人有罪之后会再次商

议刑期。有数个州会特别在陪审团中加入新成员以讨论判刑。此时，证据规则也较为宽松，陪审团获准聆听在

实际审判时被排除的证据(例如，被告以前的刑事纪录)。

法官宣布判刑后，在被告被判有罪和判处刑罚之间，通常历经数周。这段期间让法官听取或考虑辩方律师可能提出的任何审后声请(例如要求新的审判)并且让观护人进行判决前调查。观护人是拥有犯罪学、心理学，或社工背景的专业人士，负责向法官建议判处之刑期的长短。观护人通常会调查例如罪犯的背景、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以及罪犯继续参与非法行为之可能性等要素。法官不需遵照观护人的建议，但这项建议仍是影响法官刑罚考虑的主要因素。在决定刑事刑罚时，法官有各种选项和长度不一的刑期供他选择。其中的许多选项皆与改过自新的概念有关，因此需要犯罪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协助。

法官所能判的最轻惩处是缓刑。如果罪行不严重或法官认为罪犯不太可能再涉入更多犯罪活动，就会予以缓刑。一旦处以缓刑，只要罪犯维持缓刑的条件就不必坐牢。缓刑条件可能包括远离被判刑的罪犯、不犯其它罪或犯罪频率减少，以及从事某些社区服务工作等。一旦罪犯服完缓刑且无任何事件发生，其犯罪纪录通常会被清除，在法律上视同未曾犯罪。

如果法官不打算判缓刑，并认为入狱服刑是恰当的，则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判处入狱服刑。刑期有长短范围而非自动指定的原因是，法律认为并非所有的罪行与罪犯都一样，而惩罚原则上应与罪行相符。

为了消弭判刑上的严重差别，联邦政府与许多州已试图建立一套精确方针以提高法官之间的一致性。在国家层级，这份努力在 **1987** 年制订的量刑改革法中显露无遗，此法案为判刑过程建立了一套方针。

国会规定法官只能在发现委员未充分考虑到的恶化或缓和情况下违反量刑方针。虽然国会提供的方针没有明确指出可违反量刑方针的因素类别，但国会确实声明这些因素不可包括种族、性别、国籍、信仰、宗教、社会经济地位、药物依赖，或是酗酒。

各州也设有许多避免法官量刑差异过大的方案。截至 **1995** 年，已有 **22** 州设置了委员会为法官制定判刑方针。截至 **1997** 年底，这样的方针已在 **17** 个州生效。同样的，现在几乎所有的州都实施了强制的判刑法律，针对特定罪行判决之量刑

做出必然、明确的规定— 特别是暴力犯罪、使用枪枝的犯罪，或惯犯所犯之罪行。

尽管法官对判刑有莫大的影响，却不一定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法官何时提出刑期，仍受联邦政府与州的假释法之影响。因此，假释委员会(有时是批准特赦与减刑的总统与州长)对于囚犯服刑时间长短，才有最后决定权。

## 上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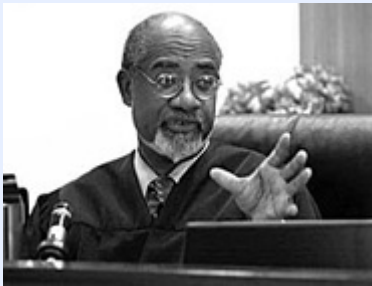
在州与联邦层级，每个人都有权对重罪之判决至少上诉一次，但实际上几乎没有罪犯利用这项特权。上诉的基础在于审判过程中发生了法律错误，这项错误必须是可逆转且非无害的。如果错误的发生对于审判结果毫无影响，则被视为无害。然而，可逆转的错误却非常严重，可能已经影响了法官或陪审团的判决。例如，成功的上诉可能是以主张在审判中不当接受证据、法官给予陪审团的指示有缺陷，或认罪并非在自愿情况下进行等为依据的。然而，上诉必须以程序问题与法律解释为理由，而非对被告有罪或无罪之事实确认。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在美国无法针对刑期长短提出上诉(只要刑期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刑事被告的确有部分成功上诉机率(约两成)，但这不代表被告从此自由。上诉法院的一般作法是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审。此时，检方必须决定是否能在第二次审判中解决原审中的程序错误，以及是否值得花费时间与精力这么做。第二次审判并非重复追诉，因为被告已经选择对原始判决提出上诉。

关切法律议题的媒体与民众通常会留意将明显有罪之犯人予以释放的上诉法院和以技术问题被逆转的判决。这样的事情当然会发生，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中不可避免之现象，因为司法体系的基础在于公平竞争与被告的无罪推定。然而，所有被告中约有九成认罪，而这种有罪答辩就等于排除了上诉的可能性。至于其它人，有三分之二于审判中被判有罪，而其中又只有一小部份上诉。在提出上诉的人当中，大约只有两成有成功的可能性。而在判决获得逆转的人当中，许多人在之后的审判中被判有罪。因此，原先被判有罪、后来因为可逆转的法庭错误而得到释放的人数，只占小小的百分之一。

## 第六章

### 民事法院程序



奥勒冈州茂特蒙马市巡回法官罗斯福罗宾森(Roosevelt Robinson)在一起涉及侵权法的民事案件中要求陪审团各自回答其裁决结果。此案控告某公司的产品有瑕疵。(AP/WWP)



破产与债权人的权利是合约法的重要领域。上图为美国航空公司所属的一架喷射机。该公司差一点在 2003 年声请破产。(© Scott Olson/Getty Images)



产品责任是侵权法中成长最快速的次领域，愈来愈多厂商即使已经尽到注意之责，却仍须负起法律责任。上图，产品责任律师罗夫·帕提诺(Ralph G. Patino)展示一个轮胎。他的客户表示轮胎胎面与胎体剥离导致了严重事故——这是使得费尔斯通轮胎公司(Firestone Company)于2000年回收数百万枚轮胎的诸多索赔诉讼之一。(© RobertKing/Newsmakers/Getty Images)



两名小孩正在等待曼哈顿家庭法院裁定监护权结果。无过失离婚制度使得监护权纠纷变得更普遍，因此法院必须判决由哪一方家长取得监护权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Carrie Boretz/The Image Works)



媒体的大量报导经常促使辩方律师要求更换审判地点，以避免对其客户的案件，例如酒驾所造成的车祸，造成不利。(AP/WWP)



宪法第七修正案与州法保障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团审判权。因此，许多公民，

例如这些来自密执安州马科姆郡的妇女，被召集担任陪审员。 (AP/WWP)

**民事诉讼有别于刑事诉讼程序。**本章重点在于民事法院：民法与刑法有何不同、民法最重要的种类、审判的替代方式，以及对民事审判程序的逐步检视。

## 民法的本质与要义

美国司法体系奉行刑法与民法之间诸多重要差异。刑事法与侵犯整体社会的行为有关，而民事法主要涉及公民之间的义务。民事案件中，纠纷通常发生于私人之间，不过政府有时也可能成为民事诉讼的一方。刑事案件则是由政府对个人涉嫌侵犯社会的罪行所提出的起诉。

在民事案件中，法院试图以判决法律权利的方式解决诉讼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接着法院会决定适当的救济方式，例如判给受伤的一方赔偿金或发布一项命令指示一方当事人履行或禁止从事某项行为。在刑事案件中，法院决定被告是无辜或有罪。有罪的被告被处以罚鍰、入狱服刑，或两者。

在某些案例中，同一行为可能导致刑事程序与民事诉讼。假设两名政治学家「乔」与「彼特」前往亚特兰大参加会议。他们从机场搭乘同一部出租车到市中心的饭店，一路上两人激烈地讨论着政治，而于出租车抵达饭店门口时发生肢体冲突。如果彼特下车时用公文包打乔的肋骨，彼特可能会被控刑事暴行罪。此外，乔也可能对彼特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赔偿金来支付医药费。

无论是在联邦或州法院，民事案件一般都较不为媒体所关注，但其件数却远高于刑事案件。民事诉讼往往挑起重要的政策问题，社会上许多争论皆属民事范围。司法学者赫伯特·雅各布(Herbert Jacob)在《美国司法》(Justice in America)中概述民法领域的范围：「每一桩破裂的协议、每一桩令顾客不满意的买卖、每一件未收回的债务、每一桩与政府机关之间的纠纷、每一件毁谤与中伤、每一起意外伤害、每一次婚姻破裂，以及每一起死亡都可能引起民事诉讼。」

因此，任何发生于两人或多人之间的纠纷几乎都可能成为民事诉讼的导火线。民事诉讼的案件量庞大，但大多可归入五个基本类型。

## 民法的主要类型

民法分为五大类：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继承法，以及家庭法。

### 合同法

合同法主要是关于两人或多人之间的自愿协议。一些常见例子包括同意执行某项工作、买卖物品，以及建造或修补房屋或商业建筑。构成这些协议的基础是一方承诺某事而另一方也做了相应的承诺，通常是一方承诺为另一方的服务或货物支付金钱。例如，「柏恩司先生」与「柯德小姐」签订一项合约，柯德答应如果柏恩司帮他砍一捆橡木柴并于 12 月 10 日运到她家，便支付 125 美元。如果柏恩司当天无法将木柴运到便是违约，柯德可以上法院告他要求赔偿。

许多合约相当单纯、直接了当，但有些复杂的领域也建立在合同法或合约概念上，商业法即为一例。商业法主要涉及信用或分期付款计划的销售行为，其处理范围还包括支票、本票，或其它可转让的金融工具。

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领域是破产与债权人权利。破产的个人或公司可能会经历一个将过去一笔勾消、声请破产者从头来过的过程，破产过程也旨在确保对债权人的公平性。破产法多年来一直是立法者的关切焦点，有许多专门的破产法法官现在隶属于美国地方法院。

最后一个领域是保险合约，由于适用于许多人，因此非常重要。保险业受政府机构之管理和该业界特有之规定的约束。

### 侵权法

侵权法一般被认为是民事违法行为法，主要与造成伤害且未符合社会标准的行为有关。

侵权法以个人伤害或人身伤害赔偿为中心，传统上这类赔偿以汽车意外占大多数。成长最快速的一个侵权法次领域是产品责任。就作为迫使公司对于瑕疵食品、玩具、设备、汽车、药物，或其它众多产品所造成的伤害负起责任的手段而言，这个次领域的效果日益显著。

也许产品责任案件成长快速的原因之一，是证据标准的一项改变。传统上，在某人能够领取因为另一人的伤害而得到的赔偿金之前必须证明过失行为的发生(通常指的是在法律诉讼中揭露的特定情况下疏忽或未行使普通注意)。然而有些人主张，多年来对过失行为概念的依赖已经降低，在产品责任案件中尤其如此。法庭上通常使用严格的责任标准，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过失行为，或就算厂商也很注意，受害者仍可取得损害赔偿。

一般认为，产品责任案件成长快速的另一个原因，是陪审团在判决有利于原告时的裁定额。陪审团的损害裁定额可分为两种：补偿性与惩罚性。补偿性赔偿金的目的是支应原告的实际损失，例如修理费、医药费等，而惩罚性(或惩戒性)赔偿金的用意则是惩罚被告，或警告被告日后不得再有这样的行为。

高额的陪审团裁判额和日益增加的所谓琐碎案件引发了关注，因此，政府官员、企业主管，利益团体，以及法律界的成员纷纷呼吁立法机关进行侵权法改革。在1990年代的十年间，许多州都颁布了各种侵权法改革措施。鼓吹侵权法改革的美国侵权法改革协会(American Tort Reform Association)提出报告，指出各州已限制了非经济损害的裁定额、修正了主管惩罚性赔偿的法令，或颁布了惩罚提出琐碎案件之原告的成文法。

另一个成长快速的侵权法次领域是医疗疏失(medical malpractice)。医疗疏失索赔案件随着医学的长足进步而增加。当代医学有两个持续存在的问题：随着新治疗方式而来的高风险，和医师与医院的不涉及私人(impersonal)特质。今日的病人对医师怀有高度期待，当期待转为失望，病人会感到愤怒从而提出医疗疏失诉讼。

法院在处理医疗疏失诉讼时一般会使用传统的过失标准而非严格的责任原则。这代表法律对医师并无担保治疗成功的要求，而是要医师在病患确实证明医师未依



可接受之医疗方式进行医治的情况下负起责任。各州对于何谓可接受之方式的概念不同，因此这类问题必须由法院采逐案基础解决。但是，一般的推定是专业人员(包括医师)之行为在本质上要合理，意思是受到损害的病患若想在法庭上战胜医师，就需要至少一位或更多专家证人的证词来证明医师的行为不合理。

## 财产法

传统上，不动产与个人财产两者有所区别。前者通常指房地产 — 土地、房屋，与建筑物 — 还包括生长中的农作物，其它项目几乎都被视为个人财产，包括金钱、珠宝、汽车、家俱，以及银行存款等。

根据劳伦斯·傅利曼(Lawrence M. Friedman)在《美国法律》(American Law)所言，「就法律而言，财产一词主要指不动产；个人财产重要性居次。」法律上没有任何一个特殊领域专管个人财产。个人财产一般被视为合约法、商业法与破产法之下的一部份。

财产权在美国一直以来都相当重要，但如今，财产权的复杂性已经超过对某物的所有权。现在，财产的概念主要是指使用该所有物的权利。

今日财产法的一项重要分支是土地使用的控制。最常见的土地使用限制是分区管制，也就是地方法令规定将一个自治区划分为不同用途的数个地区。例如，将一个地区设为住宅区，一区为商业区，而另一区为工业区。

早期的分区法受到质疑，原因是土地使用的限制等于政府违宪强征收土地。宪法规定「除非给予合理赔偿，否则政府也无权征收私人财产作公共用途。」在某种意义上，分区法的确以自认为合适的方法将土地的使用权利从所有者手中拿走，不过法院大体上认定分区法并非违宪强征。现今，分区是存在于全美所有规模之市镇的一个事实。都市规划者与市府官员认为就都市地区的规划和稳定发展而言，分区法确有其必要。

## 继承法

继承法谈的是如何将财产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美国司法体系认可个人依照自身意愿处理财产之自由。最常见的继承方法是执行遗嘱。如果某人留下一份有效遗嘱，法院便会加以执行。但若某人未留下遗嘱(或遗嘱草拟不当)，那么此人便是未留遗嘱之死者，州必须处理其财产。

州根据州成文法订定的固定方案处理这类财产。依法，未留遗嘱之财产要传给已故者的继承人——也就是死者最亲近之亲属。有时，未留遗嘱之死者没有任何活着的亲属。在这种情况下，则将财产充公或留给已故者居住的州。州成文法通常禁止远房亲戚，例如相同曾祖父母的同辈(**second cousins**)和叔(伯)祖父母(**great uncles and aunts**)继承这类财产。

愈来愈多美国人开始准备遗嘱，以确保财产能依自身意愿而非州所规定的方案处理。遗嘱是一份正式文件，必须谨慎草拟，因此大部分的州规定草拟遗嘱时至少需有两个人在场作证。

## 家庭法

家庭法处理的是诸如结婚、离婚、子女监护权，以及子女权利等事务，该法每年无疑触及了非常多美国人的生活。

进入婚姻的必要条件都清楚写在州法上，一般而言包括了双方的最低适婚年龄、必要的血液测试或身体检查、双方的心理状况、证书与费用规定，以及等待期等。

婚姻的终结一度是很罕见的。在 19 世纪初，有些州只允许透过某些州议会法案离婚；而南加州则不允许离婚。在其它州，只有当一方证明有离婚的理由，才准许离婚。换句话说，只有配偶犯下通奸、遗弃，或虐待罪行的无罪当事人才能获准离婚。

20 世纪见证了离婚法令的重大改变，从限制性的法律转向无过失离婚。这种趋势的兴起有两个因素。第一，对离婚的需求多年来持续增加。第二，以往加诸于离婚者的污名已经消失。

无过失离婚制度是指夫妻只要解释双方之间存在无法和解的差异致使婚姻无法继续即可。无过失离婚制度结束了离婚诉讼的敌对本质。

无过失离婚制度是指夫妻只要解释双方之间存在无法和解的差异，使得婚姻无法继续。无过失离婚制度结束了离婚诉讼的敌对本质。

不易解决的是婚姻结束可能造成的一些其它问题。子女监护权、子女抚养费，以及探视权之争经常在法院上演。和无过失离婚制度问世之前相比，监护权之争在现今更可能发生也更常见。小孩的需求是优先考量，而法院也不再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表示监护权要判给母亲。获得监护权的父亲愈来愈多，现在法院也常把共同监护权判给已经离异的父母。

## **与民法有关的法院与其它机构**

争执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是很常见的。这些争执通常可以在司法制度外解决，然而有时争执过于激烈，以致一方不得不寻求诉讼途径。

## **决定是否上法院**

每年未经审理而解决的潜在案件有数千桩，因为可能的诉讼者以其它方式解决了问题或原告决定不提出控告。面临向法院提告、试图解决差异，或干脆把问题忘掉的抉择时，许多人会诉诸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意即，他们会在与审判相关之成本和如果打赢官司可能得到的好处之间作一番权衡。

## **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案**

实际上，用到完整的司法过程的人很少。大部分的案件其实都是在未诉诸完整审判的情况下解决的。民事案件的审判可能既费时又昂贵。在许多地区，由于积压的案件过多，一个案子通常要等三到五年才得以审理。此外，民事审判可能是极度复杂的。

通常，审判费用就足以使潜在原告打消念头。即使原告赢了官司，在所有人对审判完全没有异议之前——要是真的有人人都对审判毫无异议的一天的话——输掉

官司的可能性也永远存在。换言之，审判可能只会为当事人带来新问题。基于上述理由，愈来愈多人已经开始讨论解决纠纷的替代方法。

从大型公司到律师或个人都有愈来愈多人支持替代性解决争议方案(**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又称 **ADR**)。美国的企业界不希望冗长又昂贵的法庭诉讼是解决复杂商业纠纷的唯一方法。此外，当有必须快速解决案件或以保密方式处理某些事务的需求时，律师会较常考虑例如仲裁与调解之类的替代方案。个别公民也越来越常求助于地方调解服务来协助他们解决家庭纠纷、邻居争执，以及消费者申诉。

替代性解决争议方案有各种实施形式。苏珊·凯塔(**Susan L. Keita**)在《法院行政与管理手册》(**Handbook of Court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中写道，实施的形式通常可分为「私人、法院涉及，以及法院附设，但后两种往往被称为法院相关。」换言之，有些私人 **ADR** 程序的运作完全独立于法院之外。法院涉及的 **ADR** 程序在法院外运作但仍与法院有一些关系。法院在法院附设方案中实施 **ADR** 程序。凯塔指出，「**ADR** 可能是志愿或强制的；可能是限制性的或允许判决之上诉的；可能是双方同意的、经由审判的，或是两者以某种方式混合而成的」，端视问题的型态和议题而定。一般常见的 **ADR** 有调解、仲裁、中立的事实发现、精简型审判、即决陪审团审判，以及聘请退休法官。

**调解(Meditation)** 调解是一个私人且保密的过程，由一位公正人士协助纠纷当事人找出并澄清相关问题从而让双方达成协议。调解人不扮演法官的角色。对于最后的和解有控制权的是当事人本人。

调解特别适合有持续的关系争执者，例如家庭成员、邻居、受雇人与雇主，以及房东与房客。调解也适用于离婚案件，因为它将冲突的过程变成合作的过程。子女监护权与探视权也常以此方式解决。其它许多领域，例如个人损害与涉及保险公司的财产索赔，也经由调解解决。

**仲裁(Arbitration)** 仲裁的过程和上法院类似。在听取争执双方谈话后，一名称为仲裁者的公正人士决定争议该如何解决。过程中并无法官或陪审团，而是由

双方挑选出的仲裁者作最终决定。仲裁者来自各种不同的专业背景，往往自愿付出时间协助人们解决问题。

争执者之所以选择仲裁，是为了节省时间与金钱，而且不如法院审理般正式。大部分仲裁可于四个月内完成，相较之下，法院裁决过程则需半年到数年。

在不公开的情况下，仲裁也用来解决各种消费者的申诉。这类例子包括不当汽车维修纠纷、退回瑕疵商品的问题，以及服务索价过高等。仲裁也用于法院涉及与法院附设的程序，以解决数种型态的纠纷，包括企业、商业，以及劳资纠纷等。

**中立的事实发现(Neutral Fact-Finding)**中立的事实发现是指在非正式过程中由一名大家都同意的中立人士调查纠纷。纠纷通常涉及复杂或技术性议题。中立的第三者分析纠纷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发表在一份不具约束力的报告或建议书当中。

这个程序特别适合处理公司内传出的种族或性别歧视，因为这类案件容易引起强烈情绪和内部意见不合。假如双方当事人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员工，那么利益冲突会妨碍主管针对歧视传言进行公正调查的能力。为避免发生不公，公司可能会求助于中立的第三人以期达成所有员工都能尊重的解决方式。

**精简型审判(Mini-Trial)**在精简型审判中，双方以类似审判之形式，在由经挑选之双方代表和中立第三人组成的小组面前表达立场。每个小组都有一名中立的顾问。精简型审判旨在促成问题的厘清，并为实际可行之解决协商建立基础。双方代表向小组发表各自立场与论点之概要。这样一来，双方就更了解对方的立场。来自双方的代表在小组面前概述己方立场和主张。这么一来，每一方都更了解对方的立场。在听完双方陈述之后，小组(包括顾问在内)开会找出解决之道。中立的顾问可能也会就案件的是非曲直发表咨询意见。除非双方事前以书面方式同意遵循，否则这份意见不具约束力。

精简型审判的主要优点是双方当事人都有提出解决之道的机会。这也表示双方都有代表人和了解详情的途径。

**即决陪审团审判(Summary Jury Trial)**即决陪审团审判指的是在提出诉讼后、达成裁定前，由法院处理的一个程序。在即决陪审团审判中，双方分别在陪审团(通常是六人)面前申论，概述各自的论点以及简短的开庭与结案辩论。律师通常有简短的时间(一小时以内)陈词，但只能发表审判可接受之数据。宣誓证人之证词一概不予采用，其间过程也不加记录。由于整个过程不具约束力，其程序与证据规则较正常审判更具弹性。

陪审团根据双方提出的辩论作出不具约束力的判决，这样的判决旨在让律师及其客户对案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陪审团可能也会建议解决纠纷的基础。如果争议未在即决陪审团审判的过程中或结束当时立即得到解决，则在法院举行审前会议。

即决陪审团审判的主要优点之一是花费的时间。比起动辄数天或数周的完整审判过程，即决陪审团审判通常花不到一天。

**聘请退休法官(Private Judging)**这种替代性解决争议的方式是利用退休法官所提供的收费服务。提倡者宣称这个方法有数种好处。第一，案件当事人可挑选具有充分资格与经验之人士处理案件。第二，当事人可以确定案件能在第一次排定时间时就获得解决，不会因为法院日程表排得太满而无法继续。最后，费用可以比完整诉讼更低。不过，有些人批评退休法官收费过高。例如加州的一个上诉法院就曾指出，某些在任的法官为了赚更多钱而离职去担任私人法官。

## 专门法院

州法院体系通常下辖多种为处理特定种类的民事案件而设置的专门法院。家事法院通常以处理如离婚、子女监护权，以及抚养子女等事务为宗旨。在许多司法管辖地区，遗嘱认证法院则处理遗产和遗嘱争议。

也许最为人熟知的专门法院是小额赔偿法院。小额赔偿法院拥有处理求偿金额未超过一定上限之案件的审判权。金额因司法管辖地区而不同，但上限通常是 500 或 1,000 美元。小额赔偿法院让较不复杂的案件在处理时不用像多数的其它初审法院那么正式。诉讼费用低廉，通常也不鼓励聘请律师，因此一般人都负担得起。

## 行政组织

多个政府机构都设立了拥有类似司法权威的行政组织来处理某些类型的案件。举例来说，在联邦层级，联邦交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与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都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进行了各类判决。对于这些机构的判决的上诉，可能会交给联邦的上诉法院审理。

在州层级，行政组织协助解决民事索赔的一个常见例子是劳工补偿管理局。该局判断员工的伤害是否与工作有关和是否有资格得到劳工补偿费用。许多州的汽车监理所都设置听证委员会决定吊销驾驶执照与否。另一种常见的州行政委员会则裁定公民权事务与涉及歧视之案件。

## 民事审判过程

有些纠纷透过替代性解决争议方案、在专门法院，或由行政组织解决。然而，每年仍有许多案件进了民事法院。

一般而言，刑事审判使用的对抗式过程也使用在民事审判中，只是有一些重要的差异。第一，诉讼者必须适格(**have standing**)。这个概念是指提出诉讼者在争议结果必须有个人利害关系，否则当事人之间就没有真正的争议，而法院也没有实际的案件可以裁决。

第二个主要差异在于民事案件使用的证据标准是优势证据，而非刑事案件中较为严格之「罪证确凿、无合理疑点」的标准。一般来说，优势证据代表有足够的证据克服怀疑与猜测。这明显意味着民事案件所需的证据少于刑事案件。

第三个主要差异是，刑事审判中许多被告的正当程序保障都不适用于民事诉讼。例如，双方当事人都无权获取律师帮助。宪法第七修正案所保障之拥有陪审团审

判权利的是「诉讼的价值必须超过 **20 美金**」的案件。虽然这项修正案尚未于各州施行，不过大部分的州都有类似的宪法保障。

## 提出民事诉讼

提出民事诉讼者称为原告，被控的一方称为被告或答辩人。民事诉讼以原告与被告的名字定名，例如琼斯诉米勒(**Jones v. Miller**)案，原告的名字置于前。典型的情况是由辩方律师支付费用向合适法院的书记提出诉讼或声请。诉讼声明了诉讼原由、涉及的损失，以及寻求的审判或救济。

该由哪间法院审理案件则与司法管辖权的概念和审判地点有关：司法管辖权指的是法院执行司法权力的职权，审判地点则代表应该执行该权力的地点。

当法院拥有被告的事物与人身拥有管辖权，就符合了管辖权之规定。这代表好几个法院都有同一案件的管辖权。例如，假设一位俄亥俄州达顿市的居民在一起发生于田纳西州的车祸中严重受伤，他被一辆车从后面撞击，该车驾驶是田纳西州金斯波特市的居民，而这位俄亥俄州居民的人车损伤约为 **80,000 美元**。俄亥俄州审判庭拥有事物管辖权，而且非常可能得到被告的管辖权。此外，田纳西州法院可能拥有管辖权，又因为该案涉及各州公民间的诉讼且诉讼金额超过 **75,000 美元**，所以俄亥俄州与田纳西州的联邦地区法院也都有管辖权。假使管辖权是唯一的考量，则原告可在上述的任一法院提告。

合适的审判地点可能由成文法以避免可能之偏见为理由或纯粹为了方便而规定。联邦法规定合适的审判地点必须是原告或被告的居住地或伤害发生的地点。州成文法对于审判地点的规定稍有不同，但只要涉及土地，则通常规定合适的审判地点为土地所在之郡。在大部分的其它情况下，审判地点都是被告居住的郡。

审判地点的问题可能涉及察觉到或害怕法官或未来的陪审团存有偏见。律师有时会为此反对在某地审理案件并要求更换地点。虽然这类反对在曝光度较高的刑事案件中或许较为普遍，但是也出现在民事审判。



一旦确定适合的法院并提出诉讼后，法院书记将诉讼内容的副本附加于传票中发给被告。传票由警长办公室人员、联邦法院执行官，或私人诉讼服务机构发出。

传票规定被告必须在一段时间内(通常 **30 天**)提出回复，也就是答辩。被告不这么做的话会受到缺席审判。

由被告、法院书记，以及发送传票者所执行的简单行动启动了民事案件的运作。接下来在真正的庭审之前还会出现一连串的活动，而且可能维持数月。约有 **75%** 的案件在这段期间内未经审判便获得解决。

### 庭审前的活动

**声请(Motions)**被告一旦收到传票，辩方律师可以提出一些声请。律师可以传票未被妥善传达为由提出要求法院撤销传票的声请。例如，被告可能声称传票未依州法规定当面送达。

有两种声请可用来澄清或反对原告的申请。其一是取消法院的声请，或以部分请愿书内容偏颇、不当，或不相关为由加以取消。另一种声请是更明确请求法院要求原告提供更多诉讼细节。

第四种常在民事案件中提出的声请是驳回原告之诉。此种声请可能主张法院没有管辖权，或可能坚称原告没有提出诉讼之完整法律基础，即使诉讼陈词为真。

**答辩(The Answer)**如果诉讼通过了法官对声请的裁决，被告接着就要提出答辩。答辩可能包括承认、否认、辩护，以及反诉。如果在答辩中承认罪行，则审判时便不需证明事实，若以否认作为答辩，审判时就必须证明事实。被告在答辩中提出的某些事实可能会让原告无法得到赔偿。

被告也可能另外提出一项名为反诉的诉讼。如果被告从同一事件中找到控告原告的理由，就必须向法院提出请求以响应原告之请求。原告可对被告的答辩进行再抗辩。原告可于再抗辩中承认、否认，或针对反诉中的事实陈述提出辩护。

**证据揭示(Discovery)** 美国法律体制有证据揭示程序的设计；也就是双方都有资格取得对方拥有的信息。证据揭示的工具包括：

- 取口供证词(**deposition**)是证人在法庭外于宣誓后所说的证词。口供证词使用与法庭相同的问与答形式。所有的案件当事人必须被告知要进行取证，以便其律师到场交叉盘诘证人。
- 书面询问(**Interrogatory**)是指必须在宣誓下回答的书面问题。书面询问可以只提交给案件当事人，不提交给证人，目的在于取得对诉讼另一方所拥有之证据的陈述。
- 诉讼其中一方如果希望检视文件、信件、图画、图表、地图、照片，或对方拥有的其它对象，可要求调阅诉讼其中一方的相关文件(**production of document**)。
- 若对诉讼之一方当事人的身心状况存疑，法院可令该当事人呈交一份医师检查报告。**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在出庭之前，法官可召开审前会议，与双方律师进行非正式的案情讨论。通常此会议只允许法官与律师参加，并于法官室进行。在这个会议中，法官与双方律师就无异议之事实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称之为协议(**stipulation**)，目的是藉由减少法庭中必须争议的议题数量，好让实际的审判更有效率。双方律师也分享案件的证人名单与文件数据。律师与法官也可利用审前会议来解决案件。有些法官主动促成案件和解，使之不必上法院审理。

## 民事审判

**挑选陪审团** 联邦法院民事诉讼的陪审团审判权受到美国宪法第七修正案的保障。州法律同样保障此项权利。若放弃陪审团审判，则由法官裁定。虽然传统的陪审团是由 **12** 人组成的，但是现今的人数不一。大多数联邦地方法院目前在民事诉讼中使用少于 **12** 人的陪审团。大多数的州也允许在部分或所有民事审判中使用人数较少的陪审团。

刑事审判的陪审员必须跨区随机挑选以达公平。大批陪审员被召集至法院，之后当案件被指派于某一法院审理时，再将一小群陪审员候选人派至特定的法庭。

在陪审团资格审查中，双方律师可以反对某些陪审员。审查完毕后，听取某案件的陪审团就座。律师可能提出理由排除某位陪审团候选人，法官必须决定被反对的人是否公正。双方也可能进行先制性反对—没有理由就排除某位陪审员。不过，美国最高法院已裁定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的平等保护禁止以种族或性别为由取消民事审判中的陪审员资格。先制性反对受限于成文法或法院规定，通常只有二到六人。

**开审陈述**选出陪审团后，双方律师即开审陈述，从原告律师开始。原告律师向陪审团解释案情和原告一方希望证明什么。通常，辩方律师可选择在原告律师陈述结束后立即进行开审陈述，或等到原告的论据完整陈述后再进行。如果辩方律师选择等待，则会从开审陈述开始接连陈述完整论据。开审陈述概述了案情并让陪审团更容易了解提出的证据，用处很大。

**原告论据之陈述**在一般民事案件中，原告是先提出并证实其论据的一方，也是最后结辩的一方。陈述案件时，原告律师通常会传唤证人作证并提出文件或其它证据。

证人被传唤时，由原告律师对其进行直接询问，接着轮到辩方律师询问或交叉盘诘证人。亚利桑纳州最高法院最近采取了协助陪审员在民事案件中作出更妥善裁决的措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该州的最高法院投票决定让陪审员透过法官向证人提出书面问题，其它州也在考虑跟进这项新作法。交叉盘诘后，原告律师可以进行覆主诘问，接下来被告律师可能会进行第二次交叉盘诘。

一般而言，证人只可就实际上看到的事情作证，不可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这项通则有一重要例外，那就是特别被传唤前来就自己专门领域之事务提出看法的专家证人。

要成为合格的专家证人，就必须拥有特殊领域的丰富知识。而且，该知识通常必须于公开法庭中被建立。两方通常派出意见相左的专家，若发生这种情形，陪审团必须决定哪一个看法正确。

当原告一方已提出所有证据，其律师的论据便告一段落。

**声请指示裁决(Motion for Directed Verdict)**原告一方的论据告一段落后，被告通常会声请指示裁决。被告提出这项声请的意思是原告未证实其案件，所以应该输掉官司。此时法官必须决定如果法院程序停止，原告是否可在此时赢得官司。如果法官裁定原告并未提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就会认可这项声请，并为被告作出裁决。如此一来，原告就输掉官司了。指示裁决的声请类似于审前驳回原告之诉。

**被告论据的陈述**如果指示裁决遭到驳回，被告接下来必须提出证据。被告陈述论据的方式与原告类似，也就是对证人直接询问和提出文件和其它证据。原告有权交叉盘诘证人，接着可能进行覆主诘问和覆反诘问问题(recrossquestions)。

**原告的反驳**被告陈述论据后，原告可以提出以反驳被告之证据为目的的反证。

**答询原告的反驳**辩方律师可提出证据，对原告反驳的证据提出反击。这种反驳与答询的模式可持续进行到提出所有证据为止。

**结辩(Closing Arguments)**提出所有证据之后，双方律师向陪审团进行结辩，或辩论总结(summations)。最先和最后发言的都是原告律师。也就是说，由原告律师开始和结束辩论，被告律师则于其间辩论。在过程中的这个阶段，律师会攻击对方证据的可信度，并试图证明对方证人不足以采信。为达此目的，律师通常向陪审团提出有说服力的诉求或诉诸情感。然而，其论证必须以有证据支持且审判时已提出之事实为基础。

**给陪审团的指示**假定并未放弃陪审团审判，那么陪审团将于结辩结束后得到指示。法官告知陪审团其判决必须以审判时提出的证据为基础。法官的指示也让陪审员知悉与这个法律概念有关的规定、原则，以及标准。在民事案件中，对原告有利的判决是以优势证据为基础的。这表示陪审员必须衡量审判时提出的证据并在心中判断较具影响力的证据，就法律依据与价值而言，有利于原告。

**判决**陪审团进入评议室进行商议。成员们必须在不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有时商议时间过长且过于详尽，必须为陪审员供应食物与住宿，直到达成判决为止。判决代表的是陪审员针对证据进行详细讨论与分析之后所获得的一致看法。有时即使陪审团认真商议，却无法达成判决。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法官可能宣布判决无效。这表示可能必须进行新的审判。

陪审团达成判决后，在引领下回到公开法庭，向法官提交判决。双方当事人获告判决结果。接下来通常会要求陪审团明确表态 — 法官会询问个别陪审员是否同意判决。

**审后声请**达成判决后，不满的一方当事人可以采取各种策略。尽管已做出判决，输的一方仍可提出判决声请。如果法官认为有理性的人不会作出陪审团所达成的判决时，便会批准此种声请。

输的一方可能请求进行新的审判。这种请求通常以判决违反证据优势为基础。如果法官认为证据根本无法支持陪审团所达成的判决，就会批准这项声请。批准进行新审判的原因很多，包括：超额的赔偿金、极为不当的赔偿金、发现新证据，以及提出证据时发生错误等。

在某些情况下，输的一方会向法官提出救济声请。如果法官在审判中发现文书错误、新证据，或断定判决结果是由于诈欺行为而起，就可能批准这项声请。

**审判与执行**若裁决对被告有利则审判结束,但对原告有利的裁决则需要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诉讼过程。民事案件没有刑罚,但会判处救济或赔偿金。这项决定就称为判决。

如果被告被处以赔偿金却不自动支付规定的金额,原告可要求法院书记发布执行判决之命令。执行判决之命令会发给警长,要求警长扣押被告的财产并将之拍卖以执行判决。另一项替代方案是下令置留权(**lien**),也就是扣留可能用于支付判决之财产的合法权利。

**上诉**如果一方当事人认为审判中出现法律错误,如果法官拒绝于判决后进行新审判之声请,那么不满的一方可以向较高审级的法院上诉。最常见的上诉因素或许是法官可能认可了应被排除之证据、拒绝承认已提出之证据,或未给予陪审团适当的指示。

律师藉由反对审判时可能的错误,为上诉打下基础。此项反对会成为审判纪录的一部分,而后有可能得到上诉法院的检阅。上诉法院的决定可能是要求下级法院执行先前的裁决或举行新的审判。

## 第七章 联邦法官



里根总统于 1981 年任命珊卓·欧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右)为大法官,打破了最高法院的性别藩篱。首席大法官华伦·伯格(Warren Burger)(左)宣誓她就任,她的丈夫约翰·欧康纳(John O'Connor)站在中间。

Connor)(中)手持两本家用圣经。 (AP/WWP)



约翰逊总统(右)于 1967 年任命首位非裔美国人索古德·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两名美国地方法官在纽约州主持一场归化典礼。 (© Syracuse Newspapers/The Image Works)



小布什总统向获得他提名为联邦法官的人道贺。 (AP/WWP)



纽约南区的美国地区法院资深法官康斯坦丝·莫特利(Constance Baker Motley)(右)在一场小组讨论中发言。(AP/WWP)

**联邦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法官与大法官。** 什么样的特质使这些人不同于其它公民？担任法官需要什么——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格？法官是怎么选出来的，参与甄选过程的人又是谁？法官如何学习成为法官？如何训练法官，何时撤去他们的职务？

### 联邦法官的背景特征

美国人相信，一个从最卑微环境出身的人(例如亚伯拉罕·林肯)有一天可能成为美国总统或至少美国法官。如同大部分的迷思，这个观点有其真实性。原则上，几乎任何人都能成为优秀的公职人员，也有少数出身贫困的人爬上了权力顶端，成了著名的例子。不过，最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的联邦法官，如同其它公职人员和大企业首脑一样，都来自于美国的中产与中上阶级。

### 地方法官

过去 210 年来，联邦地方法官的所有背景资料从未被汇整过，但有大量关于近几十年来任职者的已知资料。



在坐上联邦法官席之前，大部份的法官都曾担任州或地方层级的法官，第二大类是曾受雇于政治或政府领域，或在中型至大型法律事务所服务。在小型法律事务所工作或担任法律教授者占最少数。

从法官的教育背景看得出一些精英本质的端倪。他们全是大学毕业生；约有半数是从昂贵的长春藤联盟或私立大学取得大学与法律学位。法官作为一个群体和一般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具有强烈的「职业遗传」倾向——也就是说，法官往往来自于有担任司法与公共事务传统的家庭。

虽然美国女性人数占了 **51%**，一直以来法官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直到卡特总统任内(**1977-81**)才出现 **2%**以下的女性地方法官。即使刻意努力改变这个现象，在卡特总统所任命的地方法官中，女性也只占 **14.4%**。少数民族在法官席上向来都低于适当比例，就绝对数字而言如此，与总人口数的比例上也如此。直到现在，也只有卡特总统曾任命相当数目的非北欧裔英语系白人担任联邦法官——超过 **21%**。柯林顿任内(**1993-2001**)发生了剧烈改变。在他任内的前六年，他所任命的司法人员当中有 **49%**皆为女性或少数民族。

约有十分之九的地方法官与任命他们的总统属于同一政党，历史上约有 **60%**的地方法官有明显的党派色彩。

典型的法官在 **49** 岁时获得任命。不同的总统执政期间，法官年龄差异并不大，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 上诉法院法官

上诉法官比初审法院法官更可能具有先前的司法经验，而且他们也很可能，如果不是更可能的话，曾经就读于私立与长春藤联盟学校。

以政党关系而言，初审与上诉法院的法官任命并无差异。然而，上诉法官比其初审法院同僚更有党派色彩的倾向。

柯林顿政府让法官席更精确反映性别与种族人口结构的企图，在上诉法官层级是很明显的。在柯林顿任命的法官有三分之一是女性，而柯林顿任命至上诉法院的法官中的非裔美国人、操西班牙语的拉丁裔人，以及亚洲人都比其它任何总统所任命的还要多。

小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落实了种族与性别多样性的承诺。例如在他指委派至地方法院的人员当中，有三分之一皆为「非传统」— 即女性与少数民族。

### 最高法院大法官

自 **1789** 年以来，共有 **106** 名男性与两名女性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虽然可能有一成的大法官出身低微，但大多数大法官都来自于活跃于政治的家庭，而且大约三分之一与法官有关，并与有服务于司法界之传统的家庭关系密切。

直到 **1960** 年代，高等法院全为白人男性，但是在 **1967** 年，约翰逊总统任命索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为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非裔美国成员。**1991** 年马歇尔退休后，老布什总统(**George H.W. Bush**)以另一名非裔美国人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取而代之。性别藩篱在 **1981** 年打破。当时，里根总统任命珊卓·欧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进入最高法院任职。**13** 年后，另一名女性法官鲁思·金斯柏(**Ruth Bader Ginsburg**)也加入她的行列。

说到大法官的非政治性职业，**108** 位法官全都受过法律训练，并曾于生涯中当过律师。虽然半数以上在奉派至最高法院前都曾担任过法官，但只有 **22%** 在就任前原本就担任州或联邦的司法职务。大法官们和下级联邦司法体系的同僚一样，在政治上活跃的可能性比一般美国人更高，并且几乎全都与任命他们的总统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

### 联邦法官的资格

联邦法官的职务虽无正式规定，却有定义明确的非正式规定。

## 正式资格

宪法或成文法未就任职于最高法院或下级联邦法院的资格做任何规定。宪法仅规定「美国之司法权，必须授予一最高法院」和任何国会设置之下级联邦法院(第 3 条第 1 项)，还有总统「得经参议院之建议与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第 2 条第 2 项)。国会同样的甄选程序应用于上诉与初审法院。不须通过考试、没有最低年龄规定、法官不需为本国出生之公民或法定居民，甚至也不要求法官要有法律学位。

## 非正式规定

至少有四项重要但非正式的因素决定谁能坐上联邦法官席：专业能力、政治资格、自我推荐，以及运气因素。

**专业能力:**美国司法职务候选人虽不一定非律师不可，但是任命有杰出专业表现之律师已成惯例。政治常规虽允许总统以法官席上的座位奖励老盟友，不过传统上仍期待想成为法官的人在专业能力上有一定声誉，特别是层级越高，从初审法院到上诉法院再到最高法院，对法官职务的期待也越高。

**政治资格:**司法职位的大部分被提名人都有一些政治活动纪录，原因有二。第一，在某种程度上，法官职位仍被视为政治庇护系统的一部份；曾服务于党的人比没有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联邦职位作为奖赏。第二，想成为法官的人往往有必要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否则候选人根本无法吸引总统、参议员，或送交候选人名单之地方党政领袖的注意。

**自我甄选:**虽有许多人认为公开宣布成为联邦法官之意图的做法有失庄重且缺乏司法特质，但部分志在法官职务者精心安排了考虑周到的宣传活动来代表自己，或至少传话让人知道自己有意愿担任司法职务。几乎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在寻求职务方面很主动，但是根据可靠传言，律师们通常会设法让自己的名字在有职务空缺时出现。

**运气因素:**几乎所有司法职位的委派都存在相当成份的偶然。在对的时间成为对的党的一员或在对的时点受到权力掮客的注目等因素与能否成为法官的关联，和一个人的专业背景的影响一样大。

### 联邦遴选过程和参与者

遴选所有联邦法官的司法架构都一样，不过参与者的角色视美国的司法层级而有不同。所有的被提名人都是由总统在与白宫幕僚、司法部长、部份参议员，以及其它政治操盘手慎重商议后提出的。隶属于司法部门的联邦调查局(FBI)会进行例行的安全检查。提名名单公布后，认为被提名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各利益团体可能会进行游说，支持或反对某个候选人，候选人的资格也将交由美国律师协会进行评估。候选人的名单将送至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由委员会针对被提名人的职位合适性进行调查。如果委员会投票赞成，则名单将送至参议院，并以多数票决方式批准或否决。

### 总统

严格按照法律说来，总统提名所有的司法候选人，但从历史上来看，总统对最高法院人选任命的参与多于对下级法院人选任命的参与，主要有两项原因。

第一，最高法院的人选任命在总统 — 和整体大众 — 看来要比下级法院的职位空缺更重要也更具政治意义。总统常利用任命高等法院大法官人选的少数机会发表政治宣言并为其主政方向定调。例如，在美国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全国压力时期(period of national stress)，民主党罗斯福总统升任共和党的哈伦·斯通(Harlan Fiske Stone)为首席大法官，以示国家团结。1969年，尼克松总统任命保守派人士华伦·伯格(Warren Burger)以落实现其恢复「法律与秩序」的竞选承诺。1981年，里根总统为了摆脱对妇女运动冷漠以待的名声，成为首位任命女性担任高等法院大法官的总统。

总统对最高法院人选任命的关心很可能多于下级法院人选任命的第二项原因是，个别参议员和地方政党领袖传统上通常主导了下级法院人选的任

命。这项人称「参议员礼遇」的作法是地方法官任命过程的一部分。根据参议员礼遇惯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询问与总统同政党且与被提名人来自同一州的参议员对候选人的看法。参议员发表对某候选人的看法，就等于有权否决提名。参议员礼遇并不适用于上诉法院的任命，即使总统通常必须听从来自一上诉巡回法院巡回区之各州的同党参议员的意见。

## **司法部**

协助总统与白宫幕僚进行司法人员遴选过程的，是司法部两名关键的被总统任命者——司法部长和副司法部长——其主要任务是找出符合总统制订之标准的联邦司法职务候选人。一旦有了人选，司法部人员便对候选人展开进一步审查。他们可能会命令联邦调查局调查候选人的性格与背景；他们通常也会研究候选人撰写的文章或演讲内容，或咨询一位现任法官的书面意见；他们可能会向地方政党领袖确认候选人是否为忠诚党员，以及是否和总统的主要公共政策立场同调。

在任命地方法官过程中，名单通常由与被提名人同州籍的参议员提交，司法部的功能与其说是提名不如说是筛选。不管提交之名单上有谁的名字，司法部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候选人的个人、专业，以及政治资格。执行这项工作时，司法部可能会与白宫幕僚、参与提名的参议员，以及希望参与甄选过程之政党领袖密切合作。

## **州与地方政党领袖**

地区政党领袖对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不能什么发表意见，因为总统的特权优于一切。这些领袖们在上诉法院法官遴选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无足轻重，但他们能左右美国初审法官的遴选，特别是当任命发生在其两名参议员皆不与总统同政党的州时，地区政党领袖们的影响力尤大。这种情形下，总统较有可能与同党的州领袖而非州议员商议人选。

## **利益团体**

代表整个从左至右的政治光谱的部分美国压力团体通常会进行游说，以表达他们对司法被提名人的赞成或抵制。这些团体 — 公民自由、商业、劳工组织、民权 — 的领导人积极敦促总统取消政治与社会理念与他们不同的被提名人，或游说参院支持他们赞同的被提名人。利益团体赞成或抵制的被提名人遍布各联邦司法层级。

## 美国律师协会

五十多年来，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的联邦司法委员会在评估联邦法官职位可能被提名人的专业资格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代表美国所有巡回区的 **15** 名委员会成员根据三项评判表准给予候选人评价：司法品格、专业能力，以及正直。委员会将候选人评为「合乎资格」或「非常合乎资格」，令人无法接受的则被归类为「不合乎资格」。

##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参议院的规则规定其司法委员会必须详加考虑所有联邦法官被提名人并向整个参议院提出建议。因此，它扮演着审查被提名人而非推荐可能人选的角色。委员会主持所有的提名听证会，并于期间听取证人证词并进行秘密商议。地方法院人选任命的听证会多半只是敷衍为之，因为「参议员礼遇」原则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候选人是否为参议院所接受。然而，对上诉法院被提名人 — 当然还有最高法院被任命人 — 而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是个严肃的程序。

## 参议院

任命联邦法官过程中最后的一个步骤是由参议院进行多数票决。从历史上来看，参议院被规定的角色已经被两个普遍的观点所凌驾。自华盛顿以来的历任总统和少数学者采取的立场是，除非有强烈的反对理由存在，否则参议院应该默默听从总统的选择。其它学者与大部分参议员抱持的看法，则是参议院有权利和义务针对被提名人做出决定。实际上，参议院在司法核准过程中的角色依联邦法官人选的层级而不同。

就地方法官而言，参议员礼遇原则凌驾一切。也就是说，如果被总统提名人获得总统同党之该州参议员所接受，那么参议院通常乐于核准这项任命。参议员礼遇不适用于上诉法院的法官任命，因为职位空缺所涵盖的范围超过了一位或两位参议员所在的各州。但出现职位空缺之巡回区内的各州参议员，通常会向总统提交可能的候选人名单。一项不成文规定是，巡回区各州至少应有一名该州的法官坐上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席。只要遵守上述原则，再加上被总统提名人有相当良好的资格，参议院通常都会听从总统的建议。

如果对高等法院被提名人的合适性有争议，参议院倾向对总统提出质疑。自 1789 年以来，历任总统曾送交 144 个最高法院被提名人选给参议院，征求其意见与同意。在这些人选当中，有 33 人不是遭到参议院拒绝或「无限期延迟」，就是被总统取消。总统约有 79% 的成功率，而且这个机率似乎正在提高当中，特别是和 19 世纪多达三分之一的被提名人遭到参议院拒绝的情况相比。纪录显示，当被提名人的背景无争议并采取向中间靠拢的政治路线，而参议院也在总统所属政党的控制之下，或大多数参议员与总统有相同的基本立场与价值观时，总统任命高等法院法官的成功率最高。

## 司法社会化过程

在大学与法学院中，未来的法官们除了学习基本法律知识之外，还必须习得重要的分析和沟通技巧。累积了一、二十年的法律实务经验之后，未来的法官们对法庭和法律的运作已经了如指掌，也专精了几个法律领域。尽管他们作了种种的准备——有时称为「预期社会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在美国，大部分的新法官在如何当一名法官的路上，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学。

美国不只缺乏司法专业的正式化训练程序，甚至还有一种假设是，只要具有大约十年的律师经验就足以担任法官。情况正好相反，在美国，成为一

名法官需要很多的新鲜人社会化(短期学习与新角色的适应)和职业社会化(为期多年的在职训练)。

典型的初审法院新被任命人可能是一流的律师和专精于几个法律领域的专家。但是，众人期待身为法官的他们专精于所有法律主题。他们必须参与通常和他们担任律师时无关的司法职责(例如，判刑)，而交付给他们的许多行政事务都是他们以前没有经验过的(例如，学习如何有效记录数百宗案件)。

在上诉法院层级也一样有一段新人社会化的时期——虽然巡回法官先前可能已有司法经验——而曾任初审法官的人似乎比较容易度过这段过渡期。在过渡期间，法庭上的巡回法官在经验更丰富的同僚面前较少发言。他们通常会花更多时间撰写意见书、较顺从资深同僚的意见，或经历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最高法院新任大法官的学习过程难度就更高了。和上诉法院法官一样，最高法院的新手大法官通常会听从资深同僚的意见。他们较少撰写多数与异议意见书，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感。高等法院的新被任命人可能比下级法院同僚拥有更多司法经验，但是最高法院广泛参与司法决策的事实——相对于上诉法院的错误修正和初审法院的规范执行——也许解释了他们起初的踌躇不决。

所有的新联邦法官都需要新鲜人社会化和职业社会化，但他们从何处获得指导？上诉法院法官与初审法院法官大部分的训练来自于他们资深且有经验的法官同僚——特别是巡回或地方法院的首席法官。最高法院的情况也一样，主要由资深同僚(通常是首席大法官)负责将法院的必要规定与法庭价值基准传承给新手法官。

联邦司法中心为新任法官提供的训练研讨会也在新法官的训练与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有些研讨会由外界专家所指导——法学院的主题事务专家——核心指导者往往是经验老到的法官，他们的实际法庭经验赢得了联邦司法体系中新成员的敬重。



这些社会化过程对于美国司法法律系统的运作有何重要性？第一，新手法官垂手可得的社会化媒介让系统运作更为顺利，并将停工期减到最短。假如新法官被孤立有经验较老到的同僚之外，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学习这一行的细微要点，在诉讼中的犯错次数想必也更多。

第二，司法制度本身能够提供社会化的这个事实 — 由较年长、有经验的法官训练新手 — 扮演着粘合整个制度中的角色，让一个世代的法官的司法价值、作法，以及定向能够传承下去，也让司法制度在这个充满混乱与随机行为的世界中得以保有连贯性与恒久性。

## 法官的退休与免职

法官停止履行司法职务的原因有选择性退休、健康不佳或死亡，或遭到其它法官的惩处。

## 对于联邦法官的惩处办法

根据宪法第 3 条规定，所有被任命的联邦法官「行为良好者」可保有职务，实际上也就等于终生任职或直到自愿离职为止。将法官免职的唯一方式是弹劾(由众议院起诉)和参议院定罪。为合乎宪法规定(就最高法院大法官而言)和立法标准(就上诉与初审法院法官而言)，只有在发生「叛国罪、行贿，或其它重罪或轻罪」时，才能进行弹劾。遭到弹劾的法官会面临在参议院举行的审判，经出席议员三分之二通过方可定罪。

自 1789 年至今，众议院只对 13 位法官提出过弹劾 — 虽然约有相同数目的法官在遭受正式起诉前已自行辞职。这 13 名法官中只有七人被定罪并因此遭到免职。

虽然法官的公然犯罪行为极为少见，但是行为不端的灰色地带可能会使这么做的法官游走于可被接受与可弹劾的行为之间。遇到以下这种联邦法

官，该怎么办？尽管有明显利益冲突却仍审理案件的法官；在法庭上持续表露偏颇行为的法官；个人习惯对其法庭表现有负面影响的法官。回顾历史，除了同事的轻微训斥外，这样的案例少有惩处，不过近数十年已经出现针对法官的惩处办法了。

在 1980 年 10 月 1 日这一天，国会的一项新成文法生效了。名为司法理事会改革暨司法行为与无能力法(**Judicial Councils Reform and Judicial Conduct and Disability Act**)的成文法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授权给各巡回区的司法理事会(由上诉与初审法院法官组成、该巡回区首席大法官主持)，让理事会「制订所有必要且适当的命令，以提升巡回区内司法行政的效果与速度。」法令的第二部分建立了对法官的法律申诉程序。简言之，就是允许权利受到非法侵害的当事人向上诉法院书记提出书面告诉。接着首席法官会审查告诉，如果上诉看起来无关紧要或出于其它原因，首席法官可能不予审理。如果告诉看似有效，则首席法官必须指派一个由法官自己或人数相等的初审与巡回法院法官所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过后，委员会向理事会报告，理事会有下列几种选择：法官无罪；如果违法者是破产法官或治安法官，可能会遭到免职；宪法第 3 条的法官可能会受到以下的惩罚：私下或公开的训斥或责备、无资格的证明、自动辞职的要求，或禁止进一步的案件指派。然而，宪法第 3 条的法官是不能被免职的，弹劾仍是唯一的办法。如果理事会判定法官行为构成弹劾的理由，就会通知司法会议。司法会议可能会将案件转给美国众议院交付讨论。

## 联邦法官的无能力

也许比将行为不端法官免职更为麻烦的是将因年迈体弱而无法有效履行司法职责的法官免职。国会藉由金钱优惠鼓励资深法官退休，并已获得一些成果。自 1984 年起，联邦法官退休时可领全薪并享受所谓的「80 的规定」下的好处；也就是当法官的年龄与担任法官的年资相加达到 80。国会也允许法官年老继续任职，不必完全退休。为了换取案件量减少，他们可以保有办公室与职员以及 — 同样重要的 — 身为一名积极法官的声望与自我敬重。

法官通常会在其所属党派赢得总统职位时挑选辞职时机，好让有类似政治与司法取向的法官取而代之。**1990**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特别从 **1954** 年起，「司法人员的退休/辞职率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考量的强烈影响并充满政党色彩」，并指出许多法官认为自己是人民、司法任命过程，以及法官与大法官之后续决定之间的政策连结的一部份。

## 州法官的资格与背景

大部分的州法与州宪法对于州法官职位资格未设严格条件。绝大多数的州都不要求治安法官或治安官拥有法律学位，但是初审与上诉法官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学位(无论就形式或实际而言)。

虽然女性在美国人口中略占多数，且近几十年来从事法律专业的女性有增加的趋势，然而女性担任法官的人数仍低于适当比例。曾任职州法官的人担任较低层级之州司法职务的可能性高于担任最高法院层级职务的可能性，不过各州情况有所不同。截至 **1990** 年代为止，只有约 **14%** 之法官为女性，**6%** 是非洲裔美国人、操西班牙语的拉丁裔人，或亚裔美国人。

如同联邦法官一样，州法官通常待在自己成长与受教育的地方。约有四分之三的州法官任职于自己出生的州，而离开家乡去外地攻读学士或法律学位的人不到全体的三分之一。这种强烈的地方色彩倾向也反映在州法官在法官席上的工作经验模式。例如，在州最高法院任职的法官中，只有 **13%** 有过联邦司法经验，有过若干类型的州司法经验的比例则高达 **93%**。

法官任职时通常已届中年。州初审法官任职时约为 **46** 岁，和联邦法官的 **49** 岁不相上下。州上诉法院法官上任时的岁数通常比初审法院的法官更大一些，约为 **53** 岁 — 和联邦上诉法官差不多。

以所属政党而言，无论是遴选或任命而来的州法官，通常都代表掌管法官所在的州的政党。而且，无论是经由遴选或获得州长任命的州法官，绝大多数在坐上法官席之前都曾活跃于政治活动。

超过半数的州地方法官都出身于私人法律机构，另外约有四分之一是从下级法院的法官职务(例如，治安官)被拔擢上来的。曾经执业的法官中，大部分都从事一般法律事务而无专门领域。约五分之一的州法官是从地区律师招募而来的，只有 **3%**曾从事私人执业的刑事实务。任职于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当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来自于中级上诉法院或州初审法院。

### 州法官的遴选过程

州层级用于遴选法官的方式很多，而且每一种都有许多变化。基本上，在 **50** 州中的任何一州都有五种取得法官职务的途径：政党性选举、非政党性选举、择优遴选、州长任命，以及州议会任命。

### 法官甄选

法官选举 — 无论是政党性或非政党性投票 — 一是各州的标准方法。此法盛行于杰克森总统时代(**1829-37**)，一个美国人民寻求政治程序民主化的时期。然而实际上，政党领袖通常将司法选举当作奖赏忠贞党员的间接恩惠。而且，必须出马竞选的法官还经常被迫向将来会出现在法庭上的律师与法律事务所募集竞选捐款——一个潜在的利益冲突来源。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法官选举的投票率极低。选民可能认识他们属意的总统、国会成员，或州参议员人选，但却不熟悉那些出马角逐州法官职位的候选人。

在 **19** 与 **20** 世纪之交的进步运动中，改革者希望抹去司法选举中的部分政党色彩，让法官以非政党性方式竞选。原则上他们以理念与资格，而非凭着所属政党，参选。但即使是在所谓无党派的各州，政党仍会替个别司法候选人背书并捐献竞选经费，让候选人对某一政党有所认同。

### 择优遴选(Merit Selection)

择优遴选自 1900 年代初期便已实行，并被视为遴选法官较理想的办法。第一个全面采行此法的州是 1940 年的密苏里州。自彼时起，这个方案就名为「密苏里计划」或这之类的名称。

使用密苏里形式计划的各州综合使用选举和任命的方式。州长从一个五人(或以上)提名小组的推荐名单中任命一候选人为法官。提名小组的成员通常为律师(通常由地方律师协会选出)和州长指定的非律师人士，有时还包括一名资深地方法官。州长依据法律或经由默然同意(implicit agreement)从推荐名单中任命一人为法官。新任法官在担任职务一小段时间后(通常为一年)必须参加一项特殊竞选，凭着自己的纪录参选。(选民被这么问：某法官应该留任吗？)如果选民支持法官继续保有职位(几乎总是如此)，则该名法官的任期将固定下来并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 **州长任命(Gubernatorial Appointment)与州议会任命(Legislative Appointment)**

如今，只有少数州的法官是由州长与州议会任命的。若法官由州长任命，一定免不了政治力的介入。州长倾向任命曾参与州政治活动，且其活动对州长本人或州长所属之政党或盟友有利的法官。而且，在司法任命的过程中，州长通常会与地方政党领袖或州议员谈判，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州长也可能会以法官职务酬谢曾给予忠诚政治支持的议员或地方政坛人士。

只有少数几州还允许议员任命州法官。虽然州最高法院成员的遴选设有各种判断准则，当出现州审判法官职位空缺时，州议员往往还是会求助于已卸任的议会前辈。

### **法官的退休与免职**

在州层级，法官太老或不适任的问题似乎比联邦层级少。不少州都设有强制退休计划。退休的最低年龄为 65 至 70 岁，以 70 岁最普遍。有些州已降低任职超过理想任期之法官的退休优惠；也就是，在法官席上坐得愈久，退休优惠就愈少。

退休计划，无论在让年老法官辞职方面效果有多好，对于不适任、腐败，或不道德的年轻法官根本毫无用处。综观美国历史，各州用来将这类法官免职的程序包括了弹劾、罢免选举，以及州议会共同决议。然而，这些方式只能达到最低限度的效用，因为这些办法不是在政治上难以实施，就是既费时又麻烦。

近来，各州已开始设置由法官自行组成以监督其成员的特别委员会。不过这种委员会并不总是有效，因为法官通常不愿让同僚接受公开批评与惩戒。

## 第八章 司法政策的实施与影响



一名检察官在华盛顿州最高法院进行辩论。该法院是下级法院之一，常被视为是上诉法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所制订之政策的执行者。

(AP/WW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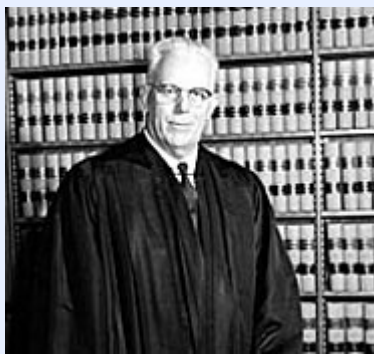


约翰逊总统签署 1964 年民权法案后伸出手与金恩博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握手。国会在施行最高法院判决方面往往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旨在废

除学校种族隔离政策的这项法案即为一例。 (AP/WWP)



2001 年 4 月 2 日，就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提出诉讼强迫学校取消祷词后不久，维吉尼亚军校学生进行晚餐前的祷告。过去 40 年来，宗教在公立学校中的角色一直是美国法院体制中饱受争议的问题 (AP/WWP)



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华伦(Earl Warren)1961 年的照片。在他任内(1953-69 年)最高法院透过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包括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和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案，启动了刑事程序的重大改革。 (AP/WWP)



自从最高法院的罗诉韦德(Roe v. Wade)案判决以来，国会、司法体系各层级，以及政界都看得到堕胎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间的战争。 (AP/WWP)

法院做出判决之后，各方人士 — 其它法官、公务人员，甚至个别公民 — 都可能被要求执行裁决。本章探讨执行过程的各方参与者、他们对司法政策的反应，以及他们响应法院判决的方式。

视法院判决的本质而定，司法政策可能会造成非常有限或非常广泛的影响。车祸赔偿金之诉讼只会对涉案人及其家人产生直接影响。但著名的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1963 年)的判决已对数百万人产生了或多或少的直接影响。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各州必须为重罪审判中的贫穷被告提供律师。非常多人 — 被告、法官、律师、纳税人 — 都感受到了这项司法政策的影响。

### 上级法院判决对下级法院的影响

上诉法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通常被视为最有可能参与决策的法院，而初审法院一般则被视为规范的执行者。然而，下级法院有许多脱离上诉法院的独立性，而且根据一项研究，下级法院可能被视为「不遵循上级法院领导的独立角色...除非情况有利于他们这么做」。

### 下级法院的裁量权

为什么下级法院在落实上级法院政策时有这么大的裁量权？部分是因为美国司法制度的结构。美国的司法制度向来都有独立、地方分权，以及个人主义等特色。以联邦法官为例，他们受到终生任期的保障，传统上有权以自认合适的方法管理法庭。惩戒措施很少，从历史上来看，联邦法官对于弹劾通常也无所惧。想保住职位的话，州法院法官一般只需让选民满意即可。

下级法院法官行使的裁量权可能也是上级法院判决的结果。例如，继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案(1954 年)后，最高法院告诉执行判决的联邦地方法官说，公立学校必须立即以



合理的方式开始，并以极为谨慎的速度废除种族隔离。何谓立即以合理的方式开始？学区必须以何种速度进行才符合所谓之极为谨慎的速度？最高法院并没有替这些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

虽然并非所有的高等法院裁决都留下这么大的解释空间，但其中有许多确实如此。法院判决可能因为数个原因而不明确。有时，议题或主题事务太过复杂，以致于难以制定明确决策。以猥亵案件为例，最高法院不难判决色情用品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之言论自由的保障。然而，要如何定义猥亵则是另外一回事。例如「病态色欲」(prurient interest)、「明显恶劣」(patently offensive)、「现今社会标准」(contemporary community standards)，以及「无济于社会价值」(without redeeming social value)等，在猥亵的意见书上已是司空见惯的惯用语，但是这些词语留给人很大的主观解释空间。

合议庭所订定的政策通常都模棱两可，因为大多数的意见书都是为了涵纳数字法官的看法而写的。多数意见可能还附有一些协同意见。发生这种情形时，下级法院的法官没有清楚的判例可循。以富曼诉乔治亚州(Furman v. Georgia)案(1972 年)为例，最高法院废除了多个州的死刑，但理由却各异。有些法官反对死刑本身，认为死刑是残酷且异常之刑罚，违反了宪法第八修正案。其它法官投票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死刑被以歧视的方式执行。1972 年的这项判决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不只影响下级法院的法官，也影响了各州议会。许多州一下子就通过一连串差异颇大的死刑成文法，并引发大量的新诉讼案。

下级法院法官在实施过程中的裁量权也受到上级法院传达政策之方式所的影响。当然案件被上诉的初审法院会得知上诉法院的判决，但上诉法院不会以有系统且正式的方式将其判决告知其它法院，或确保下级法院法官有取得意见书副本的途径。含有新司法政策的判决会以印刷品形式或置于网络上让大众取得，如果法官有时间与意愿时，可自行阅读。

最高法院、下级联邦法院，以及州上诉法院的意见书可于各法院、法学院，以及大学图书馆取得，放上网络的意见书也越来越多。然而，如此广泛的可得性却不保证每份意见书都会被阅读和清楚理解。许多下级州法官，例如治安法官与少年法院法官，都是对于阅读复杂的司法判决不感兴趣也缺乏技巧的非律师人士。最后一点是，即使是对高等法院判决感兴趣也有能力理解的法官们也没有足够时间读完所有的新意见书。

面对上述问题的法官要如何知悉上级法院的判决？方法之一是透过在下级法院代表出庭的律师得知。一般假设立场对立的双方律师会于法官面前辩论时提出相关判例，而雇有助理的法官也可以请助理搜寻上级法院最近的判决。

因此，上级法院的部份判决之所以得不到迅速且严格执行，纯粹只是因为下级法院的法官不知情。而即使是下级法院法官知悉的判决，可能也未必都能清楚了解。这两者中的任一因素促成了下级法院实施司法政策时的裁量权运用。

### **下级法院的解释**

一项研究提到「重大政策的宣布几乎总是需要决策者以外的某人加以解释」。就上诉法院所做的司法决策而言，这句话显然是很中肯的。下级法院法官行使的第一项裁量权，可能就是解释上级法院判决的意义。

下级法院法官解释上级法院制订之政策的方式取决于多个因素。许多政策的陈述都不清楚，因此讲理的人可能会因为如何解释才适当而发生争论。即使是其公告并无模棱两可情况的政策，有时也会因法官的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解释。

法官的个人政策偏好也会影响他们对上级法院政策的解释。法官们带着各自独特的背景特色来到法院。有些是共和党员，有些是民主党员；有些人较宽厚，有些人较严格。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些曾任检察官；有些人则以辩护律师或企业律师为其主要经历。简言之，个人背景可能会影响法官

的政策偏好。因此，法官可能将自己的想法加入对上级法院政策的解释之中。结果是，一项政策可能为某些法官热烈欢迎，而为某些法官全然拒绝。

### 下级法院采取的策略

偏好并接受某项上级法院裁决的法官自然会加以执行甚或扩大解释。有些法官还得冒着社会排斥与各种骚扰的风险来执行他们所认同却不受所在社群欢迎的政策。

不喜欢上级法院某项政策决定的法官在实施时可能会很保守或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施行。基本上不同意上级法院某项政策决定的法官可以采取一些策略。其中一项甚少使用的策略是藐视，意即法官在下级法院案件中完全不采行上级法院的该项政策。

这种公然藐视极为少见。其它的策略就没有这么极端。其中一项策略是避免必须实施该政策的情况。案件可以照技术或程序理由处理，这么一来法官就不需裁决案件的实际是非曲直。例如，案件可能裁定为原告没有立场提告，或案件因议题在审判开始前已经得到解决而过时。下级法院法官有时会以宣布部分上级法院之判决为「附带意见」(**dicta**，拉丁文，意思是「权威的宣言」)，避免接受政策。附带意见是指意见书中和裁决之中心逻辑没有重要关联的部分，可作为指引但不具约束力。至于附带意见的组成内容包括哪些，则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基本上不同意某项司法政策的法官所使用的另一个策略，是尽可能狭义应用该政策。下级法院法官可以采取的一个方法是，以上级法院的案件与下级法院的案件之间存有事实差异为由裁定该判例不具控制力。也就是，因为两宗案件可能有所差别，所以不需遵守判例。

### 下级法院法官所受的影响

有时下级法院法官必须针对上级法院未提供精确标准的案件作出裁定。这种情形发生时，下级法院法官必须从他处找到指引以裁决他们面前的案

件。一项研究指出，处于这种状况下的法官「会从各种广泛的因素中，包括个人的政党关联、意识形态，或该地区的规范等，寻找裁决该案的线索。」

## 国会对实施过程的影响

国会对联邦司法判决的反应可能有很多种：国会可能支持或阻碍判决的实施；此外，国会还可以修改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最后，国会还可以对个别法官发动攻击。

在裁定案件的过程中，法院常被要求解释联邦成文法。有时，司法解释可能会不同于国会中的多数意见。发生这种情形时，国会可以改变在新法规中的成文法，使之有效否决法院的最初解释。然而，绝大多数的联邦司法制度的法律判决不会被国会改变。

联邦法院除了裁定成文法之外，也解释宪法。对于不喜欢的宪法解释，国会有两种推翻或改变的方式。第一，国会可以另一项目的在于避免宪法问题的成文法作为响应。第二，宪法判决可直接由宪法修正案推翻。虽然多年来被提出的这类修正案很多，达到必要之国会各院三分之二的提案票数和各州四分之三的批准票数却非易事。自最高法院设立至今，该院只有四项判决曾遭宪法修正案推翻。

对于联邦法院整体与特定法官的国会攻击是响应司法判决的另一个方法。这些攻击可能采取的形式包括：由国会成员发表言词抨击、威胁弹劾现任法官，或对潜在的联邦法官被提名人展开更彻底的司法理念调查。

然而，国会与联邦法院并非天生的死对头，对联邦司法的报复相当罕见，双方通常会携手朝向类似的政策目标努力。例如，在实施最高法院的消除学校种族隔离政策上，国会透过制订 1964 年民权法案的方式扮演了关键角色。该法案使司法部有权起诉未遵守布朗诉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判决的学区。民权法案第 6 条也为种族隔离的努力提供了一项有力手段，那就是威胁拒绝联邦对学校之资助者犯有种族隔离罪。

1965 年，为进一步强化对消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国会通过

了美国中小学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此法案扩大了联邦政府在公立教育资金筹措上所扮演的角色,从而使得联邦资金中断的威胁成为许多实行种族隔离学区的严重问题。这样的国会支持很重要,因为当法官与政府团结一致时,遵循政策的可能性便会提高。

### 行政部门在实施过程中的影响

有时可能会直接要求总统落实司法判决。以美国诉尼克松案(**United States v. Nixon**)案(1974 年)为例,参议院委员会对一桩以非法入侵设于华盛顿特区水门饭店之民主党总部为掩护的事件所进行的调查,直接导致政府高层官员和总统的密切合作。该调查也揭发了尼克松总统在调查期间于椭圆形办公室装置自动录音系统一事。奉命调查水门案的特别检察官里昂·贾瓦斯基(**Leon Jaworski**)认为部份录音带可能提供了起诉高阶官员所需之证据,并要求总统交出。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与机密谈话为由拒绝交出录音带。最高法院的判决命令总统将传唤之录音带交给处理高层政府官员审判的法官约翰·西瑞卡(**John J. Sirica**)。尼克松遵守了高等法院的指示,因此判决的施行使得尼克松快速下台。他在两周内辞去了总统职务,时值 1974 年 8 月。

总统即使不直接参与司法政策的执行,也可以左右司法政策的影响力。由于其职位的地位与能见度,总统只要透过言语或行动,就可以激起对一项新司法政策的支持或抵制。

总统可以提出直接影响法院的法令。例如,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即曾敦促国会扩大最高法院的规模,好让他能「塞入」支持其政府立法议程的大法官,但未能成功。

任命权也给了总统影响联邦司法政策的机会,因为所有的联邦法官都是总统依照参议院的建议并经该院同意而任命的。

司法部是行政部门的一部份。总统可以透过该部的之活动影响司法决策。司法部长与其职员部属可按照总统的整体政策目标强调特定议题。然而,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司法部可自行决定以不在法院积极推动的方式降低特定政策的重要性。

另一位可以影响司法决策的官员是检察总长(**solicitor general**)。从历史来看，这项职务被视为负有对司法与行政部门的双重责任。由于检察总长与最高法院关系密切，因此有时也被称为「第十位大法官」。检察总长通常被视为顾问，提供法院关于联邦成文法与宪法含义的见解。就涉案一方为联邦政府的案件而言，哪些案件将上诉至最高法院也由检察总长决定。此外，检察总长还可以提出法庭之友状敦促法院批准或拒绝另一位诉讼者的移审令申请，或支持或反对高等法院所推动的某项政策。

许多司法判决实际上是由各部门、政府机关，以及行政部门委员会实施的。例如，最高法院对弗朗蒂罗诉理查德森(**Frontiero v. Richardson**)案(1973年)的判决要求美国空军在实行上扮演主要角色。该案对提供福利给空军中的已婚男性但未提供类似福利给已婚女性的国会成文法提出质疑。空军中尉莎朗·弗朗蒂罗(**Sharron Frontiero**)以构成性别歧视为由质疑该政策。亚拉巴马州的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发布了支持空军政策的判决。弗朗蒂罗中尉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高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并要求空军实施新政策。

### 其它的政策执行者

司法政策通常由州与联邦官员执行。在最高法院的刑事正当程序判决当中，例如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和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案(1966)，有许多判决都是由州法院法官与其它州官员负责执行的。以规定刑事嫌犯必须被告知其权利的米兰达案判决为例，州与地方官员在执行方面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裁定必须以州之经费为重罪案的贫穷被告提供律师的吉迪恩案判决，则已由公开辩护人、地方律师协会，以及法院指派个别律师执行。

州议员与行政官员也经常参与执行过程。判决有人犯了不法行为的法官可能会从多个选项中选出相应的救济办法。较常见的选项包括程序救济、执

行标准，以及具体的救济行动。程序救济提供的办法包括咨询委员会、公民参与、教育方案、评估委员会、争议解决程序，以及请专家处理问题并找出解决之道。程序救济不具体指定行动形式，执行标准则需要特定的补救办法一例如，一定数量的房屋或学校，或监狱或心理健康机构中一定的职员人数等。达成这些目标的具体方法，则由诉讼中提及之官员决定。具体的救济行动的例子则有学校校车接送、调整就学学区，以及改变监狱牢房与医院病房的规模与条件。就具体救济办法或落实办法的手段而言，这类型的救济无法为被告提供任何弹性。

这些救济法令的实施至少有一部分会移交给州议会。规定监狱制度中要有一定数量的牢房或警卫的法令可能需要州方面支出费用，而这些费用必须由州议会去筹措。同样的，规定兴建更多现代的心理健康机构或提供更多现代设备的法令意味着州支出的增加。州长也会涉入这类补偿法令的实施，因为他们通常都密切参与州的预算编制程序，而且也可以签署或否决法律。

有时法官会指派一些人协助救济法令的实施。专家通常被赋予一些决策权。法院指派的监督者在部份情况下也派得上用场，但法官的决策责任并不因此而得到解除。情况恰好相反，监督者负责收集数据并就被告遵循救济法令之情况进行报告。当命令未获执行或有某种障碍阻挡了救济法令的进行，法官可能会指派某人前往接管，并授予此人漠视一般机构藩篱之权以完成任务。

深入参与司法政策实施的还有一群个人：组成全美各教育局的数千名男女。两大引人注目的政策领域让各教育局面临最高法院政策之任务执行时卷入高度争议。

第一，高等法院于 **1954** 年裁定种族隔离不得存在于公立学校时，首先必须实施此判决的是教育局、督学，以及联邦地方法官。他们在执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影响了全美数百万名学童、家长，以及纳税人的生活。

第二个涉及教育局的领域是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的宗教政策。在恩格尔诉维塔尔(**Engel v. Vitale**)案(1962 年)中,最高法院认为纽约州规定公立学校每日朗诵由该州撰写的祷词之行为违宪。对此判决,有些学校则改以圣经诗或主祷文代之,理由是既然圣经或主祷文并非由州所书写,他们就没有违反高院政策。一年后,最高法院禁止了这些新措施,指出其违宪之处在于为宗教活动背书,违宪与否并非取决于祷词是否由州所书写。

## 司法政策的影响

最高法院判决的根本重要性主要在于对全美社会的影响。几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策分别属于种族平等、刑事正当程序,以及堕胎等领域。

## 种族平等

许多人指出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的判决是驱动美国种族平等的动力。不过,国会与行政部门也参与确保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执行过程。无论如何,法院透过布朗案判决开启了对种族平等这项全国性政策的追求。

一开始,法院的判决往往不明确,给了人们推委新政策的借口。然而,最高法院大法官与许多下级联邦法官坚持不懈,持续在全国政治议程中推动种族平等政策。他们的坚持随着 1964 年民权法案的通过而得到回报,也就是布朗案判决的十年之后。这项法案获得肯尼迪总统(1961-63)与约翰逊总统(1963-69)的强力支持,而国会与总统也成为史上美国种族平等的支持者。

联邦司法体制在决策过程中还有另一层重要性,布朗案及其后的案件即阐明了这个面向。虽然法院在寻求种族平等过程中有很多年都在孤军作战,但其判决并未受到漠视。查尔斯·强森(**Charles A. Johnson**)与布莱利·加南(**Bradley C. Canon**)在《司法政策:执行与影响》(**Judicial**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中主张布朗案的判决「是能见度极高的高院判决,一次企图推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改革的司法努



力。当然，在其后几年，非裔美国人与其盟友对其他政府机构施加了庞大的压力以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确，这些压力很快就远远超过学校范围，变成要求美国生活所有层面的整合」。

## 刑事正当程序

刑事正当程序领域的司法决策与厄尔·华伦(Earl Warren)任职美国首席大法官期间(1953 至 1969 年)的关系最为密切。谈到这个时期，前检察总长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说过：「以前从没有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行得如此彻底的刑事程序改革。」华伦最高法院的判决以改变各州在处置刑事被告时所遵守之程序为主要目的。华伦离开最高法院时即已制定处理各类广泛活动的各项新政策；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马普诉俄亥俄州(Mapp v. Ohio)案(1961 年)、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以及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案。

马普案的判决将已适用于全国政府达数年之久的违法证据排除原则(exclusionary rule)的范围扩及各州。这项原则规定州法院必须在审判中排除由警察非法取得的证据。虽然有些警察局，特别是主要的都市地区，为了致力于遵守取得证据的规则而设立了具体的方针，然而这样的努力并不普遍。由于警察实务上的差异，再加上下级法院对于合法的证据搜索与取得之解释也不同，因此美国各地执行马普案判决的情形并不一致。

也许让马普案影响力不如预期更重要的因素，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对违法证据排除原则的支持不一致。打从一开始，这项判决就没得到全体一致的同意，而多年来都持续有部份大法官公开批评违法证据排除原则。再者，最高法院后来的判决放宽了合法搜索的范围，从而限制了该原则的适用性。

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的判决规定州法院必须在审判前为重罪案的贫穷被告指派一名律师。许多州早在最高法院做出这项判决前即已在这类审判中指派律师，其它各州则以不同的方式开始遵行。许多

地区建立了公设辩护人方案。在其它地区，当地的地方律师协会与法官合作，以实施符合最高法院新政策的方法。

吉迪恩案裁决的影响比马普案更为明确、一致。原因之一无疑是因为许多州早已执行因吉迪恩案而做出的政策。各州对该政策的接受程度显然高于马普案。吉迪恩案中所宣布的政策比马普案定义得更清楚。法院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被告必须拥有公设辩护人或由法院指派的律师，却明确规定贫穷的被告必须有律师的协助。而且，最高法院在下一任首席大法官华伦·伯格(WarrenBurger)在职期间(1969至1986年)并未对华伦最高法院替贫穷被告提供律师的政策有任何退缩，和在马普案中证据搜索与取得范围的情况不同。这些因素都使得吉迪恩案中所宣布的政策更具影响力。

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Arizona)一案，最高法院更进一步规定警察必须将宪法保障之权利告知被拘捕的嫌犯，其中一项权利便是侦讯时有律师在场。嫌犯也必须被告知有权保持沉默，且其任何陈述都可能用于法庭上；嫌犯若请不起律师，则以州的公费提供一名律师；他们也有权随时停止回答问话。这些规定陈述得非常清楚，因此警方实际上已将规定抄写在卡片上、放在衬衫的口袋里。如此，当嫌犯被拘捕时，警察只需拿出卡片宣读嫌犯权利即可。

就警方是否对逮捕的人宣读米兰达权利而言，最高法院的这项政策是推行得很彻底的。然而，部份研究已就嫌犯被宣读权利的方式对米兰达案的影响提出质疑。向某人宣读卡片上的内容是一回事；为之解释高等法院规定的意义并让嫌犯了解又是另外一回事。从这个角度来看，米兰达案中宣布的政策的影响力并不如所想的那么清楚。

伯格最高法院似乎并未强力支持华伦最高法院的米兰达政策。虽然米兰达案并未遭到否决，其影响力多少仍受到限制。以哈里斯诉纽约州(Harris v. NewYork)案(1971年)为例，伯格最高法院裁定，未被宣读米兰达警告的人之陈述仍可在审判时用来质疑其证词的可信度。接着，在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Rehnquist)领导之下的最高法院在戴维斯诉美国

(**Davis v. United States**)案(1994 年)中裁定，对于含糊请求要有律师在场的嫌犯，警方不需停止询问。

米兰达案裁决的两年后，国会制订一成文法响应该案裁决，该成文法基本上将嫌犯陈述的接受性转为仅仅依据他们出于自愿与否。此法令到 1999 年才获得注意，当时，在一桩抢劫银行嫌犯涉及的案件中，该嫌犯打算隐匿曾向联邦调查局所作的陈述，理由是他被询问前，未曾被告知「米兰达警告」，而第 4 巡回上诉法院认为该法令令人满意因为该嫌犯的陈述是出于自愿。上诉法院的裁决对于应遵守国会成文法或高级法院的米兰达裁决提出疑问。2000 年 6 月 26 日，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米兰达案是合乎宪法的法院裁决，并不能被国会法案有效推翻。换言之，于州或联邦法院被监禁询问时所作陈述之接受性仍旧取决于米兰达案的裁决。

简言之，各项最高法院刑事司法政策的影响力都不同，理由有好几个。在某些例子中，模棱两可是一个问题。在其它案件中，政策可能明显缺乏大法官的强力支持，或在最高法院换首席大法官之后，对政策的支持也逐渐减弱。这些变因都扩大了实施政策时的裁量权。

## 堕胎

在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案(1973 年)中，最高法院裁定女性在怀孕初期三个月有堕胎的绝对权利；各州可规定怀孕四至六个月时的堕胎程序以保护母亲健康；怀孕七至九个月时，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遭遇危险，各州可规定甚至禁止堕胎。

这项判决引发了立即且大多是负面的反应。有些人写信给法官、有些人公开演讲、有些人在国会提出解决方案并倡议「生命权」修正案。因为法院判决的争议性本质，医院并不由衷支持这项判决，也未曾改变其堕胎政策。

法院堕胎政策引发的反应不但持续不减，而且还转移到新领域。在近几次总统选举中都可以看到两大党将堕胎议题搬上讲台，而各候选人也在这个议题上采取对立的立场。民主党与该党被提名人通常都表示对罗诉韦德

(**Roe v. Wade**)案的支持,而共和党与其候选人则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表示反对。

国会向来是反对最高法院堕胎判决活动的温床。反堕胎 — 又名支持生命 (**pro-life**) — 势力无法让推翻罗诉韦德(**Roe v. Wade**)案的宪法修正案通过,但却成功游说议员支持拨款法案的修正案,不让联邦资金花费在自愿性堕胎上。**1980**年,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决结果确认了这类禁令的合宪性。

罗案判决后的大多数相关法案都属于州层级。一项研究指出,在判决后的两年内,有 **32** 州通过了 **62** 条堕胎相关法令,其中大部分皆旨在限制堕胎管道、规范堕胎程序,或禁止在某些情形下堕胎。

在罗案的判决之后,利益团体的活动大幅增加。反对这项判决的团体经常公开示威,后来还开始在诊所外站哨。支持罗诉韦德(**Roe v. Wade**)案判决的利益团体则较有可能将心力放在法院里。

堕胎论战出现在法院、政治活动,以及立法场域的同时,其它人则偏好更直接的方式,例如在堕胎中心抗议或封锁堕胎中心。然而,最高法院裁定可对这类抗议施加合理的时间、地点与方式限制。该立场于 **2000** 年 **6** 月 **28** 日被重申,当时最高法院赞成科罗拉多州的一项成文法,该法将未经他人同意而故意接触他人并分发传单、展示标语、或在医疗机构 **100** 英尺内以口头方式抗议的行为视为违法。

## 结论

部份司法政策对于社会的影响比其它司法政策的影响更大。司法制度在发展国家政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远高于制宪者当初的预期。然而,杰若德·罗森伯格(**Gerald N. Rosenberg**)在《空洞的期望: 法院能够带来社会变革吗?》(**Hollow Hope: Can Court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中写道:「美国法院并非万能的机构。他们是在严格限制下设计出来的,且被置于

一个分权的政治制度中。要求美国法院创造重大的社会变革，就等于忘记它们的历史和忽略它们所受到的拘束。」

法院的决策角色存在于由竞争政治和社会需求与期待所构成的复杂架构内。政府其它两个部门有时无法接受某些社会群体的要求，这些个人或团体的唯一替代方式就是转而向法院求助。例如，民权组织直到取得最高法院对其废除学校种族隔离之努力的支持才真正有所进展。

眼见部份民权团体在联邦法院取得成果，其它人也受到鼓舞，决定以诉讼作为策略。例如，妇权支持者就采取了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模式，将其不满带进法院。一开始对种族平等的狭隘追求后来扩大成为寻求社会上其它弱势团体的平等。

显然，法院能够发布吸引全国注意、也许还突显出其它决策者未能采取行动之事实的决策。透过这个方式，司法部门可能也邀请了其它部门行使其决策权。后续的判决代表了司法部门推动特定政策和继续邀请其它决策者一起努力的决心。

总的来看，美国法院似乎最擅长发展与执行本质上较不具争议性的小范围政策。吉迪恩案中建立的政策便是最好的例子。必须替各州刑事审判中的贫穷被告提供律师的判决从未遭遇任何强烈的抗议。此外，该项政策需要的基本上是法官与律师的支持；由国会与总统采取的行动并不必要。另一方面，让社会所有群体皆平等的政策太过广泛又充满争议性，以致于必须超越司法制度。这么一来，法院就成了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即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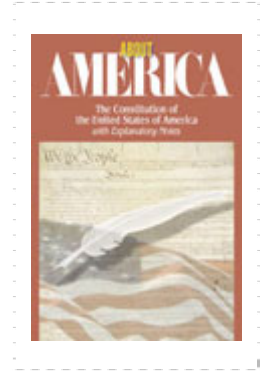
## 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

您即将进入我们另外一个的出版品, [有关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解释说明 \(About America: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Explanatory](#)

[Notes\)](#) (<http://usinfo.state.gov/products/pubs/>

[constitution/index.htm](#)). 它包括宪法全文及其 27 项修正案。请点选书名或图像。



## 名词解释

### Activism

**积极主义(司法):** 法官愿意将个人对于公共政策好坏的价值观投入案件。又见自制(司法)。

### Actus reus

**犯罪行为:** 犯罪的物质要件, 可以是犯下被禁止的行为(例如, 抢劫), 也可以是未履行规定之行为(例如拒绝停下车来协助车祸受害者)。

### Adversarial process

**对抗式的过程:** 使用于美国法庭的过程, 在其中, 审判被视为是对立双方之间的斗争, 而法官的角色类似于被动的仲裁者。又见审讯法。

### Advisory opinions

**咨询意见:** 对于抽象或假设性的问题作出裁决(一件美国法院不该做的事)。

###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替代性解决争议方案:** 不经审判即解决争议的方法(通常透过中立第三人的协助)。调解与仲裁是两项广为人知的 ADR 技巧。

### **Amicus curiae**

**法庭之友状：**非案件当事人的个人(或团体)针对应该如何判决案件提出看法(通常以书面概要的方式)。

### **Answer**

**答辩状：**由被告所写的正式书面陈述，以响应民事起诉状并提出其辩护之理由。

### **Appellate jurisdiction**

**上诉管辖权：**上级法院复审下级法院之判决的权力。

### **Arraignment**

**传讯：**被告为因应大陪审团之起诉书或检察官之诉讼状而被带到即将进行审理之法院的法官面前的过程。

### **Bail**

**保释金：**为确保被告在审理时现身于法庭而由法院所保留的一笔被告的钱。

### **Bench trial**

**法院自行裁定：**没有陪审团的审判，由法官裁定哪一方当事人获胜。

### **Bill of attainder**

**剥夺财产和公民权利的法案：**为美国宪法禁止的一项法令。此法令让某人(或某一类别人士)，而非一般大众，的行为成为非法。

### **Bill of information**

**诉讼状：**检察官为指控被告而准备的陈述，若为法官所许可，则被告必须为所涉及的罪行受审。诉讼状用于没有大陪审团的州。

### **Certification**

**认证：**美国上诉法院向美国最高法院请求对特定法律事务加以指示或厘清

的程序。大法官可选择接受这项请求，或可要求将全部案件纪录送交最高法院进行复审与最后判决。

### **Civil law**

**民法：**关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公司之间关系的法令。

### **Class action**

**集体诉讼：**由一群对一共同实体有类似不满的人提出的诉讼；例如一群罹患肺癌的抽烟者对一烟草公司提出控诉。

### **Collegial court**

**合议庭：**有一名以上法官的法院，几乎都是上诉法院。

### **Common law**

**普通法：**承袭自英国的法律制度，以法律程序或传统而非成文法或有系统的法典为基础。

### **Complaint**

**控告书：**提起民事案件的原告所提出的书面陈述。内容陈述被告涉及从事之不法行为，并向法院要求补偿。

### **Concurrent jurisdiction**

**共同管辖权：**两个法院拥有审理同一案件之法律权力的情况。例如，美国最高法院与美国初审法院对于某些由大使或领事提出的案件或控告大使或领事的案件，拥有共同管辖权。

### **Concurring opinions**

**协同意见：**由一名法院成员所写的意见。此名成员虽然同意案件结果，但另外提供了同意该判决的理由。

### **Corpus juris**

**法典大全：**某一法律实体的完整法律正文。



### **Courtroom workgroup**

**法庭工作小组：**某法庭之日常工作的固定参与者。这个群体中能能见度最高的是法官、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

### **Court of appeals**

**上诉法院：**比一般初审法院层级更高并具有复审或修正初审法官判决之功能的法院。

### **Crime**

**犯罪：**违反州的罪行，可处以罚鍰、监禁，或死刑。

### **Criminal law**

**刑法：**此法是关于违反州本身的罪行和不利于某人但被视为是冒犯了整体社会的行为 — 例如，持枪抢劫或强暴。

### **Cross-examination**

**交叉盘诘：**审判中，向被对方律师传唤至法庭的证人提出的问题。

### **Damages**

**赔偿金：**民事案件中被告支付给获胜的原告以赔偿其伤害的金钱。补偿性赔偿金旨在支付原告的实际损失；惩罚性赔偿金则用于处罚被告。

### **Declaratory judgment**

**确认之诉：**此时法院根据成文法、遗嘱，或合约概述当事人的权利。

### **Defendant**

**被告：**民事案件中原告控告的人或组织；刑事案件中则是被控犯罪的人。

### **Deposition**

**口供证词：**在获法律之授权可主持宣誓的官员面前所做的口头证词。在证据揭示过程中，这类陈述常用来检验潜在证人。

**Discovery**

**证据揭示：**律师在准备审判时知悉对方论据的过程。典型的证据揭示工具包括口头证词、书面询问，以及要求调阅相关文件。

**Dissenting opinion**

**异议：**由反对法院审理案件结果的一名法院成员所写的意见书。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suit**

**不同公民资格之诉讼：**某一州公民对其他州公民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

**En banc**

**全院会审：**由法院全体成员而非只有一个法官小组参与的开庭期。

**Equity**

**衡平法：**法官得以发布一项补救办法以避免或纠正即将发生之不法行为的法律范畴；例如对工会的非法罢工发出禁止令。

**Ex post facto law**

**追溯法令：**为美国宪法所禁止，此法在行为发生后才宣布该行为不合法。

**Federal question**

**联邦问题：**如果一桩法院案件环绕着对联邦法、美国宪法，或条约的解释打转，则此案件便包含了一个联邦问题，并可由联邦法院审理。

**Felony**

**重罪：**刑罚可能为死刑或囚禁于监狱的罪行。

**Grand jury**

**大陪审团：**由 16 至 23 名公民组成的团体，负责听取由检察官提出的刑事指控之证据并判定是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某人已犯下罪行。又见起诉书。

## **Habeas corpus**

**人身保护令：**通常用于将囚犯带到法院以判定其监禁是否合法的命令(法庭命令)。

## **Impeachment**

**弹劾：**免去联邦法官职务的唯一方法。由众议院提出指控，参议院在审判后以三分之二票数判定有罪。

## **Indictment**

**起诉书：**大陪审团因为相信有充分理由可进行审判而下令被告受审的判决。

## **Inquisitorial method**

**审讯法：**大部分欧洲与拉丁美洲法庭所使用的程序，其中法官与陪审团扮演积极角色，而律师只支持与补充司法调查。又见对抗式的过程。

## **Interrogatory**

**书面询问：**民事案件中诉讼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的书面问题，是审前证据揭示的一部分。收到书面询问的当事人必须在宣誓下以书面方式回答。

## **Judgment**

**判决：**法院最后解决诉讼当事人纠纷而作出的正式判决。

## **Judicial review**

**司法复审：**司法部门宣布行政与立法部门行为违宪的权力。

## **Jurisdiction**

**司法管辖权：**法院审理与审理法律纠纷和执行其裁决的权力。

## **Justiciability**

**可裁判性：**法官是否应该或避免审理某些类型的案件。它不同于与法官审

理案件之法律技术性权力有关的司法管辖权。例如，涉及政治问题的法律诉讼就被认为是不具可裁判性的。

## **Law**

**法律：**在威胁中被批准或实际上是由物理力之施用而批准的社会规范。执行此物理力的人被社会认可为合法拥有这类权力，例如警察。

## **Magistrate**

**治安官：**被告被捕后必须面对的下级司法官员。治安官有义务告知被告其被控诉之罪名及其法律权利。

## **Mandatory sentencing laws**

**强制判刑法：**规定被判刑之罪犯之自动刑期的成文法，通常规定最短刑期。这些法令通常用于使用枪枝的暴力犯罪或惯犯。

## **Mens rea**

**犯罪意图：**犯罪的心理因素 — 也就是准备从事犯罪者的意图。通常心理的意图与意愿愈强，罪行就愈重。

## **Merit selection**

**择优遴选：**一项遴选州法官的方法。州长从为遴选法官而设置的提名小组所提交的推荐候选人决选名单中挑选一名法官并加以任命。法官任职一小段时间后必须参加留任选举，接着由选民判定法官是否应该留任做完任期。

## **Misdemeanor**

**轻罪：**轻度罪行，其惩罚通常在市或郡的监狱监禁一年以下。

## **Moot**

**已过时：**案件的基本事实或双方当事人的状况已于提出诉讼与法官审理之间的过渡期发生重大改变。

### **Nolo contendere**

**不争执：**刑事被告的答辩，在答辩中被告不否认案件事实但声称自己没有犯任何的罪，或可表示被告不了解指控内容。

### **Opinion of the court**

**法院意见：**一名法官对法院判决所做的书面解释。由于案件可能由上诉法院的法官小组审理，因此意见的形式有两种。如果全体法官都完全同意结果，则由一名法官书写全体意见。如果不是所有的法官都同意，那么正式的判决将以多数人的看法为基础，并由投下多数票的一位法官书写判决。

### **Oral argument**

**口头辩论：**双方律师在法院概述立场与回答法官问题的机会。

### **Ordinance-making power**

**法令制订权：**州长制定州议会通过之法案的细节的权力。

### **Original jurisdiction**

**原始管辖权：**法院依法必须先审理特定类型的案件。例如，对于涉及不同州公民间且金额至少为 **75,000** 美元的诉讼，联邦地方法院拥有原始管辖权。

### **Overcharging**

**过度指控：**检察官在指控刑事被告过程中，为了从辩方律师获得更有利的认罪协商，因而指控被告比事实更为严重的罪行。

### **Per curiam**

**法庭共同决议：**一项未经签署的法庭意见，通常是摘要。

### **Peremptory challenge**

**先制性反对：**律师对某位陪审员人选的反对。律师可不提出公开理由就将某位陪审员从名单中删除。法律对这类反对的删除人数设了限制。

**Petit jury (or trial jury)**

**小陪审团(或审判陪审团):** 听取双方提出的证据并判定争议事实的一群公民。

**Plaintiff**

**原告:** 在民事诉讼中提出控告的人。

**Plea bargain**

**认罪协商:** 检察官与辩方律师之间达成的协议，以某种形式的仁慈换取认罪答辩。

**Political question**

**政治问题:** 法院根据对美国宪法的认识，判定制宪者认为应由国会或总统处理，因此拒绝裁决的事务。

**Private law**

**私法:** 私法处理私人与团体间有所关联时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

**Probation**

**缓刑:** 对罪行的惩罚，只要违法者之行为符合法院规定的行为准则，就允许此人留在社群里，不用入狱。

**Pro bono publico**

**公益性服务:** 通常是指为了慈善或公众目的而免费执行的法律服务。

**Public law**

**公法:** 个人与作为主权实体的州之间的关系 — 例如税法、刑法，以及社会安全法规。

**Recess appointment**

**休会任命:** 由总统在国会休会期间所作的任命。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任命的人可任职到重新召开国会为止。

### **Reversible error**

**可逆转的错误：**初审法院层级所犯的错误，由于情节严重，上诉法院必须推翻初审法官的判决。

### **Rule of four**

**四的规定：**在最高法院考虑审理一个案件之前，至少需要四名大法官同意受理该案。

### **Rule of 80**

**80 的规定：**当法官的年龄与担任法官年资的总合为 **80** 时，国会允许个别法官于退休时领得全薪并享有优待。

### **Self-restraint (judicial)**

**自制(司法)：**法官不愿将个人对于公共政策好坏之看法投入到案件中。又见积极主义(司法)。

### **Senatorial courtesy**

**参议员礼遇：**根据这项作法，与总统同政党的参议员反对总统欲指派成为家乡州之地方法官的候选人，参议员对于被提名人有实际否决权。

### **Sequestration (of jury)**

**隔离(陪审团)：**在重大或恶名昭彰案件中，法官可能会将陪审团隔离人群以远离外界眼光，这通常意味着陪审团过着群体生活，并且吃住费用都来自纳税人。

### **Socialization (judicial)**

**社会化(司法)：**新法官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被训练执行特别的法官职务的过程。

### **Standing**

**适格：**希望提出法律诉讼的人的资格。如要适格，就必须受过(或即将遭受)直接且重大的伤害。

**Stare decisis, the doctrine of**

**遵循先例原则：**实际上接受并遵循法院先前判决和既有之法律要点的传统。

**Statutory law**

**成文法：**由立法组织，例如国会、州议会，或市议会，所制订的法律。

**Three-judge panels (of appellate courts)**

**(上诉法院的)三人法官小组：**美国上诉法院大部分的判决并非由全体法官共同决定的，而是由随机挑选的三名法官审理任一案件。

**Three-judge district court**

**地方法院三人法官小组：**国会规定某些重大案件不能只由一名美国初审法官审理，必须交由三人法官小组决定，而其中一名必须是上诉法院法官。

**Tort**

**侵权行为：**民事上对他人的不法行为或失职。

**Trial de novo**

**重新审理：**如同不曾被审理般重新审理的新审判。

**Venue**

**审判地点：**进行案件审理的地理位置。

**Voir dire**

**陪审团资格审查：**对方律师为了判定陪审员是否对个别案件持有偏见而询问陪审员人选的过程。

**Warrant**

**逮捕令：**治安官在收到并检视过(某人针对另一人提出的)控诉书并发现有充分理由进行逮捕时所发出的命令。



### **Writ of certiorari**

**移审令：**由美国最高法院发布的命令，指示下级法院转交该院将受理之上诉案件的纪录。

### **Writ of mandamus**

**执行令：**强迫公职人员必须履行其职务的法院命令。

## **参考书目**

## **BIBLIOGRAPHY**

### **BOOKS**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United States Courts: Their Jurisdiction and Work*. Washington, DC: 1989.

Fallon, Richard H., Hart, Henry Melvin, and Wechsler, Herbert. *Hart and Wechsler's the Federal Courts and the Federal System*, 5th ed. New York, NY: Foundation Press, 2003.

Baum, Lawrence. *American Courts: Process and Policy*. 5th ed.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2001.

Chemerinsky, Erwin. *Federal Jurisdiction*, 4th ed. New York, NY: Aspen Publishers, 2003.

Feinman, Jay M. *Law 101: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0.

Franklin, Carl J. *Constitutional Law for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fessional*.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1999.

Friedman, Lawrence Meir. *Law in Americ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NY: Modern Library, 2002.

Mullenix, Linda S., Martin Redish, and Georgene Vairo. *Understanding Federal Courts and Jurisdiction*. New York, NY: Matthew Bender, 1998.

Posner, Richard A., *The Federal Courts: Challenge and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umpf, Harry P. *American Judicial Politics*, 2n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8.

## WEB SITES

Facts About the American Judicial System

**<http://www.abanet.org/media/factbooks/judifact.pdf>**

Federal Courts and What They Do

**[http://www.fjc.gov/public/pdf.nsf/lookup/FCtsWhat.pdf/\\$file/FCtsWhat.pdf](http://www.fjc.gov/public/pdf.nsf/lookup/FCtsWhat.pdf/$file/FCtsWhat.pdf)**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roduction for Judges and Judicial Administrators in Other Countries

**<http://www.uscourts.gov/library/internationalbook-fedcts2.pdf>**

InfoUSA -- Judicial Branch

**<http://usinfo.state.gov/usa/infousa/politics/judbranc.htm>**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System

**[http://www.cec.org/pubs\\_info\\_resources/law\\_treat\\_agree/](http://www.cec.org/pubs_info_resources/law_treat_agree/)**

***summary\_enviro\_law/publication/usdoc.cfm?varlan=english&topic=1***

JURIST: The Legal Education Network

***http://www.jurist.law.pitt.edu/***

Law Library Resource Exchange

***http://www.llrx.com/***

Legal Encyclopedia

***http://www.nolo.com/lawcenter/ency/index.cfm***

Library of Congress: Guide to Law Online

***http://www.loc.gov/law/guide/us.html***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 Court Information Database

***http://www.ncsconline.org/WCDS/index.htm***

Prosecutors in State Courts, 2001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pdf/psc01.pdf***

State Court Organization, 1998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pdf/sco98.pd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supremecourtus.gov***

Understanding the Federal Courts

***http://www.uscourts.gov/understand02/***

此电子书内容来源：美国国务院 电子书由禁书网热心网友制作。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 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 <http://bannedbook.s3-website-us-east-1.amazonaws.com/>